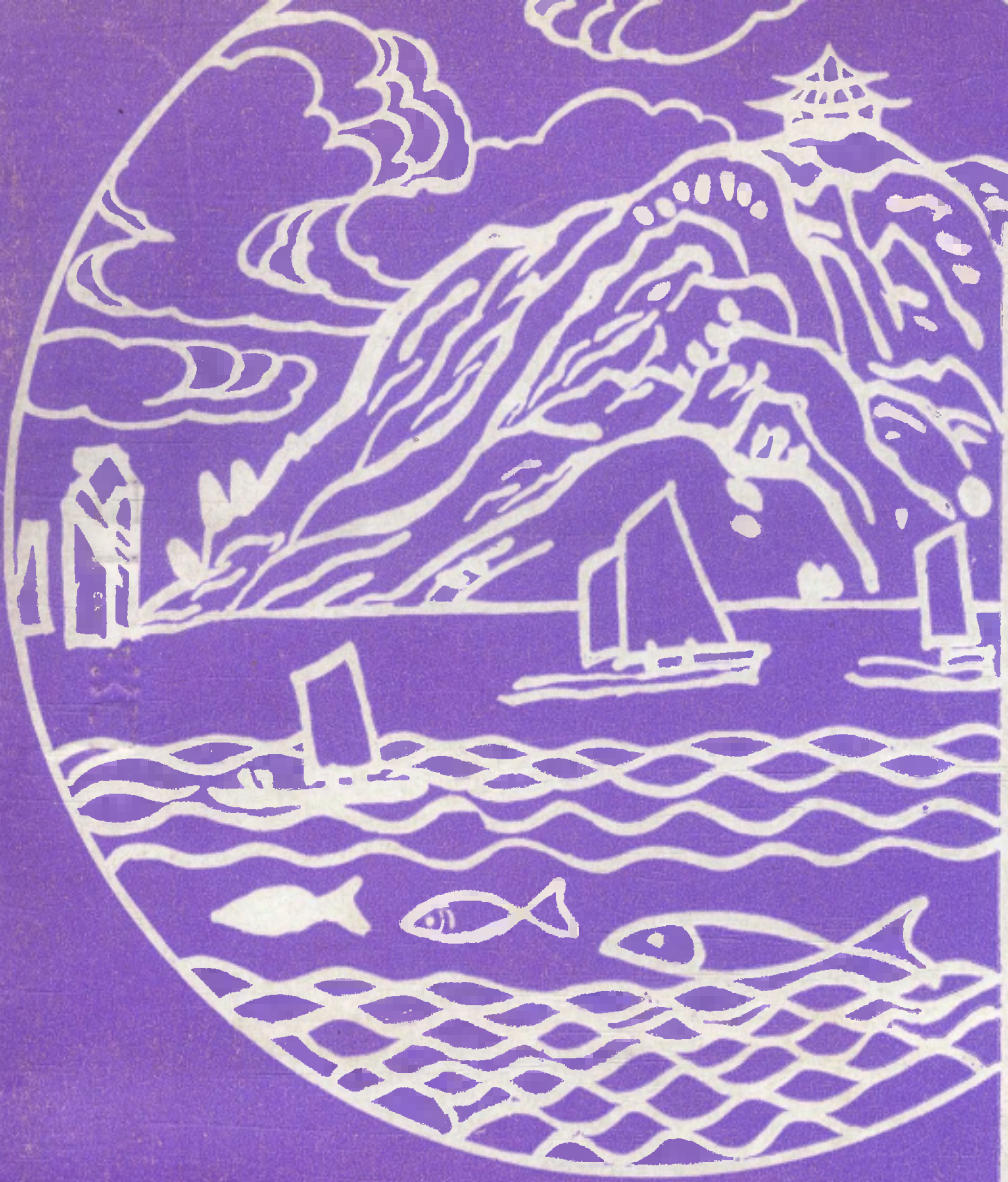




鎮江文史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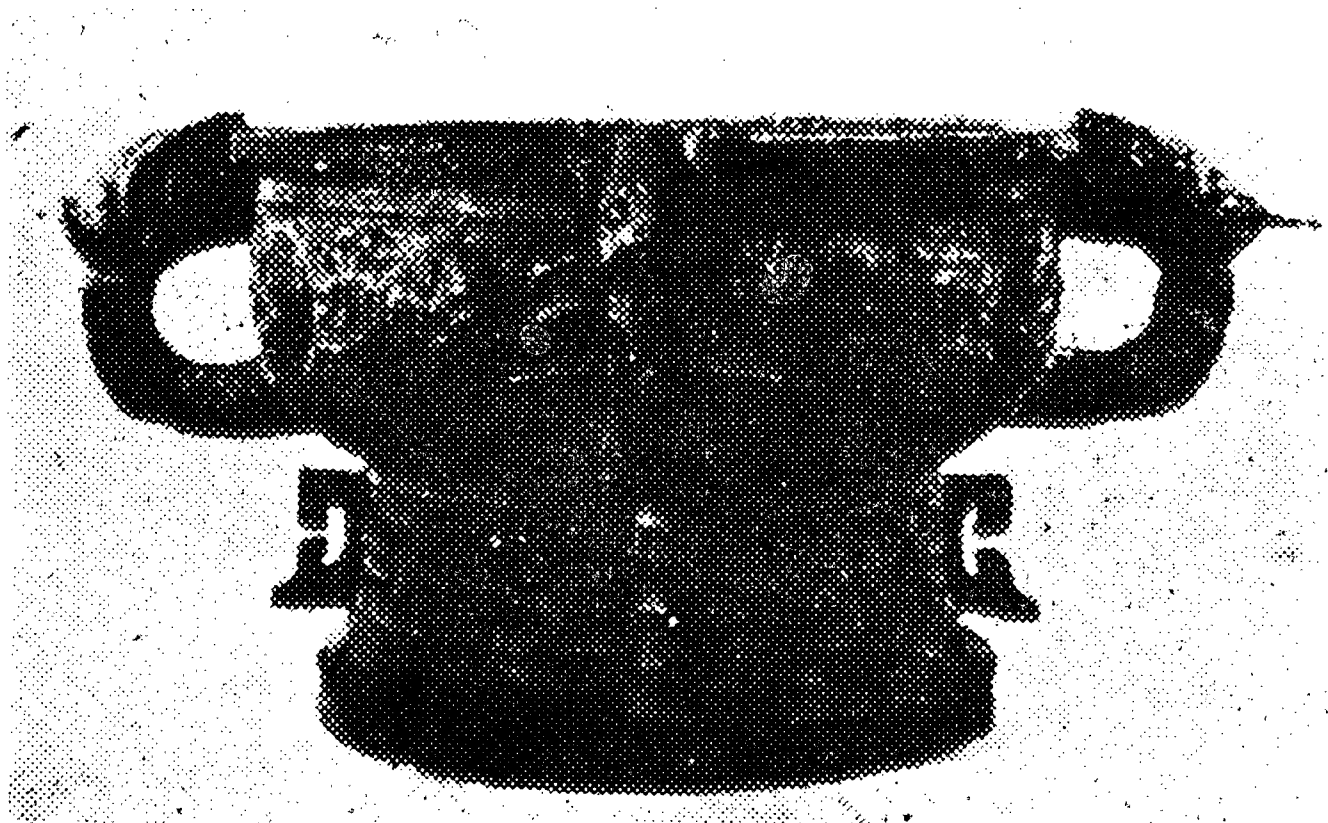
第七輯



D651.4
163

90-47303-5:1
17306-7:2





图一：矢殷



图二：矢殷铭文

镇江文史资料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镇江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四月

目 录

鸦片战争镇江之役·····	王 骧 (1)
清末科举旧闻·····	杨方益 (28)
句容农民庚戌暴动目击记·····	严企光 (57)
德兴洲农民抗租事略·····	张大恒 · 沈元庆 (69)
伊斯兰教在镇江的传播 ·····	镇江市伊斯兰教协会文史小组 (72)
镇江焦山佛学院·····	李守静 (83)
补白：雪烦智护瘞鹤铭·····	智 仙 (92)
镇江“旗人”琐忆·····	王凝庶 (93)
附录：飞机设计师巴玉藻·····	闻 思 (102)
回忆四益农场·····	沈嘉征 (103)
补白：由易君左的住宅想起·····	苍 松 (109)
我是怎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吴慎裕 (110)
夏佩白先生二三事·····	金维藩 (116)
附录：夏君佩白哀辞·····	蒋逸雪 (121)
我所知道的金运贵·····	郭维庚 (123)
补白：陈直教授赠书家乡·····	明 光 (137)
“画郎中”徐世洪·····	徐大奎 (138)

补白：伯先夫人气节高·····	赵家连（143）
丹徒人民送“瘟神”·····	沙一鸣（144）
镇江中医旧事拾零·····	柯拾萍·袁炳文·金维藩（150）
镇江名医陈邦贤、吴子周·····	金维藩·吴调公（154）
一份记太平军在镇江的珍贵文献·····	忻元章（158）
补白：赵君举的《三顾堂日记》·····	赵凤来（163）
新近发现的《岳氏宗谱》·····	杨再年（164）
雕版传播镇江地方志的两位热心人·····	殷光中（169）
关于恽代英来镇和镇江国民党建党史料研究 ·····	李之·戴午林（171）
补白：首任黄山镇中校长是谁·····	苍松（177）
《四辑》读后补遗·····	张容尘（178）
国宝——宜侯矢毁·····	季长隽·戴志恭（181）
“金陵王气”话寄奴·····	明光（183）

鸦片战争镇江之役

王骧

公元1840年至1842年（清道光二十年至廿二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前期的战场主要是在广东沿海，后期则扩大到江浙沿海。英侵略军舰队于1842年6月闯入长江，攻陷吴淞炮台，占领上海，随即西犯镇江，直向南京。敌军的企图攻占镇江，控制南北交通咽喉；封锁运河，阻止江南漕米税银北运，切断北京的经济命脉；迫使清政府乞降求和，全盘答应侵略者的要求。由于清政府无耻的投降决策，使侵略军的企图全部得逞，但出乎侵略者意料之外的，是在攻占镇江时却遭到当地爱国军民的顽强抵抗，受到重大损失。

这一震惊中外的镇江战役，是继广州三元里群众围歼英侵略军和浙江定海清军还击英军的血战以后又一次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强盗的沉重打击，而其作战规模之大和战争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了以上两次战役。恩格斯在《英军对华的新远征》一文中高度评价镇江旗军的抵抗功绩道：“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遇到同样（镇江）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

关于鸦片战争的历史，已有不少专门著作作了论述，这些著作虽然也提到了镇江之役，而都比较简括。笔者不揣浅陋，以平时搜集到的一些资料，对镇江之役的前后经过及其影响，作些介绍，以就正于方家。

一、英舰队大举进犯

侵入长江的英军兵力，根据英方有关记载，原在浙江作战的英军（除了留下一部分据守定海、乍浦外），加上有新从印度调来吴淞口外的援军，一共凑集了包括军舰、轮船、运输船等八十艘的舰队，载有海陆军官兵一万余人，炮七百二十四门。舰队的编制大致如下：

先行舰队有军舰司塔林号、伯劳弗号、摩底士底号、克里欧号、哥伦鲜恩号、莫尔德斯号；轮船弗莱吉森号、伯鲁多号、麦都隆号、复仇神号、伯劳西伯号，以及载有七十二门炮的旗舰皋华丽号等共十二艘轮船。

第一纵队有军舰加略普号、轮船威克逊号、马良号及七艘运输船。

第二纵队有军舰布朗底号、轮船奥克兰号及十艘运输船。

第三纵队有运兵舰贝莱色号、运输船朱匹忒号及其他九艘运输船。

第四纵队有军舰安度明号、轮船西索斯梯号及十二艘运输船。

第五纵队有军舰戴窦号、轮船那勒林号、运兵船响尾蛇号、运输船亚荷罗号及其他运输船八艘。

此外，还有一些舰船往来接应于长江航道中。

舰队里除海军外，还有陆军四个旅，分由陆军少将萨勒顿、巴克雷、叔得和炮兵旅长蒙哥马利指挥。这些部队被分配在海军五个纵队里，每一纵队由一艘战舰负责指挥（上面每纵队的第一艘即指挥舰）。

陆军部队来源有三：一是从英国本土开来的远征军；一是英军原驻印度的殖民军部队如孟加拉义勇军；一是雇佣的印度土籍兵，来自马德拉斯。三种成分的官兵混合编制在几

个旅内，完全是一支五光十色的殖民军。

侵略军的最高指挥人员为总司令兼海军司令巴尔克（一译巴加），陆军司令卧乌古（一译郭富）。他们的军事行动，听命于英政府的全权代表璞鼎查。传政士的儿子、臭名昭著的小马礼逊，随军担任首席翻译。还有披着传教士外衣的特务，刚刚做过敌占区宁波县知县，后来又充当镇江行政总管的郭士立，也混迹在这批海盗群伙之中。

这支庞大的组织严密的侵略舰队，对于基本上还是以旧式刀枪盾牌和少数落伍火器装备的清朝军队来说，的确是一支劲旅。但英军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远离本土，孤军深入，随时有被围歼的危险。他们进行的又是一场肮脏的侵略战争，为全中国广大人民所仇视，区区万人在几亿中国人民面前又算得了什么！所以侵略军并不担心清军的抵抗，而最害怕中国人民的自卫。可是清政府及镇江当局都不愿发动人民起来抗战，反而加以摧残打击，以致英寇在这场战争中占了上风，侥幸取胜。

二、沿江人民拦击敌寇

英舰闯进长江，由于不熟悉航道深浅，一路探测前进，速度很慢。中国方面如果出动足够的兵力，利用地形凭险防守，是可以阻止其深入长江的。然而清政府计不及此，竟放弃江防。官员更加畏敌如虎，见敌即逃，以致侵略军在通过江阴险要鹅鼻嘴时，探听到“诸险要皆无防”，“诸港汉荻洲皆无伏”便放胆地“连樯深入”。但是中国人民是不好欺侮的，沿江人民自发地抗击敌人，如江阴对岸靖江县乡民就曾给登岸骚扰的敌军以严重打击，连少年儿童也站立城头怒掷石块，打死一名英军。

7月14日，英先遣舰队由两条测量船引导，从江阴直向

圖山关进犯，山上的中国炮台当即开炮射击，打中了测量船的后舱，不少水兵掉落江心，吓得舰队倒退了二十多里，可惜防守这儿要塞的仅有士兵八十多人，炮弹又非常缺乏，终于因摩底士底号等九条英舰的环攻而被摧毁。而直接负有守卫之责的清官常镇通海道周頊，却换装逃向扬州去了。

7月15日，英舰司塔林号和另一艘轮船驶进焦山口探航，在焦山与象山之间的狭窄水道中，又被焦山炮台上发来的炮弹所轰击。英舰弗莱吉森号猛烈还击，派水兵登山搜索。焦山上驻有守炮台的蒙旗兵一百人，由云骑尉巴札尔带领，同英军展开了一场白刃战，英军死伤甚多，巴札尔和他的部下也全部壮烈牺牲，只有两人泅水过江回到城里报信（1962年笔者在镇江市养老院会见了巴札尔的后代蒙籍盲人包季青，他生动地讲述了这次战斗经过）。可惜对岸象山上守炮台的青州旗兵早被调回城里，未能充分发挥夹击敌舰的作用。登山水兵将焦山上的十二门炮摧毁，现在焦山上的古炮台遗址还在，是当年抗击侵略者的历史见证。

焦山耸峙江心，这段江道奔流急速，河床极不平常，有许多强大的漩涡，十九世纪中期的船还是不易航行的。“当他们开到江面中时就走不出漩涡，在漩涡里旋转，然后冲往下游，如同小孩将玩具放在潺潺溪水里一样地无能力”（利洛《英军在华作战末期记事》）；司塔林号就曾搁浅，花费了一整天时间才把它拖出。经过四次试航探路，才能通过。如果当时清军统帅部或地方当局在这一带加强作战部署，认真防御的话，英舰队闯过，一定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当天下午，英舰队在探悉了沿江无兵防守以后，才大胆地驶近了金山。金山当时还在江心，偏近南岸，山上全是庙宇，无一兵一卒，英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但在江面上却发生了一场

惊恐。山脚下有几只装满柴草的中国船忽然燃烧起来，撞向兵船，虽然没有撞中，冲天的火光又吓得英舰倒退。原来周頊曾经用防御的名义募集了十万两银子，这钱大半上了他的腰包，只不过收集了一些空粮船，堆上干柴，准备火攻敌舰的。办法不错，可他早已逃跑，指挥无人，是船上的营兵、水手主动燃撞敌船的。因为没有后继力量配合，而且这几艘柴船各自分散行动，并没有绑缚在一起结成巨大的冲击力，使敌舰容易摆脱火灾，只受了一场虚惊，十分可惜。火攻是当时对付敌舰最有效的战斗形式，敌人尤其害怕江上的船民实施火烧船舰的妙计，于是急急忙忙以海陆两司令的名义发出禁止群众放火烧船的布告，威吓说：“尔居民人或官人等，胆敢用火船火烧，欲焚烧我国兵船……惟有严执军法，即将四方拿到船只，尽行毁坏”。“尔等幸勿试为放火烧船，免致多人受累”。企图以毁灭所有江上中国船只来进行威胁和报复，可见敌人的色厉内荏，心虚胆怯。

英军占驻金山的同时，派出了五条军舰、两艘轮船封锁了运河口，“阻止了不下于七百只沙船的通行”，“切断了与北京之间的全部商业”。

19日左右，英舰队差不多陆续到齐了，从北固山至金山一带直达瓜洲口，帆樯林立，摆出进攻镇江城的架势，旗舰皋华丽号即停泊在城外江面。陆军司令卧乌古还登上金山瞭望地形，布置了攻城的作战方案，一场惨烈的血战即将开始了。

三、混乱落后的江城防备

正当侵略军兵临城下的严重时刻，镇江城在清王朝投降路线的束缚下，没有采取积极防御的有效措施。同时在驻防旗军副都统海龄的抗夷防汉的思想支配下，更陷于旗汉对

立、自相惊扰的混乱状态中。

早在英军尚未窜入长江以前，已经有人建议过防守镇江、扬州的办法，即“调集千百艘漕船横塞江口，铸铁索联为巨栅，漕内伏兵设炮，火器从舱中穴孔以待。再调集捆盐夫丁二千，予以械船，使并力堵御。以废船为前茅，捆徒为后劲，四十里外得此两层拒隘，夷未能飞渡”（梁廷柅《夷氛闻记》）。谋画虽未尽完善，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中注重江防和发动船户盐丁参加抗战两点尤其中肯。可丝毫没有受到当局的重视和采纳。

上海刚失陷，两江总督牛鉴慌慌张张地溜到镇江，命令常镇道和镇江府劝说富户出十二万两银子献给英军。其中有两家不愿，这笔赎城费未能凑集起来。牛鉴的这一举措等于就是向镇江的大小官员和居民宣布了既定的不抵抗主义，用不着搞什么作战准备，影响是十分恶劣的，以致偌大的镇江城“凡木石油炭火器守城之具，一切不备”（魏源《道光洋舰征抚记》），既解除了思想武装，又毫无一点物质准备。

镇江平时原有世袭驻防的蒙古旗兵一千二百人，绿营兵六百人，是清政府用以镇压汉族人民的武装。鸦片战争扩大到浙江沿海后，镇江受到震动，又从山东青州调来了旗兵四百人协防，绿营兵则大部分调出去防守上下游的小口岸。英舰攻城前夕，又调来浙江参赞大臣齐慎的二千汉军和湖北提督刘允孝的二千汉军，分驻城外。总数旗军一千六百人，汉军四千人。这几部分武力如果能够通力合作，指挥得宜，是可以同侵略军进行一番较量，不会轻易失掉城池的。当时旗军副都统海龄（满洲镶白旗人）虽主抗战，但由于他一系列错误的临战措施，迅速招致了毁军破城的结局。此人总的表现，在那“一片降幡出石头”的情况下，是一个坚决的抗战

派，最后不惜全家殉难；胜过那些投降、逃跑派多多。但镇江军民的抗战力量未能集中起来，充分发挥打击敌人的威力，他还是有相当责任的。

海龄的指挥错误，主要表现在：

一是撤江防，困守城市，形成被动挨打的局面。圖山是镇江以东的江防要地，“圖山扼其门户，焦山踞其中流，形势之险，可战可守”（《续丹徒县志·英吉利破城纪略》），要想固守镇江的城防，必须加强镇江的江防，这是普通的军事常识；可是海龄见不及此。他虽曾一度乘船由焦山而下至圖山“察看地势”，却“一无所布置”。他上疏皇帝说旗兵不敷守御，要求增援，而牛鉴等封疆大吏并不理会，“以‘无庸’入告。”从此海龄就干脆不问圖山的防守。焦山对岸的东码头（即象山）炮台，本来是由勇敢善战的青州旗兵驻守的，上海失陷后，海龄即将他们悉数调进城中，“东码头遂空壁无兵”，象山、汝山上的二十几门大炮都抛弃于外。殊不知江防既失，城池断不能保，整个镇江城连同他的旗军，都直接暴露在敌舰的炮口之前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这是战争中的过失，是保守主义在军事上表现。’海龄正是犯了这种消极防御的严重错误。”

二是过早关闭城门，断绝居民生计。当英军还停留在上海的时候，镇江城就已经迟开早闭，西小门闭绝不通，制造了不必要的紧张气氛，城中富户开始迁徙。英舰进入长江后，海龄发出安民布告，谓“夷船必不能入。即入，立提军出击，已有制胜奇策。”可是人民并不相信他的“奇策”，更加“遑遑迁避，溢巷塞途。”海龄便正式下令闭城，由于闭城闭市，穷人买不到米，也买不到烧饼馒头充饥，抢掠事件

时有发生。有一家富户自愿将存放在城外的几百石米运入城中供应民食，海龄也坚决不许，竟然说：“开城吾辈命即休，不能顾百姓。百姓有违令，即是汉奸，吾兵足以杀之。”

三是滥杀群众，挫伤民气。海龄害怕人民乘此反抗其种族统治，对城内汉族居民特别防范，“散布旗兵，满路捉人作汉奸”。旗兵们越发疑神见鬼，滥捉报功。“每有妇人孺子，见旗兵惊走，即追而杀之，向都统报功获赏。”7月16日（农历六月初十）这天，大肆逮捕了城内外百姓一百七十多人，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拉到小教场行刑，一口气杀了十三个人，“呼冤之声不绝”。处刑时，听到英舰大至，才停止不杀，而将其余不及行刑的人从城头上抛下摔死。提高警惕，防止汉奸的活动和破坏，自是战时的必要措施，但是象当时那样滥杀无辜，制造紧张气氛，人为地激化旗汉矛盾，只有对共同的民族大敌英侵略军有利。

四是忽视团结友军，共同对敌。海龄一意孤行，以城门为坚守自卫的唯一保证，不去争取刘允孝、齐慎的汉军协同作战，是一大失策。当南门外饥民抢掠的时候，刘允孝立即制止，并亲自进城向海龄面请开城，海龄坚决不同意。这天夜里几乎发生刘军和城上旗兵的武装冲突。大敌当前闹内讧，结果当然不堪了。当英军从西北进攻时，刘、齐二军本极怯敌，加之对海龄不满，于是就以私愤乱大谋，一战即退，丢下海龄守孤城了。海龄对于同城的汉族官吏也是这样。知县钱燕桂不十分赞同海龄滥捕百姓，海龄就说知县也是个大汉奸，趁钱因公出城，下令不许他再进城来，并且派人到县衙门捉了几个普通的衙役以示威。海龄对于他的满族同僚如知府祥龄的话，也同样不听。

以上这些情况，不仅仅是海龄个人的过错，这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的。对汉族人民实行高压统治，是清朝统治者的一贯政策，镇江特驻旗营，就是为了加强这种镇压。清初，郑成功、张煌言联军反清复明，从海上进军，曾经光复了镇江、瓜洲，镇江人民非常拥护，后来郑军失败撤退，清政府制造“通海”之狱，对镇江人民大施报复。现在又来了海上劲敌，虽然是外国侵略者，是各族人民的共敌，但在那班驻防旗军的眼中，汉族居民也是潜在的敌人，越是战争紧急，越要严密防范，这就是海龄把汉民往往看作汉奸的思想根源，是清王朝反动的国内统治政策所决定的。

江上的侵略军是那样强大，而守土官军却如此分崩离析，防守之计一无所出，民气又受到摧残；两相对照，镇江城的沦陷自然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四、剧烈的城头白刃战

英陆军司令卧乌古在登上金山塔顶观察过地形以后，认为镇江是一座“死城”，只有金山对岸西城外丛山上驻扎有一些清军部队，是他们占领此城的主要障碍。乃制定了第二天的攻城作战方案，决定由陆军三个旅分担攻城作战任务。第一路由萨勒顿少将指挥，军官83名，士兵2235名，攻击目标为城外的清军部队。第二路由叔得少将指挥，军官60名，士兵1772名，攻打北门。第三路由巴特雷少将指挥，军官68名，士兵2087名，攻打西门。参加作战的炮兵有军官32名，士兵570名。总计参加作战的军官248名，士兵6662名。临时设置了作战参谋部。此外还有一支海军陆战队，配合攻打西门。

侵略军的作战计划首先是将扎营于城外山冈上的中国军队的主力切断，由第一和第三旅加上一部分炮兵从金山对面

登陆。第一旅攻打军营，第三旅及余下的炮兵向西门和近郊攻击。第二旅在北固山下登陆，佯攻北门，如果得手，立即转为实际进攻。真正的主攻方向为西门。

7月21日（农历六月十四）清晨7时前，侵略军开始登陆，由军舰奥克兰号向南岸开炮掩护。可是登陆的进程并不顺利。大多数运输船只能在离岸较远的地方停泊，这一段江面水流很急，登陆相当困难，时间因此拖长。英方的一个小军官事后追忆道：“假如中国方面能够布置充足的兵力，并有精干的军官作指挥，那么在我方能够集中一支足够的队伍把守军击退并能在陆上立足以前，中国军队是可以阻止我军登陆，也会使我军遭到严重的损失。”可惜守城的清军竟然错过了这一次最好的歼敌机会，而让敌人的大部队毫不受阻地上了岸。

（1）近郊清军稍战即退

上午九点钟左右，侵略军第一旅携带野炮三门，首先向驻扎在阳彭山、银台山一带的清军齐慎部进攻。齐慎军共有七十五座营帐，分作两队，每队控制一处高处。当时，他们不知道现代作战的战术，应该守在战壕里沉着应战，而是拆除帐篷，列成长阵，联合在一起，成为一支密集的队伍，“旌旗林立，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其中有弓箭手，有手持长矛的兵士”（康木加宁《鸦片战争——在华作战回忆录》）。清军士兵本来是很勇敢的，用抬枪和火绳枪向英军猛烈开火，射击很为灵敏。但这些旧式武器“枪法既不正规，目标又不准确”。守军一面开炮，一面大声呐喊，冲下阵来。英军马上开炮，并冲锋向前。这时候督战的参赞大臣齐慎，首先胆怯动摇，学习牛鉴在吴淞督战的榜样，弃掉乘坐的轿子，飞马逃跑，这样全营士兵也就跟着溃散了。

当时刘允孝的两千人部队已闻讯从南山赶来，他们的战术也同齐慎部队一样，撤去了帐篷，飞舞着旗帜，见英军到来，首先开炮远射，其战斗力比齐军稍强，使英军有一些死伤。有一些军官骑在马上指挥，鼓励士兵，发出同样的喊声向敌军阵线冲来。萨勒顿便派出一支部队去切断刘军的后路。督战的湖北提督刘允孝也效法他的同行齐慎模样，弃轿逃跑。刘军被压缩在一座山丘上，然后四散奔逸。齐刘二军很少伤亡和被俘，一起退到辛丰镇。根据各方的记载，齐刘两军的广大官兵都是愿战能战的，造成溃败的原因全在于他们的将官的懦弱怕死，率先逃跑。事后齐慎还向清廷虚报战绩，掩饰其初战即溃的罪状，真是无耻之尤。刘允孝在逃到丹阳以后，不久病死。

（2）北门城头撕杀肉搏

叔得率领的第二旅在北门外江岸登陆，没有受到什么阻挡，迅速占了北固山甘露寺，（清军竟没有在这里驻兵设防，是很大的失着）。汽轮双桅舰奥克兰号以六十八磅弹炮向北门城垒发出十英寸长的炮弹，所有的大炮一齐开动，向城内滥行轰击。登陆敌军冒着弹雨攻打北城。

防守北城的主要是以勇悍善战著称的青州旗兵，他们在本防旗兵的密切配合下，将部分城垛拆掉，建立起一处临时炮位，从那里冷静地、迅捷地还击攻城敌军。“一切表现，和一支军队技术较高明及战斗经验丰富的部队比较起来，并无逊色”（奥特尼隆《对华作战记》）。

狡猾的叔得，趁城上旗兵集中注意力防御正面进攻之敌的时候，布置了云梯爬城的战术。他们运来了三架云梯，在一座垒台的下面，架梯攀城（这座垒台俗名十三门，即今烈士墓后高地，因垒台名前、左、右三面有十三个瞭望洞口得

名)，但迅即被城上守兵发觉，一弹打中了首先登上城头的敌军，接着从城堵左边不断发出了炮弹。

敌军一个整团和另一个团的部分，拼死拼活，蜂涌爬上了城头。守军立刻将部队调至发生危险的地段，与敌军肉搏。身强力壮的旗兵迎着敌人的刺刀冲上前去，迅猛地将敌兵拦腰抱捉，一起跳下城垛。有的旗兵在被刺伤以后居然还能将敌兵摔下城去。敌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城门终于被打开，大队敌军冲入城内，向西门方向去接应第二旅的进攻。这时候城门口有一名青州旗兵，手执长矛大叫一声，用力刺穿一个冲进城来的敌兵的上身。还没有来得及拔矛弃尸，第二个敌兵又上来了。青州兵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劲，连矛带尸往前一戮，又把前来的敌兵穿个通心过。这下吓坏了其余的敌寇。青州兵还想拔矛拼杀，一阵密集的枪弹射来，这位神勇的英雄才慢慢仆倒（见陈庆年《道光英舰破镇江记》）。

此时城头上的战斗尚未停止，旗军从城楼的窗门和城堵的墙上向企图进占城楼的敌军猛射，把指挥城头战斗的一名英军上尉打成重伤，倒在城上，上尉身旁的一个印度军曹也被子弹打穿了头上的帽子。这时另一支敌军赶来支援，掷弹队在前冲锋，才占领了城楼。经过搏斗的城楼里，留下了很多伤亡的旗兵，血流满地。

当一小队敌军排成单行从城楼出来的时候，城楼外面的旗兵又拼命冲来，用大刀砍死了几个英军。在城墙角的狭小地方，对付旗兵的大刀，英军的火力发挥不了大作用。恰巧这时有一个敌兵的弹药盒在城墙面上着火爆炸，旗军才完全放弃了城头。

（3）火药炸开西门

西门是双方争夺的重点，巴特雷的第三旅为攻城所耗费的时间也最长。守城的旗军也是严阵以待，城墙上每个炮眼都站着旗兵二人以上，他们警惕地注视着敌人的行动，只待对方来犯时即行开火。

镇江的城墙经过修建，相当高大坚固，西城门很雄伟，城楼计有两层，一垛一垛的城堞适于架设抬枪小炮，城堞下的炮眼，既能瞭望，又便于隐蔽。城头上还备有大量对付敌人攀城的石灰罐、石子，城门有内外两重，便于扼守。

侵略军派出两团人打前锋，占据了护城河边的民房，用毛瑟枪和大炮向城墙上连连射击。守城旗兵沉着应战。英军强攻不易得手。

这时一支英海军小分队，即布朗底号所属的几条船舶，载着炮兵百人和四门榴弹炮，前来支援进攻西门。这支船队沿运河上驶西门外一座桥梁时目标完全暴露。警惕性很高的守军立即从城墙上对准小船发放大抬枪与火绳枪，仅约十分钟的战斗，船上就有十六名敌兵受了伤，指挥官海军少校格罗契，身伤三处。其余敌军不得不逃回江心的军舰上。

守在皋华丽号旗舰上的海军司令巴尔克获悉船队失败的消息，马上派海军二百人，从运河入口处上岸，与陆军三百人配合，赶到出事地点，把搁在那儿的船只和大炮救回，并由两各舰长带领一批亡命之徒，冒死爬上了城。但登上城头的敌军更加暴露在内外两城楼交叉的炮火射击之下，华生舰长和另一名中尉都受了伤，前者身中三弹，一弹打入肋内，一名海军士兵身中数弹，登时毙命。还有一名海军跟踪冒进，也受了重伤。另一名舰长理查兹，总算侥幸没被打中。

这时陆军司令卧乌古命令陆军攻城部队派出一队工兵，携带大量炸药包炸城。一声轰隆，将厚实的外城门炸飞，才

打开了一处通向城内的缺口。差不多与此同时，从北门战场赶来西门的第一旅，也打开了内城门，闯进了西城。

五、争街夺巷，血战旗营

英军虽然冲破城门，但旗兵继续抵抗。在离城门不远的一座庙宇（即万寿宫，今市十五中学校址），他们在花园的土墙上架起抬枪，向城墙上奔跑的敌军猛烈射击，打死了陆军少校哥林森和一名军医，还有许多敌军受伤。直到英军大队赶来，旗军才撤离庙宇。这次战斗有两名清方军官指挥，很可能就是副都统海龄和他的亲密助手骁骑校祥云。

在城门附近的一条小街上，英军十一人的侦察小组，被埋伏的旗兵袭击，死一伤八。

敌军派出了增援小队企图肃清街道。有一个旗兵手执大刀突然向领队的英军中尉砍来，上尉身旁有一名士兵用步枪将刀隔开，这个士兵的大拇指全被刀锋削掉，中尉的头皮也削去了一块。街道两旁的房屋不时有枪弹射出。

在毒热的阳光下，向南门方向前进的大队敌军，行至城内高桥（即今解放路北段），遭到大队旗兵的袭击。这队旗兵在一块空场地上布阵，架了抬机枪，摆好阵势向敌军射击，不少侵略军被击毙。侵略军战了多时，才把旗兵击退。敌军总司令兼海军司令卧乌古险些为火绳枪击毙。据英方的统计，在这条街道的作战中，计有两名军官被打死，两名军官受伤，四十四名兵士伤亡。

敌军继续冲向小教场的旗营（即今市体育场到大市口红旗口一带），刚进入小城门后面的狭窄街道，一队旗兵突然从对面打来几炮。镶红旗防御恒福扼守营门，开炮接连打死了好多敌兵。本防旗兵个个奋不顾身，浴血抗战，敌军经过一番肉搏，遭受重大损失后，才占领了这一据点。

这批侵略者接着又闯入了设在旗营内的都统署（在今市政路）。在署门口，镶白旗步甲兆福连砍翻数名英兵。镶白旗马甲多庆伏在一堵垣墙上发炮阻击敌兵。骁骑校祥云保护副都统海龄，指挥众旗兵拼死抗御。旗兵大半牺牲，敌人也伤亡很多。一霎时都统署内火光烛天，杀声震地，旗兵个个奋战到死，没有一个缴械投降的。最后，海龄看到众寡不敌，大势已去，不愿身为俘虏，便在自己的屋内举火自焚，连同他的母亲和一个孙儿一齐殉难。祥云见海龄已死，随即抱着他的长官的印信，纵身跳入一口水井中。祥云的妻子鄂朗罕济勒门氏，一手持刀，一手掩面，先砍死两个小女儿，然后抹了自己的脖子。一门英烈，值得大书特书。

英军又分头到各户旗兵的住宅中搜索。打散回家的旗兵都拼命地保卫自己的家门，他们往往先杀了妻子儿女，然后与敌拼命到死。许多旗军家属自刎而死。绝无降敌、逃跑的。目睹这一幕幕悲壮的场景，连那些侵略军也个个心惊胆战。

有组织的抵抗虽然停止了，零星角斗仍然不断。例如东门附近的范公桥下（今正东路镇江师专学校门前），聚集了几百名敌兵，忽然从桥西方面跳上来一名旗兵，用大刀砍死了两名英兵。

夜幕降临，隐匿城内的旗兵，多次向敌军步哨和卫兵袭击，甚至英军的宿营里面也发生战斗。每次枪声响起，敌军就吹号击鼓，慌作一团，通夜不能入睡。侵略军进城的第一夜，就是在不断的惊恐中熬过的。

镇江之战，据英方显然缩小了的统计，共计死官兵一百八十五人，实际绝不止此数。后来英军中间又流行了类似霍乱的传染病，亡者很多，甚至运输船都不能开动，连旗舰皋华

丽号也采取了隔离措施。因此敌军士气低落，统帅部很为沮丧。璞鼎查曾一度想退出长江，改往天津。但翻译官小马礼逊加以阻拦，他认为镇江是中国漕运的咽喉，占领镇江就可以给清政府以致命打击，英军才取消了退出长江的打算。

镇江之战，英军的主要对手是旗军，包括本防旗兵和青州旗兵。恩格斯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一文中称赞旗兵的战斗精神道：“驻防旗兵虽然不通兵法，可是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有不少直接参加这次侵华战争的英国军人写的回忆录上，对攻城经过作了详尽的记述，虽然他们是站在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立场上看问题，有不少歪曲和反动的叙述，但都一致公认旗军作战勇武。他们是踏上中国国土不久的外国人，不可能知道与之作战的旗兵中有两种成分，也不可能辨认出谁是青州兵，谁是本防兵。有一些经历了这场战役的镇江本地知识分子的著述也反映了战役的部分情况，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偏见，即单独表扬青州旗兵的勇敢善战，而责怪本防兵在城防作战中总是怯战逃跑，带累了青州兵未能取胜。这是因为这些人虽然身居围城，而并没有亲身参加战斗，他们的事后追叙很多系辗转传闻。加之镇江的汉族居民平时就不满本防旗兵的种族压迫，更怨恨海龄在这次守城大战前的那些乖谬措施，使居民蒙受损害，因而在他们的记载中，就不免有意无意抹煞了本防旗兵中的积极表现。这是不公正的。事实上，本防兵确曾同青州兵一道并肩作战，共同奋勇杀敌。如海龄本人曾亲到西门督战，骁骑校祥云的父亲马甲长松同一天也参加了守城作战阵亡。镶白旗举人噶喇“以土实十三门未成（作者按，应是北门），凭城发枪应之，持一时许”。“十三门（应是北）正倾十余丈，英跃而登，噶喇杀十数人”。还有正白旗佐

领加勒通阿(汉名张景星)也参加了这次战斗，“奋身御敌，久战，城陷被执，不屈而死”(见《丹徒县志摭余》)。据他的侄孙画家张西园回忆，当时本防兵战死者有四百人之多，这说明青州兵并非孤军应敌，而本防兵也绝不是袖手旁观。旗营之战，更是本防兵独立作战，“旗摧纓尚赤，刀缺手犹抡”(张西园诗)。无论青州兵与本防兵，同样是在这场民族自卫战争中可歌可泣的抗敌英雄。

至于副都统海龄的功过问题，也应该给予一分为二的全面分析。海龄只知道消极防御，保守城池，造成了被动挨打的局面；歧视排斥汉军，以一千多旧式军队单独对付六千多全付现代武装的强敌，形成孤军作战，众寡难敌；特别是防范广大汉族居民，不仅不解决他们的困难，而且滥捕乱杀，制造混乱，挫伤了民气，以致广大的汉族居民不能积极参加保卫家乡的守城大战，是镇江迅速失陷的重要原因。这些都是海龄的过错。海龄所以采取这些错误的做法，是由他的清朝统治者的地位决定的，也是当时民族矛盾(满汉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者内部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的产物，是旧中国落后挨打的必然结果。整个清王朝的投降政策，必然导致地方局部抗战的失败。从大节来看，海龄是一个抗战派，坚守防地，以身殉难，迥异于那些逃跑将军、投降官吏。当时也有一些公正人士，对那些完全否定海龄功绩的不实之词，表示异议，如曾作奕经幕僚的贝青乔的《军中杂谈诗》说：“海门惨淡结冤云，故垒何堪问战勋！认取征袍余烬在，终能勉死谢三军”。不失为持平之论。谭宗浚在其骈文《览海赋》里，对于海龄及其家属的为国捐躯，更作了热烈赞颂：

岩岩润州，古称重镇，俯银涛而下瞰混茫，凭

铁瓮而上干险峻。壮矣海侯，冲锋冒刃，如范蠡之援鼓直前，如王黑之孤忠誓殉。蚩螾穿壕，狻猊结陈。……山疑晋介之焚，水积吴胥之怨，老兮少兮，并相随于灰烬。”

赋文对虎虎有生气的海龄的赞扬，也是对镇江抗英大战中流血牺牲的爱国军人的歌颂。

关于海龄自焚而死的问题，本地人的著述一般都认为是虚假的，有的说他被部下杀死，有的说他逃出镇江当了和尚，家属冒报殉难，希图抚恤。众说纷纭，在当时即发生了争议，后由清政府下令调查，找到了海龄自焚时的身上遗物，才算定了案。本地的汉族知识分子还是不服，写文嘲讽。但我们可以从英方参战人员的记载中了解海龄的自焚是真实的。如小马礼逊就曾到现场看见了海龄的焚余遗骸，并且当场由一位海龄的幕僚证实他的牺牲经过情况。恩格斯根据不少异口一词的资料作了简要的说明：“司令官看到大势已去，就焚烧了自己的房屋，本人也投火自尽”。应该说，这是十分可靠的断语。

六、侵略军犯下了滔天罪行

英侵略军在镇江攻城战中所蒙受的巨大损失，比起以往的任何一次侵华战役都要惨重。强盗们为了报复和趁机抢劫，发泄兽性，占城以后就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烧杀淫掳，对镇江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为此，恩格斯对英国侵略者给予了严厉的谴责：“在这次战役中英军损失了185人，他们为了对此进行报复，在劫城的时候大肆屠杀，英军作战时自始至终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这种手段，是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走私贪欲完全相符的。”

侵略者借口防止残存旗兵的袭击，挨户搜索，到处杀人，不仅杀死他们所发现的认为可疑的旗兵和旗兵家属，而且杀害无辜的汉族居民。据《光绪丹徒县志》极不完全记载，当时被敌兵杀害有姓名可查的就有程廷梓等男子四十人，妇女蔡朱氏等二十五人。范公桥的上下左右以及河中积尸累累，桥旁一户人家的门沿石上乱抛着十几册书籍，鲜血淋漓。到处可以听到居民的呼唤救命声和妇女儿童的啼哭声。至于不甘受辱而自杀、投井、上吊、自焚的男女老幼更不计其数；有旗人，也有汉人。有一大户人家，全家八十余口，无一生存。有的邻居左右相约，同时自尽。甚至一根绳上同时系着两个人的喉颈。有的自杀者自己下不了手，而要求别人将他缢死。水井里池塘里塞满了尸体。在炎热的天气下，连长江对岸都可以闻到腐尸的腥臭。“杀气幽霾天不暑，流尸湮塞水无声”；“恼杀南风时不意，触人鼻观总腥闻”。这些诗句都是对侵略者屠城罪行的控诉。这班杀人的魔鬼也忍受不了腐尸的恶臭，不得不把一大批尸体焚烧处理。事变以后，本地人设立收尸场，从井内、塘内及住宅中收尸二千余具，受害人家自行收尸以及不知下落的死者，估计不下万人。

奸淫妇女是侵略者的另一兽行。“妇女尸满道上，无不披发露体”，《京口僨城录》的作者法式善于逃离镇江城时，在七星街（北门城内）见到“两旁卧尸连接，皆见破席覆之，上微露首，披发散乱，下露足，弓鞋宛然。或低声云，此奸死者与奸不遂死者”。他当场看到三个英兵于路上捕捉逃难的妇女，将她们抛掷到一所掠屯妇女的屋子内，里面有人接手。又见“一妇年四十余，从旁行，夷俯视，遽挟脱胁下。妇首及其肩，足及其腰，犹强作挣扎……其形宛如人执鸡欲

割时。……人丛中忽有号哭阿母者，哀恫之音，肝摧胆裂，则此妇之女也”。多么惨痛的一幅图景！

放火也是强盗们的惯技。他们自己也供认不讳：不仅烧毁了所有的军营、武器库和大部分官署，还焚烧街道商店；最繁华的南门外全部化为灰烬。“西门桥至银山门无日不火，峻宇重垣，悉成瓦砾”（杨荣《出围城记》）。杨荣还有两首《镇城竹枝词》写道：

各家铺户尽遭殃，惨极油麻杂货行，火焰冲天
烧不断，也兼糟典与糖坊。

西门一带更凄凉，大厦高楼变火场，只见沿途
堆瓦砾，难分巷口在何方。

这确实是当时镇江惨象的写照。甚至到了占城十天后，八月一日（农历六月二十五）寇军还焚烧了东城一带。

抢劫财物更是强盗的目标。寇军占城以后三个月的抢劫行径，花样百出，贪得无厌。其主要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种是搜刮公库。如在一处库房中搜到价值六万元的纹银，强勒镇江居民替他们把这批现银装上军舰。侵略者在一座庙宇内发现了大量上好的宁缎，也成了他们的合法战利品（见柏纳德《“复仇神号”轮舰航行作战记》）。

一种是拦路行劫。不少侵略者供认：“当时凡是携带财物出城而被认为是掳掠品的，都由我们扣留下来。由这批财物出售所得到的现金，加上库存六万元，我们的战利品基金就大为可观了”（引文同上）。

一种是打家劫舍。《镇城竹枝词》道：“家家遇鬼吓痴呆，门外提刀劈进来，衣服金银并首饰，被他掳掠实堪哀”。被劫人家往往经过三番五次的搜索，真正搞得“无市不空，无家不破”。最可恶的是教唆地痞流氓跟他们一道抢劫，

“夷鬼户户搜索金银、妇人首饰，其衣服则掷付贫民，于是远近不逞之徒闻其讯，遍引夷人砸门劫掠”（朱士云《草间日记》）。这样做，既便于抢劫，更可以把抢劫的罪行让这些“贫民”分谤，正如把白人侵略者奸淫中国妇女的罪恶全部委过于印度兵一样，真是狡狴险恶之至。

强盗们把抢得的衣物，除留下细软，其余则设市拍卖。

《草间日记》说：“二十三日，夷人卖衣，所掠之衣列于北门外拍卖，有买之者，其价甚贱，但只受洋钱也”。强盗头儿还露出了鸦片烟贩的真面目，趁机倾销鸦片货，居然“张贴告示，并令百姓往圖山买烟，其价甚廉，无自误云云。”

一种是勒索供应。早在攻城前夕，就已用璞鼎查的名义于城外张贴布告，勒令丹徒县各乡村供应敌舰“黄牛二百只，鸡一千只，鸭二万只，火腿一万只，鸡蛋鸭蛋万石，果子三百石，蔬菜四百石。”并威吓说：“如若不办，调兵上岸”。破城以后，强令城中遭劫的居民贡献鸡、牛、羊、火腿，又到近郊抢劫食物，几次到离城十五里的丹徒镇勒索牛羊等物。又出示勒令丹阳县馈送黄牛二十头及牛鸡鸭菜果等。

一种是破坏和盗取珍贵文物。敌酋看到北固山上的宋代七层铁塔，妄想劫走，终因其过于笨重，才没被拉走，“乃去其顶，毁其相轮而止”（《出围城记》）。侵略分子事后追悔道：“我们认为这座宝塔比起我们在战争中所俘获的那些大炮来，是一种更加优美、更有价值的战利品。因为这座宝塔没有能拆下来带回去，不能不使我们心中感到遗憾”（柏纳德《“复仇神号”轮舰航行作战记》）。另外据说侵略者还窃取了金山寺佛顶上的大珠。

此外，劫夺船只、马匹和江上的木排等，更是不一而

足。“繁富十万户”的镇江，经过这批海盗的蹂躏、洗劫，“除一片废墟，什么都没有剩下来”。

更令人气愤的，后来侵略者在《南京条约》签订后勒逼清方即刻先交付他们第一批赔款六百万两（总额二千一百万两），琦善等强迫苏常镇锡等府凑集。劫余的镇江人民还要代清政府交纳巨额赔款。

侵略者妄图掩饰其在镇暴行，在迫订《南京条约》以后，假惺惺地出了一张布告，向镇江人表示要在二千一百万两赔款总额中提出一百万两，委托伊里布“救济难民”。当然这是骗人的鬼话。

七、人民不屈服于外国侵略

镇江失陷，清廷更为震惊和焦急，加紧求和乞降。道光帝接二连三地谕令耆英、伊里布、牛鉴等赶快与英方联系洽降。耆英等迅即派出官员上敌舰卑辞乞求。可是侵略者气焰嚣张，不予理睬，仍坚持要到南京去，并且接连照会江宁将军德珠布、两江总督牛鉴，要他们“赎城免战”，转禀皇帝答应英方提出的全部要求。否则，“不得不破城池”，“亦不能全行罢兵”。

“同时，驻泊镇江的英舰队陆续启航驶往南京，只留下少量船只停在镇江城下，由叔得的一旅陆军驻守镇江，扎营在北固山与金山两处。叔得将十三门下的城墙炸开一大段，以与北固山的营盘直接通连。山上设置大炮，随时可以轰城。又将各要道口埋设地雷，以防止清军反攻和人民的自发袭击。

尽管道光帝早已下令不许反攻镇江，可是人民的反抗一天也没有停止。

当侵略军刚入城进行大屠杀时，镇江居民即已开始了英

勇反抗，不少青壮年为了捍卫自己的父母，保护自己的妻儿，赤手空拳，敢于同上门侵犯的敌兵拼杀搏斗。张宝庆等人主动寻找敌兵交手，更是勇敢无比。小贩王兴元拒绝为敌兵带路抢劫，给他银元也不要，因而被杀。商人包国铃拒绝当汉奸，受到皮鞭毒打和抛掷江心的惩罚而丝毫不悔。旗人清瑞被敌军掳获到军舰上，劝他投降，始终不屈，敌人只好将他放回。妇女朱耿氏以自己的一死劝勉丈夫和儿子奋勇杀敌的事迹更为可贵。《续丹徒县志》记述道：

朱耿氏，喜庆妻，性英烈，知大义。生子德元、生元、慧元。……道光壬寅，英夷犯镇。夫刚勇，矢效忠，氏慷慨与言曰：“吾已恨为女子不能执干戈，卫社稷，顾复死贼手而为国辱耶？今幸三子成立，均可为国杀贼，请速与俱，毋以为念。若迟出，是速我死也。”夫遂行，慧元从。德元、生元不肯行，氏促之。德元、生元跪请曰：“三弟既随父去，吾兄弟生死愿与母共。”氏因弗强之出。时有邻妇十数人在侧，闻城垂陷，乃相集于城西南隅唐颍山东麓（即今市体育场附近山丘）积薪四周焚之，德元、生元与焉。时六月十四日也。

这些都表现了镇江人民在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下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

登岸敌军最害怕当地人民在夜间突然袭击。一个侵略军军官叫苦不迭地说：“夜间敌人的一些零星部队，不时袭击我军营房，使我们时刻惊醒，这对我们军事单位是最伤脑筋的事，因我们必须随时准备抵抗攻击，这样就根本得不到什么休息了。”侵略者所指的零星部队，实际是怀着满腔仇恨的当地群众自发地起来进行战斗。因此侵略军后来总是白天

进城，晚上龟缩到江心的船舰上，连那个身任佔领区行政长官，以鼓楼冈府署为办事地点的郭士立本人也是如此。

侵略者在船上同样也不能安稳。由于敌舰切断了航运交通，使千万船民渔夫丧失生计，更加痛恨敌人。他们组织小队，夜间偷袭敌船，叫做“摸樁”；摸到了甲板上的敌军，将其捉住投入江中淹死，叫做“抛江”。这是敌人非常害怕的一种惩罚手段。“风凄敌垒胡茄切，云压长江敌舰驰，何幸摸樁能杀贼，当时只恨少人知（陆嵩《摸樁》）。“抛江屡试贼胆裂”（陆嵩《赠龚监生照琪大令》）。诗人在这方面的歌咏，虽然只有片言只句，而劳动人民有勇有谋巧妙杀敌的本领，于此可见一斑。

江上的盐民（贩私盐的）“习于战斗，好战轻生”，“皆强狠有技术者”，是一支有组织的民间武装力量，他们以沿江的孔家涵子为下码头，瓜州、老虎颈为上码头，仪征为总汇，“大伙常五六百人，小亦二三百为群”。炮铳、鸟枪、长矛、大刀、鞭锤之器应有尽有。侵略军舰队盘踞镇江江面，封锁运河，这里正是盐民平时出没活动的地区，因此富有反抗性的盐民对侵略者满怀仇恨，并且敢于斗争，经常袭击敌船，使敌人心惊肉跳，防不胜防。清政府的官文书上也说：“老河影地方（按即仪征十二圩港）所泊盐船，在江上素称强大，水手亦桀骜不驯，前见夷船，即放抬枪”。有些官员上书清政府建议利用和组织盐民船民打击侵略者，收复镇江，：“使千百艘纵横江面，而又到处设伏，诱其深入以烧之，则南可以护京口之臂，北可以卫瓜扬之腹，西可以捍仪真之首，而金陵可以安枕”（吕贤基奏）。可是清政府的批复却是“严加管束”，驱散回籍”。别具肺肝的封建统治者还无耻地破坏盐民的抗英斗争，他们通过一个大盐商

镇江人颜崇礼（此人在仪征县城设宴招待敌军头目，供应敌军大量物资，并替扬州的官绅盐商向敌军献赎城费五十万元，是敌人非常满意的大汉奸），唆使和指引英舰炮击江上的盐船和老虎顶、青山头一带盐民聚居地方，炮火所及，连金山上的树木也大半烧光。《镇城竹枝词》咏述此事道：“火轮一路到南京，头队先将抵太平（太平洲即今之扬中县），远看盐船江上走，放开火炮怕屯兵。”原来英军所以乐于同清方勾结，炮轰盐民，是为扫除他们进军南京的障碍。颜崇礼因此“立功”，后来清王朝还赏给他道台的官衔。清统治者镇压爱国人民，奖励汉奸卖国贼的丑恶嘴脸，暴露得何等清晰！

当时居住南京的知名人士包世臣向那里的大官员们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建议，一举歼灭全部侵略军的计划。包世臣愤恨侵略者的蛮横逼勒，连夜草就了《歼夷议》一文，主张趁此刻敌军上下“骄志堕防”的时机，来一个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将其一网打尽。具体办法是：在南京醉宴敌酋，火烧敌船；在镇江截断圉山隘口，绝其归路，使孤军深入的敌舰队“万逆同歼，片帆不返”。可是抱定投降宗旨不变的清朝大吏，秉承道光帝的旨意，怎敢违反？认为和议已成，“不宜失信夷人”而不敢采纳包世臣的意见。

当时镇江及其邻近各县出现了爱国群众的“义启”，号召“聚众士百三十万，可敷杀贼”，痛恨“官不许焉”（郁伊优亚生《万民会愤》七律诗原注）。人民要自动组织起来抵御外侮，这是清王朝最为头痛，万万不能允许的。后来牛鉴派人捉拿了所谓“造谣惑众”的镇江人张淦（见伊里布家仆张喜的《抚夷日记》）。这位张淦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倡议组织义兵杀敌的发起人之一。可惜他的生平事迹，我们已无从

知道了。

耻辱的《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英帝国主义得到了暂时的满足。投降派大官僚对侵略军大头目又是拜会，又是宴请，竭尽谄媚勾结之能事。逃散的镇江地方官员这时也纷纷进城，拜见和宴请外国主子叔得、郭士立等敌酋。骄傲的敌军及随军家属以胜利者的姿态在镇江城内到处自由游逛，盛气凌人。军官的子女也装饰着他们的父辈从镇江人民手里抢掠来的银钏首饰招摇过市。有一个姓钱的中国儿童看了气愤不过，走上前去，将一个英军小孩穿戴的赃物一把手夺了过来，行人无不称快。这下触怒了占领者，勒令知县捉人。知县遵照敌人的命令，将钱姓小孩的父兄送往北固山敌营。敌军还不答应，定要索取“正犯”，宣称如不获得“正犯”，就开炮轰打北门，发出再度屠城的恐吓，使许多劫余居民又要迁移避祸，后来知县到底将钱姓小孩送至敌人那里处理，方才了结此事。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敌人如何骄横，清吏如何卑劣，镇江人民又是何等仇恨侵略者与鄙视清统治者。

八、牢记不忘的教训（编者按：此系作者的史论， 征得其同意，略而不刊。）

附：镇江战役时间表（1842）

- 6月5日（道光廿二年四月廿七日） 英舰队开抵长江口外。
- 6月13日（五月初五） 英军攻陷吴淞炮台，老将陈化成战死。
- 6月19日（五月十一日） 英军进入上海。
- 6月23日（五月十五日） 英军退出上海。
- 7月6日（五月廿九日） 英舰队溯江西上。
- 7月9日（六月初二日） 英舰队进入福山口。
- 7月10日（六月初三日） 英舰队至江阴。

- 7月12日（六月初五日） 英舰队过鹅鼻嘴。
- 7月13日（六月初六日） 英先行舰至圕山，遭圕山炮台阻击。
- 7月14日（六月初七日） 英舰毁圕山炮台。
- 7月15日（六月初八日） 英舰过焦山口，遭焦山炮台阻截，英舰毁焦山炮台后，进抵镇江城外。
- 7月17日（六月初十日） 英舰封锁运河口。
- 7月18日（六月十一日） 英军占领金山。
- 7月21日（六月十四日） 英军大举登陆，经激战后，攻破镇江城。
- 7月22日（六月十五日） 侵略军开始对镇江城进行大破坏。
- 8月1日（六月廿六日） 侵略军纵火焚东门，掠丹徒镇。
- 8月2日（六月廿七日） 英舰队陆续驶往南京，留叔得一旅守镇江。
- 8月6日（七月初一日） 叔得企图劫夺北固山铁塔未成。
- 8月28日（七月廿三日） 留镇侵略军开设黑市出售赃物。
- 8月29日（七月廿四日） 南京条约签订。不久镇江英侵略军贴出布告，要百姓去圕山购买鸦片。镇江地方官为侵略军钱行。
- 9月7日（八月初三日） 侵略军测绘镇江四门地图。
- 9月8日（八月初四日） 侵略者测绘丹徒镇地图。
- 9月21日（八月十七日） 为钱姓小孩夺还侵略者所劫银钏事，英军对全城居民进行威胁。
- 10月4日（九月初一日） 英舰队全部撤离镇江。

清末科举旧闻

杨方益

我生于停止科举以后四年，对科举并无亲身经历，但在少年时代亲闻过不少有关轶事。后来侧身社会，又曾经常和不少科举出身的乡前辈——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往还，听他们言当年“盛事”。现在想来，科举虽早已寿终正寝了，但把这些旧闻写出来还有一定史料价值。

一、“八股文”和“试帖诗”

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教育考试制度。考试取士始于汉代，但系临时设置，并未成为制度。隋废九品中正制，炀帝始置进士科。唐代置进士、秀才、明法、明书、明算等科，分科取士，乃有科举之名。宋以后，其他科目，仅有空名，进士科成为科举制度中的唯一科目。唐、宋科举考试，以诗赋为主，王安石改用经义，以后均用其法。明代开始用“八股文”开科取士。清兵入关后，科举及官吏制度，基本上沿用明制（《大清会典》有详细规定）。考明、清两代以“八股文”为衡士标准，其目的是以孔孟之道束缚读书人的思想，并使之终身致力于文章的固定结构和华丽词藻，通过科举，网罗士子，以维护其封建统治；读书人则通过科举，猎取功名，进身仕途。直至1905年，始以慈禧太后诏废除科举。

清代以“八股文”和“试帖诗”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而以八股文为主。戊戌变法后，废八股文，改试策论。要理解“八股”首先谈命题。“八股”的命题，都以四书——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上的原章句作题；而且多数是《论语》、《孟子》两书上的，例如出题：

“学而时习之”一章，这就是指由“子曰：学而时习之”直到“不亦君子乎”三段全部在内，加以发挥。有时出一种“破句题”，例如：出“学而”，或“时习之”，这就只能按所出半句或一两个字去发挥。有时还有一种“截搭题”，意思是分别截取半段相搭配之意；（不能东抽半段，西截半段，必须是原文连接的）例如出题：“时习之，不亦”，或“说乎，有朋”。甚而有时用这一章末句下几个字和下一章首句上几个字相截搭的，例如：“君子乎，有子曰”。最特殊时，竟有用这一篇的篇末几个字和下一篇起首几个字截搭（下面另有事实举例）。象这类破句题”和“截搭题”，根本不联贯，也无中心意义，但要对此做出洋洋洒洒、宣扬孔孟之道的八大股文章来，士子们都得藉此博取功名。做八股文章，实际上常常是想入非非，作一场文字游戏，根本谈不上治国安民。但数百年来，日理万机的阁部宰辅和责任綦重的封疆大吏，乃至亲民的府尊、县令，绝大多数都是由善作这些文字游戏的士子中选拔出来的。封建官僚的治绩就可想而知了。

再谈为什么要出破句题或截搭题呢？这是由于八股试题，限于四书，明清两朝几百年来的殿试、会试、乡试以至各省学政分府小考，出题必然要重复，否则已无题可出，所以想出这种“妙”法来。而截搭题既非原句，不相连贯，就更须挖空心思，做出“引人入胜”的文章来。例如曾听到“脍炙人口”的一段妙文：一次出了“以杖叩其胫、阙党童子将命”的截搭题，这是《论语》第十四篇中的两章，上句是孔子骂原壤“老而不死，是为贼”，恨得牙痒痒地打他，

“以杖叩其胫”，胫是小腿，杖打在小腿上，并不是致命处。下句是接着的另一章，阙党童子来见孔子传话，这两句真是毫不相关，竟并为一题，确是不好着笔的。而一个应试者竟做出“绝妙”文章来。他写道：“一杖而原壤叫，再杖而原壤跳，三杖而原壤死矣；三魂渺渺，七魄茫茫，一阵清风，化而为阙党童子……”。原壤被孔子三杖打死了，随了一阵清风，去脱胎换骨而成为阙党童子，并作了孔子的座上客！两章中毫不相关的两个人，竟被这样的“生花之笔”联系起来了，真是匪夷所思，但为众口传诵的好文章，并博取了功名；所谓“为圣贤立言”，竟然如此！

各个时代的考试命题，往往要联系时政。八股文命题的时政，就是让士子从正面歌功颂德或阐述圣贤之道。但也有敢于讽刺时政的，清末某省学政，因不满慈禧，出了一个截搭题，用《论语》第十六篇《季氏》篇的末三字“君夫人”（全句是“亦曰君夫人”），和第十九篇《阳货篇》的头三字“阳货欲”（全句是“阳货欲见孔子”）相截搭，成为“君夫人阳货欲”。经人告发，说是讽刺慈禧淫乱宫闱，因而招致杀身之祸，还株连了许多借题发挥的士子。至于雍正时一位学政出了《中庸》“维民所止”而被杀，更是众所周知的事例。

八股文亦称“时文”，又叫“四书文”；因为它不同于古文。雅称“制艺”，意思是指按照定制写作的“艺文”。全篇分四段，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用两句说破题目要义，是全篇关键性的一股，必须起到画龙点睛的妙用。我不只一次听到科举中谈论自己或别人“进学”、“中举”的文章，总是洋洋得意地朗诵他们的破题，认为通篇文章，全靠这两句

“拿魂”。实则破题只是标明全篇立论的主旨，以后各股，都围绕着破题铺陈。主试、阅卷人也往往在破题上推敲。有时尽管对通篇文章满意了，由于破题不够精练有力，竟予摒弃或降低名次。“承题”顾名思义，就是“承上文而言”，即承破题的意义而述之。“起讲”为议论的开始，就是从正面按照题意把问题提出来，一般只用几个字到一二百字。“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以下四股，自“起股”至“束股”，才是正式的议论，而以“中股”为全篇重心，无非是铺陈一些反面、侧面或深一层的论点、假设，加以辩论、反驳、解释，以证明破题立论的正确。最后的“束股”，乃是全篇的综合和结尾。在这四段中，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成八股，故叫“八股文”，也称“八比”。有时因两股说不出两层意思，就用不同的说法，重复一个内容，但必须两股遥遥相对，一反一正，一虚一实，句数、字数也要相同，甚至两股的平仄还要工整地相对称。但是，尽管两股对偶，还要保持散文的格局，不同于四六骈文。如落入骈体，又不成其为“时文”了。实际上这种文体，只是古文的末路，即散文和骈文的混血儿。

清代曾有很多行家精选有代表性的名家八股文章，刻成专集。大都是进场应试的中选文章，因会试进场称为“入闱”，故被称为“闱墨”。清末，最出名而拥有广大读者——图谋猎取功名的读书人——的选集，要算《墨耕斋时文选集》（书名全称已模糊，但“墨耕斋”三字记忆犹新）。我少年时曾浏览过，虽大多言之无物，但某些篇章，文字华丽，读来音调铿锵，确有吸引人之处。

这种科举“制艺”，是模式固定的四段八股文章；有时难于组合，就设法用陈词滥调来捏凑，很难自由发挥自己的

思想。加上程式的限制，遇到文章内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皇上”、“太庙”、“圣母皇太后”之类的名词，必须按规格抬头几格；而抬头之前的空格，就要预先设法填满，每行必须到底。填满空格的方法是堆砌词藻。“八股”本多陈词滥调，再一堆砌，就出现了叠床加屋、莫名其妙的狗屁文章，使人看了啼笑皆非。例如：

“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维，曷勿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要？”

“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苍生亦百姓之黎元。庶矣哉亿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时而用世，曷勿瞻黻座而登廊庙之朝廷？”

这两股文句，可谓音调铿锵了，但什么天地、宇宙、乾坤；什么元后、帝王、天子；什么吾心、中怀、在抱；苍生、百姓、黎元等等，只是啰嗦同义词，作者到底说的什么，谁也猜不透。但是，它是合格中式的！

八股文还有一个不许“犯上”、“犯下”的规定：即不管全章、全句题，或破句、截搭题，都只能对题发挥，不能牵涉到题前或题后的章句。否则就是“犯上”或“犯下”，文章虽好，多要归入“落卷”。

八股文命题限在“四书”，其立论、推理，找根据也必须在“四书”。两千多年来，对“四书”有多家不同的解释，明、清两朝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硬性规定以宋儒理学家朱熹的注释为标准。因而所有学子，想以应考猎取功名为进身之阶的，就不仅要熟读“四书”，而且要熟读《朱熹集注》。一个读书人自五六岁启蒙到应科试“入学”的一、二十年当中，尽管要读遍“十三经”及其他许多书籍，但重点

是“朱注四书”及墨卷，这才有可能博得功名。我的一个族兄镇江进士杨鸿发，要比我长四十岁以上，他有两个本领：第一是“四书”和“朱注”读得烂熟。如考问某一个字、词或人名、地名等，在“四书”上出现几次，他可以掐着指头一处一处数出来而不会讹错。另一个特点是熟读“闾墨”三千篇之多。他自己说，去北京会试时，雇一辆独轮车长行，一边放置行囊、书籍，自己则于另一边瞑坐默背墨卷，数千里行程近两个月，还没有将所记得的背诵完毕。他凭这两个看家本领，做到熟能生巧，左右逢源，因而中了三甲进士。以后他中式的闾墨传出，被传诵者誉为佳作。但他写的普通信件公牘，并不流畅。我也为此请教过先辈，他们说：“文章不与政事同”。这就是说八股文章做得好，不一定能处理政治和事务，有的人甚而普通散文信牘也不一定能写好。这个例子虽不能代表科举所取“士”的全部，但可以说，这种“士”的大部分，“为政”是很成问题的。

应试的人除了要精心做好三篇八股文之外，还要做一首诗。俗说，读书人的关键，就在“三篇文章一首诗”。这诗不是律、绝、古风，而是另一种体裁的“试帖诗”，大都为五言六韵或八韵的排律。诗题往往用一句旧诗，而选取其中一字为韵脚。例如书题“赋得‘路上行人欲断魂’得‘魂’字”，就是要以“魂”字所在的“十二文”为韵脚。这种诗谈不上风花雪月，也无所谓白描、写实，而要牵强附会地歌功颂德，即使文不对题也无妨。但格律要求严格，平仄声、韵脚，不能马虎。如稍有失粘，失韵，可能被“贴”出。三篇八股文章做得再好，也全报废了。

还有一个誊写的问题。试卷的文、诗必须用正楷誊写，要求字字工整，不能草率。如有落字、错别字、颠倒字，可

以挖补。应试者一般都擅长挖补“技术”。因为如有错别字，就可能被“贴”出，以致全功尽弃。特别是在“殿试”时，虽另有阅卷大臣，名义上是皇帝主考，更须注意不能错落；还须字迹工整秀丽，才能入选。所以殿试中的翰林，一般都擅长书法。

试帖诗失韵、失粘，字迹错落，都可能被“贴”。如文章本身不合格甚而不能完篇的，自然就更耍“贴”了。这个“贴”，在考试中是最倒霉、最丢人的事。有些试卷文章不好，不准备录取，摒弃在旁边，称为“落卷”；有时因为录取名额未满，为了慎重，常常再到“落卷”中重行搜寻一番，有些“落卷”还有可能被录取。而一经被“贴”，那就彻底完了。因为“贴”出就是公布于众，不仅这一次是肯定落选了，而且还有可能罚停一两科，意思是叫回去苦读几年再来应试。

二、童生和秀才

科举时代，一些读书人自五六岁启蒙时起，就沉陷于四书五经、八股时文和试帖诗之中，以此谋取功名；虽然也有涉猎攢研浩如烟海的书籍而成为大学问家的，那毕竟是极少数，因而，造成许多只知读书习文，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他们“三更灯火五更鸡”，勤勤恳恳，最早的要到十五、六岁“入学”，成为秀才，这就已是“十年寒窗”了；而这个年龄能“入学”是极少的。二、三十岁“入学”，被认为“少年英俊”；四十左右岁“入学”，并不认为过迟，年近花甲、鬓发皆苍的老者还去赶考，也并不是个别的。“入学”以后，才是科举的起步；如要进取，再苦读十年、二十年的也不乏其人。那时的读书人，在未“入学”以前，不管是十几岁的童子，或是花甲老人，一律称为“童生”，而童

生应考，称为“童子试”。凡参加“童子试”的，必须有一定的条件和手续。首先是阶级成分的限制很严。童生应试“童子试”，特别注重“籍”，绝不容许“冒籍”。如属“冒籍”，即使进了学，还要被轰出来。“冒籍”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籍贯”的籍，即必须在世代居住的“祖籍”、“原籍”应试；如是寄居，即使二十年、三十年也不行，只能赶回“原籍”应试。这是因为各地录取名额，是早由朝廷规定的，所以决不能让外地人“冒籍”，占去名额。另一意义的“籍”，是家庭成分的“籍”，也是阶级性质的“籍”。那时认为“下贱”的某些职业、行业，官署里另有册籍记载着，如娼、优、隶、卒等等，这些籍载的户口，社会地位低人一等，其子弟绝对不许应试，以免“沾辱士林”。这些被禁止参与应试的，不仅多数是劳动人民家庭，而且包括许多极有造诣的艺人，如戏剧家（优伶）、音乐家（吹鼓手）等家庭子弟，他们中尽管有优秀的人才，都被剥夺了应试的权利。为此，立有规定：凡是初次应试的童生，必须由本县“廪生”负责担保没有“冒籍”情事，称作“廪保”。并且还要保其不在父母之丧的三年丧服期内。因为父母大丧，应当“苦塊昏迷”，在家守制，不应去巴干功名了。

应试的手续繁冗。“童子试”简称童试，亦称小考、小试。童子试包括县试、府（或直隶州、厅）试和院试三个阶段。县试由县官主持，试期多在二月，约考五场，各场分别试八股文、试帖诗、经论、律赋等。经县试录取的童生得参加府（或直隶州、厅）试、试期多在四月，府试有三场。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考试，以学政称提督学院，故名院试。学政旧制称提学道，所以院试又沿称道试。学政于驻在地考试

就近的府、县；其余各府，则以次分期按临考试，正试一场，复试一场，录取者即为生员，送入府、县学宫，称入学，受教官的日课与考校。学政也称督学，一般尊称为“学台”。各省学政到任后，即挂牌公布先后按临各府、州日期，分别举行府试。一般府治所在地均建有考棚，阖府属各州（小州）县童生均齐集府治应试。但镇江府则属例外。镇江府属四县一厅——丹徒（包括今镇江市城郊区及丹徒县）、丹阳、金坛、溧阳和太平厅（即今扬中县），府治在丹徒县（今镇江市市区），原建有考棚。后因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时期，金坛县损失最大，城乡人烟稀少，为了帮助金坛县恢复繁荣，由当时两江总督曾国荃奏准于金坛城新建考棚，将镇江府童子试，改在金坛县举行。府治则仍设在丹徒县。（一说是乾隆时金坛人文华殿大学士于敏中为了促进家乡经济文化的发展，奏清朝廷，将镇江府童子试改在金坛。）

所有各府童子试，虽其所属各县童生在同一考棚，并统一命题，但各县录取名额不相淆混；各县人口多寡不同，录取的难易和水平高低也不相同。

学政于考试前，指调一些科举出身的候补知县和佐杂班子帮同阅卷，并连同执事员役一同住入考棚。考生点名领卷入棚后，封锁前后门，禁止出入和传达消息，关防极为严密。一般需几天之久，考生交卷后，才陆续放出。考棚是一座很大的院落，整个围墙之内，分布着若干较小的院落。院落内又分隔成几十间小屋，称为号子，分别编上字号，考生们对号入棚。每一考生各占一间号子，里面有两块两端嵌在墙内的木板，前方一块在上，作为书桌；后方一块在下，作为坐凳。后背靠墙，必要时木板上铺点衣物，也可勉强曲卧。考生可在院落里散步以及去厕所大小便等，也不完全禁

止互相交谈。经特许售卖零食的，只准由门口传进食物，售卖者不许出入。每个考生都得带一只特制的“考篮”。“考篮”分为两层，里面装着火炉、碗、箸等生活用品，米或点心、酱菜等食品；还装有考试用具如纸、墨、笔、砚、以及做诗查韵的《佩文韵府》。此外，必须带一把小刀和一点浆糊，这是为写了错、落字挖补用的。那时的试卷用纸很考究，一般用宣纸之类折成摺子，外加封、底面，称为“白摺子”，又称“卷子格”。读书人在“十年寒窗”时，就经常练写“卷子格”了。因为考卷并没有格，而且纸张厚，平时就要用“七度纸”或“表芯纸”等很粗糙的纸，不用格子、练习写。以免临试写“白摺子”写不整齐，甚至因纸厚而写不上去。另外就是要练习挖补，“白摺子”纸厚能补。要补得不“显眼”，必须先将错字挖掉，再将空洞四周轻轻刮薄；准备补的一块纸，色泽要与白摺子完全一样，最好在白摺子本身夹缝中取。将其四周刮薄，然后将它用极稀的浆糊粘上去。这样挖补，往往天衣无缝，在日光下也照不出来。为了挖补，故小刀浆糊，是考篮中的必备之物。

考生陆续交卷出场，阅卷官员将评阅的试卷进行汇总，由学政最后核定名次。考卷都是弥封着的。揭晓则鸣炮，大开正门。时在半夜，巨烛高烧，当众将第十一名起试卷，拆去弥封，于大红上填写名次姓名。最后才填写第十名至第一名。在放炮开正门时，考棚门外已麇集了府属各县吏役及专门跑腿报喜的人，抄到名单，立即分赴考生金坛寓所，并连夜奔赴原县到各家报喜，索取赏钱。我童年看到一些人家庭里还贴着红纸喜报：“捷报贵府（官讳）某某老爷第××名入庠……”，后面还有预祝“高中连元”、“位列三台”之类的吉利话。这时科举已停止二十多年，红纸已成淡黄色，

这些人还不肯洗刷掉。由于填写的名次是前十名放在后面，到最后才是第一名。所以一般考生父兄的心理状态是：既盼望早得佳音，又希望不要报得过早。

童子试录取和名次的公布，不叫“发榜”，而称为“发案”。第一名称为“案首”，互相之间的关系称为“同案”，看榜自然也称为“看案”。凡案上有名的，就称是“入庠”了，而称为“庠生”，俗称为“入学”。“庠”就是学校，来源于《孟子·梁惠王上》“谨庠序之教”，《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可见“庠”和“序”、“学”、“校”都是为了“教”；“入庠”也就是考取了学校，有在“县学”里读书的资格了。“入学”以后，就可领取为数不多的“膏火费”，总算吃到公家的米粟了。所以“入学”又称“食饩”；“饩”是禾米之意。“县学”又称“学宫”。在供奉孔子的圣庙内，设有学官，称做“教谕”或“训导”，管理学宫、庠生及有关“教”、“学”的事，一般都尊称为学老师。“庠生”就是学生。庠生在对学老师以及各级官吏谈话、或迎送呈文时，自称“生员”。如别人为庠生祝寿，贺诗以及死后讣告、作传等，则称“国学生”，似有国家学生之意。但如在其“入学”时的皇帝已死，则称为“太学生”。又因为“县学”和“孔庙”基本上是一回事，而孔庙前有一个相当大的“泮池”，故孔庙又称“泮宫”，“入庠”又称“入泮”。有些“入泮”的读书人，经过了一个花甲——六十年，这时大多年逾八十，总要大事庆祝一番，叫作“重游泮水”。

“入学”后，一般称为秀才；但在清朝制度及正式文献上，并无“秀才”之称。“秀才”是汉朝荐举科目之一，唐

有秀才科，后渐废去，成为对一般儒生的泛称；旧时一般习惯，欢喜以古名相称表示尊重，于是“秀才”成了“进学”、“入庠”等相同的名词，而非原来的性质了。

“进学”、“入庠”、“庠生”、“生员”、“国学生”等等，都是入学当学生，还算不上正式功名。所以不算“发榜”而是“发案”，不算为“中”或“中秀才”，而称为“进学”。它和再进一步的“中举人”、“中进士”，“点翰林”，是大为不同的。中了举人、进士，点翰林，虽还有继续读书求学的涵义和要求，但已算正式功名，遇机时可以放正印官，被委派要差，并可以藉此争取较高“品级”，逐步高升了。如果是一介生员，入了仕途，只能当“佐杂官”，叙一个“从（读如仲）九品”，甚而是“未入流”（即够不上叙品级之意）。然而秀才如能“出贡”（后面另段说明），那就不同。此外如遇到“保案”，即遇到某些特殊政治事件，可由大吏凭“关系”列入有功人员名单，保请奖励；或是按例缴上一笔银子，拿钱买官做，谓之“捐班”。当然，这种出身，即使做了官，也总是为世人所瞧不起的。

“进学”当员生，虽然算不上正式功名，但它是读书人“锦绣前程”中最基础、最关键的一步，是必须竭尽全力来逾越的第一关。不但想中举人、进士必须先“进学”，即使不再进取，也必须“进学”才能算为“儒人”、“士子”。士子至不济时，可以当教书匠。进学后，可以用红纸写上“某经塾”。收取束修——学费也可以从丰。未进学的童生，“童子试”一关过不去，生员的资格都没有，就不能称“士”称“儒”，算不得读书人。教读，只能称为“蒙塾”，教几个识方块字的蒙童。特别是每年春秋两季祭祀孔子，因为不曾“入泮”，进不了孔庙门，不能参加“祀孔”大典，更

谈不到“分胙”——分享祭祀的牛、猪、羊肉。在那尊孔重儒的社会里，这对于童生们是难于忍受的。我在童年听到金坛考棚发案时有一付对联，形容考生们的心理，其文如下：

“新秀才，穿几件华丽衣裳，进东辕门看案，
恭喜！老童生，扛一个碌碡行李，踅北水关下船，
举哀！”

那时金坛考棚是学台的官衙，发的“案”，就张贴在东辕门里。北水关是金坛的一个码头，考生们于此上下船。上联形容少年秀才，在寓所接到喜报之后，特再去看“案”，互相道贺的得意之色；而下联则刻画屡试不售的老年童生，无精打彩，黯然神伤，流泪上船，终于放声大哭的悲惨情景。

“入学”之后，可以择日“开贺”。一般亲友都得赠现金作“贺仪”，少的四百文、六百文制钱，多的八两、十两纹银，还有特殊厚赠的。一次开贺，往往可以偿清十年寒窗的陈债，甚而可以储积若干时期的生活费用。有的绅富子弟“开贺”，意非敛财，也大事铺张，借以夸耀乡里。

入学以后，如熬到相当资格而且有相当应付能力，经学老师的选拔或考试，可以“补廪”，而称为“廪生”。廪生不似普通秀才，只享用那末一点点膏火费。他按月可领“廪米”和鱼、肉，是给作伙食的，称为“廪膳”，故又称为“廪膳生员”。这条头衔，比一般“庠生”、“生员”好听多了，似乎是秀才中的骨干。他们遇事发表意见，有一定的影响；如向各级官吏有所干求，也较易达到目的。此外，“学里”（指学宫里）和社会上某些事，须廪生担保。特别是前面提到过的，府考时防止童生“冒籍”，必须取具“廪保”。廪生办理保结，本属应尽义务；但对于富家子弟则是有价

的。尤其是对一些“暴发户”子弟，往往讨价还价，多时竟可得数百两纹银。这些事纵然被学老师或府县所知，往往不加干涉，甚而有时还予以支持。

庠生在每届府考，都有一定的名额。以后如认为“遗才”可惜，于正额之外再增加若干名额，称为“增广生员”，简称“增生”。以后，又于正额、增额之外，认为文章合格的，亦可录取，于发案时附于增额之后，不限名额，谓之“附学生员”，简称“附生”。正额录取的“庠生”和“增生”、“附生”，同样都是县学生员，没有什么区别。

三、举人和五贡

取得了生员资格，就可以参加“乡试”。但有的人无意功名，或侥幸入泮，于愿已足，不再存奢望，所以生员去“考举”的不是很多。据说：考举的文章和进学时不同，文路、气势大有区别，主试人员的取舍标准各异。进学的文章考举时可能被摒弃，而“中举”的文章在童子试中也可能碰壁。

“考举”，就是参加争取得到“举人”功名的考试，叫做“乡试”。“乡试”以省区为范围，考试地点在省会所在地。江苏的乡试在南京。但江苏情况特殊，清初江苏和安徽未划分两省，统称江南省；在划分两省之后，“乡试”仍合并在南京举行，称为“江南乡试”。那时江苏辖区还包括目前的上海市。乡试的场所称作“贡院”，因为选拔的“举人”，是贡举给皇上的人才。南京贡院位于现在的北京东路。国民党统治时期，曾为考试院所在地，今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即其旧址。一说在建康路夫子庙附近，现在那里还有一条贡院街，还有上江考棚及下江考棚等地名。

乡试一般三年举行一次，考期在八月，分三场。由朝廷

钦派“主考”主持，而以巡抚为“监临”。“监临”对贡院内外有监督的职责，而实则协助主考处理一切事务。主考是临时钦派，不免人地生疏。主考到后，要和总督、巡抚商调一些知县级以上、科举出身而有文名的为同考官，让他们分房帮同阅卷，故又称“房官”。主考和同考官都要先期住进贡院，称为“入闱”。“闱”，就是考场。乡试一般在秋天举行，故称为“秋闱”。主考、同考官将考生点名入闱后，同样封锁严密，和外间隔绝。除试八股文，试贴诗外，还加试一或两道“策问”。

生员陆续交卷出闱，即将试卷陆续分送各房官评阅。会试、乡试的试卷，不仅弥封，并有专人全部重行誊录一遍，以防以笔迹私通关节。房官将认为合格的荐交主考，称为“荐卷”。其不合格的放置一旁，称为“落卷”。最后，由主考核定名次，公开拆封填榜。由于眼光的不同，考官之间往往为一本试卷之取舍或名次之高低，争论不休，外间亦时有所闻。在会试和乡试时，虽然试卷弥封，不知姓名，但因考官和得中的人，同样有师生的名份，故常常揣测文章的笔路、风格，确认为某某有才名者的手笔，而希望能够网罗到自己门下，这就是他们争执的主要原因。

乡试榜上有名的，称为“中式”俗称“中举”，也就是成为“举人”了。乡试发榜原来称为“发解”，故榜上第一名举人称为“解元”，所有的举人都称为“及第”。“第”字的含义，有名次之义，也就是榜上有名次了。榜上无名，则称为“落榜”或“落第”。所以“中”、“中式”、“及第”、“榜”以至“落榜”、“落第”等，都要乡试以上才能用。所以，“不第秀才”一词，是指未能“中举”的秀才而言。

乡试放榜时，应试的秀才都在静候佳音，而送大红捷报来报喜的，自然又较进学时为热闹了。第二天，由封疆大吏——总督或巡抚代表朝廷大开宴席，宴请主考、同考官和全体新举人。大宴需奏乐，宴请新举人照例是奏《诗经》中的《鹿鸣》之章，故称为《鹿鸣宴》。中举六十年的，有隆重庆祝“重宴鹿鸣”的习俗。

赴“鹿鸣宴”时，主考是全体新举人的老师，称为“座师”；而分房荐卷的同考官，则是被荐举人的“房师”。新举人不仅要拜谒座师，还要分别拜谒各自的房师。终身的师生关系自兹确定。接着，分别登门叩拜、请训，喜气洋洋地着实热闹一个时期。同榜的互称“同年”、“年兄”，也要来往酬酢，更增加了繁忙。新举人家中早接到喜报了，等待新举人回家庆贺父母，祭告祖宗。在前清，对每一功名、官职，都喜采用古称。兵部侍郎称为司马，尚书称为大司马，藩台称为方伯，道台称为观察，知府称为太守；举人也不例外，被尊称为“孝廉”或“孝廉公”。一称“孝廉公”，则身价陡增，连家门、宗祠都为之“增辉”。

乡试发榜，中式的举人是有定额的。以后，感到落选生员中尚有被遗漏的人才，于是规定在正榜之外，录取若干名另立副榜，称为“副榜贡生”，简称“副贡”或“副榜”。有些记载说：“某应乡试，击中副车”，即中“副贡”，以后也称“副车”。所谓“贡”既是指贡举给皇上的人才。因而，“贡生”虽因属副榜而不同于举人，但较生员已升了级，并且可以和举人一样参加会试，不需再应乡试。

有了“贡生”制度，陆续又增加了“岁贡”、“拔贡”、“恩贡”、“优贡”和“副贡”。每年从府、州、县学选送的为岁贡；每三年由各省学政从儒学生员中考选一次的为优

贡；遇皇室庆典而加贡一次的为恩贡；每十二年一次，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的为拔贡。拔贡规定每府学二名，州、县各一名。

以上五种贡生为正途，名目虽略有不同，而资格一样，具有次于举人的正式功名，可以参加会试，也可以做知县之类的七品正印官。

此外，还有不经考选而由生员援例捐纳的为例贡，但不算正途。

四、进士和翰林

乡试是每隔三年秋季举行一次，称为“秋闱”；次年春季即举行“会试”，称为“春闱”。全国各省新老举人，相率赴京参加会试。有些评书、戏曲中，总喜描述“大比之年，晋京赶考”的艳遇，这个“大比之年”就是每三年一次的“春闱”。春闱会试，由礼部主办，故又称“部试”。由皇上钦派尚书、侍郎以上的大臣为“总裁”、“副总裁”，亦称“大主考”、“副主考”。另由各部衙门保送科举出身的人员，由内阁汇总奏请钦派为“同考官”。发榜后，榜上有名就是“贡士”，意为贡举的人才。榜上的第一名，则称为“会元”。

会试后，接着举行“殿试”。“殿试”是皇上在保和殿对新科贡士进行的考试。考试时限规定自辰至酉六个时辰，约十二小时。到时不交卷，就要“抢卷”。这回，不考八股题了，而是考两道策问，叫做“大廷对策”。殿试中，对腾抄格式非常严格，必须每一行都写满。因为是“对策”，涉及到“皇上”、“圣明”等字样又必须抬头，而空格必须填满，故文字方面更多叠床架屋。但，殿试对于文字的要求不高，只要没有大毛病就行。特别注意的是，字迹要求写得乌

黑、方正、光洁，大小一律，此种楷书叫做馆阁体。殿试是由皇上主考，另于尚书、侍郎中钦派十名阅卷大臣评阅。先由这些大臣阅卷，然后将拟定的录取名单和名次送给皇上钦定。所有试卷和“会试”、“乡试”一样，都是弥封着的。考其用意，无非是防止舞弊。到了送卷给皇帝看，以皇上之尊，不用防这些了；就将前十名拆封，让皇上用红笔象征性地点上一点并标上名次，这就叫作“钦点”。皇帝一般总是照例顺序点下去。但也有例外，因为常有名气已为皇帝所知的人所作考卷在内。皇权是无限的，他可以自己的好恶来随意变更名次。据说：某一科殿试中，皇上看到十名内有一个会元，将这个会元提为状元。这是因为，连中两“元”，当今就可被称作“太平盛世”。道光年间镇江中状元的李承霖，原由阅卷大臣们拟定为第十名，时逢十几省大旱，那几天开始降雨，皇帝看了这“承霖”二字，龙颜大悦，大雨为霖嘛，他认为“承霖”二字上应天象，就将李提为头名状元。这个故事，镇江很多老年人都知道。

不仅无上至尊的皇上可以随意变更、取舍，就是阅卷大臣也可运用其权力，对某一应考者予以特殊照顾。清末曾任两湖、两广和两江总督近三十年的张之洞，少年就有才名，朝野皆知。据说张之洞十岁时就能诗善文，十三岁即为名胜作碑记，十六岁应乡试中了解元。可是会试时落了榜，到了下一科会试才中了贡士。他殿试时，虽然写卷随意抬头，不管空格，而且考到天黑尚未完卷，并没有照规定“抢卷”。张虽未违规点烛，而十个阅卷大臣，都先后燃起他们抽水烟用的“媒子”（用纸捻成的）为他照明写完。放榜时，高中了第三名“探花”。这可以说是皇上和阅卷大臣都“心有灵犀一点通”，其原因在于张之洞的才名起了作用，天子和大

臣都想沽名钓誉，收一个才子门生。

殿试的唱名填榜，叫作“传胪”第一、二、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称为“一甲进士”。一甲限三名，“赐进士及第”。另取若干名（一般一、二十名）称“二甲进士”，“赐进士出身”。二甲进士的第一名，也通称“传胪”。三甲均“赐同进士出身”。这个“传胪榜”又称金榜。“金榜题名”，为旧时读书人最得意之事。“一甲进士”又称“鼎甲”。一甲和二甲同进翰林院，故都称“翰林”。因为是御策钦点的。是“天子门生”，故称“点状元”、“点翰林”而不说“中”或“中式”。“三甲进士”则只称“进士”。

翰林院是清代封建社会里的一座清贵衙门，又是一座崇高的“学府”。翰林院的职掌，是有变化的。有时“侍值禁廷，专司制诰”，有时“掌秘书著作”，有时让它“专以处文学之士”，有时还管史馆之事。院内藏书很多，翰林们在里面可涉览秘籍，所以翰林是既做官、又做学问。点了新科翰林之后，照例状元授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予“翰林院编修”；二甲进士则分别授予“翰林院检讨”和“翰林院庶吉士”的官名。其实翰林院主要的官是“掌院学士”以及“侍读”、“侍讲”。这些新科翰林，无非照例上上衙门、读读书史而已。

由于翰林院曾掌管过史馆的事，故也以古官名尊称翰林为“太史”，“太史公”，又称为“词林”。状元是殿试时取得的，故又称为“殿元”、“廷魁”；因授职“修撰”，又称为“殿撰”，“殿撰公”。在传胪以后，皇上照例赐宴，以示恩荣，叫作“琼林宴”（宋朝曾赐宴进士于琼林苑，以后沿用了这个典故）琼林宴也命阅卷大臣和三甲进士参加，

故凡中进士后过了六十年，就更要大庆祝其“重宴琼林”了。

童生考秀才，和以后乡试、会试，如这科落选，可以下科再考。殿试则只能参加一次，新科进士如点不了翰林，就以“赐同进士出身”定终身。乡试，会试接连中式，称做“连捷”，在名利场中这样顺利是很少的。有人“屡试不第”、“春闱屡罢”，常常归罪于“命”，所谓“文章憎命达”。也有人隔一科、几科又“中”了，认为是“时来运转”。过去士子往往迷信星相，求神问卜，其实主要是有没有遇到“伯乐”的问题。如前面所举的探花张之洞，上一科会试，卷子分到同考官范鸣和房内，范大为赞赏，一再向总裁推荐，都遭到拒绝。等揭晓折封后，才知这落卷是才子张之洞的，已无可奈何了。到下一科会试，范鸣和仍当同考官，张之洞的试卷又分到范的房内，被荐上来中了进士，接着殿试点了探花。

谈到“连捷”，镇江状元李承霖的际遇很特殊。他年近五十时还是一个老童生，那年初秋侥幸进了学，算是生员了。碰巧这年庆典，特开恩科，李承霖赶去南京应乡试，中了举。如非恩科，至少应到第二年秋天才能赶乡试的。第二年春闱，他赶往北京参加会试，“连捷”成为贡士；殿试又意外地点了状元。计算由童生连闯四关而点元，不过八个月。据说这在明清两朝，没有第二人。其友人贺诗中有一联：“读书四十年，发达八个月”，确属写实。

殿试落选，不能金榜题名，进不了翰林院，中了一个“三甲进士”，还被认为是件遗憾的事。特别是“赐同进士出身”的一个“同”字，含有并非正式之意。有人将“同进士”和“如夫人”作对，令人颇感难堪。然而这个“同进士”又

少它不得，不仅能陪着三鼎甲和翰林们参加琼林宴，而且对于在世时的升官，身死后的哀荣，有极大关系。清朝制度，

“保案”保举升迁的官吏和拿银子买官的“捐班”，官作得再大，不是进士出身就不能入阁拜相。这个进士出身，是包括三甲在内的。所谓入阁，就是特旨加上“文华殿”、“武英殿”、“保和殿”等大学士衔，虽不一定有实权，但可入阁为宰相，可以尊称“阁老”。如本职是尚书，可称“阁部”。如是外官总督，可称“阁督”。这对于热中宦途人，是感到无比尊荣的。我幼时听说左宗棠在参与扼杀太平天国以后，升了总督，并封了爵。他忽然上了一个奏摺，要求开去本兼各职，让他回家读书。慈禧太后知道左宗棠是以举人从戎起家的，明白了他这一奏摺的真实用意。于是下诏挽留慰勉，并以他的功勋，特旨“赐进士出身”。不久，又诏加“东阁大学士”，满足了左宗棠名位上可以入阁拜相的虚荣心。此后，僚属们都尊称左宗棠为“阁爵督”，左也志得意满，不再辞职。

谈到死后哀荣，清制：对于大臣死后，都要照例“赐谥”。赐谥的两个字如何选择，有其规定的标准。如：不是进士出身，就不得用“文”字；不是死难，不得用“节”、

“烈”等字。一些自觉位极人臣、功勋一世的人，不仅生前要高官厚禄，死后也希望挣到一个“文”字的谥法，对于家祠、墓碑，都可增加不小的光荣。左宗棠死后不是赐谥“文襄”吗，如不是争来一个“外块”进士，就不可能用这“文”字。那比之死他前面的曾国藩谥“文正”，和死在他后面的李鸿章谥“文忠”，岂不难堪？

科举时代，说读书人做官要花“十年寒窗”的功夫，并不确切。如在十五六岁进学，是极个别的，则读书已达十

年；还要苦读几年，去应乡试、会试，就超过十年。少年科名如张之洞，十六岁中了解元，但未能连捷，再读书几年到二十岁点探花。所以，张之洞是做官较早的，也化了十五年“寒窗”功夫。李承霖，则是化了四十年“寒窗”功夫。这两个，是成功的例子。更多的是几十年“寒窗”，仅仅博得一名秀才；甚而读书到老，“皓首穷经”，还是一个老童生。明清两朝，就以这种科举制度、八股文章统治、束缚了知识分子达五百多年之久，使原来早就有四大发明，科学技术居于世界前列的我们祖国，大大地落后了。解放前近百年，我国遭到列强欺凌、处处挨打，究其原由。也与科举制度有关。几百年来，千千万万知识分子，都被这四书、墨卷束缚、糟塌了终身。他们为了博取功名，飞黄腾达，拼命用功揣摩，做好“三篇文章一首诗，”以作为达此目的的手段。在此条件下，能有多少人去钻研科技知识，以振兴国家呢？

“三篇文章一首诗”，虽然华而不实，堆砌词藻，却不是唾手可得，必须花费气力，挖空心思才能写得出来。举一个年幼所闻的事实：有一次会试的《四书》，是《论语》卷九“子路从而后一章”，由于子路找不到孔子，向一位丈人问路时，碰了钉子，子路却不失礼貌地拱手而立。丈人请子路到家里留住了一宿，杀鸡做饭招待，还将两个儿子介绍见了面。第二天，子路找到了孔子汇报了这些情况。孔子认为这丈人是一位有道德的隐士，叫子路再去访问，但丈人已躲起来了。一位应试的举子，用几股文字描写这一经过，绘声绘色，淋漓尽致，得到主试者欣赏。文中特别有这样几句：

“两槐夹道，古井依然；成福成童，而今安在”？写得有情有景，既知道通往丈人住宅的道路上有许多槐树，道旁有一口古井；而且记得丈人的两个儿子的名字叫成福、成童。考

官以为这位举子一定看了不少书，博学多才，就将其高中了。及至以后拜老师时闲谈，考官问其根据，回答是“想当然耳”原来是凭空捏造的！于此可知，科举文章要花费心机，但无关实际知识，更谈不上有益于国计民生了。

为了功名利禄，就得毕生致力于八股文章。有些人家，“士之子，恒为士”，是“书香门第”。由于家庭条件和人为的努力，科名当然就易集中于这些人。地域也是如此，中式的进士、翰林以至鼎甲，南方多于北方。南方之中，又以江苏、浙江、福建几省为多。其中，以江苏为最，江苏又以苏州为多。清初自顺治三年（1646）开科取士，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止科举的二百五十九年间，正科三年应为八十四或八十五科状元，加上恩科，共有九十七个状元；其中，江苏占了五十五个，苏州又独占十五个之多。鼎甲最盛者，莫过于溧阳史氏。史家自康熙年间起，祖孙、父子、姑侄、翁婿、甥舅均是翰林。前面说的金坛人文华殿大学士于敏中，就是史家外甥。

幼年还听到过几付夸耀功名鼎盛的对联，至今记忆犹新：

“鼎甲不难，难在三男三鼎甲；词林非贵，贵为五婿五词林。”

“教子有遗经，诗、书、易、春秋、礼记；传家无别业，解、会、状、榜眼、探花”。

“一代不如一代，状元、榜眼、探花；后人胜似前人，侍郎、尚书、宰相。”

这三付对联，据说是当时悬挂在苏州某姓宗祠里的，其踌躇满志、洋洋得意的心情，真是跃然纸上。但是，看不出一字一词是关系到治国平天下的。宰相高第、圣人之徒的儒

家，原来竟是这副本相。

翰林院首脑是掌院学士，地位崇高，是阁相至少是尚书一级人物。侍读、侍讲，则至少侍郎一级，往往由于为皇帝或太子讲课，钦派为太傅。而新科状元和翰林们的头衔——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实际上还是以读书为主。每到三年，有“散馆”的规定，并举行“散馆”考试即“廷试”。

“散馆”后，又可接纳新科翰林。散馆考试等于一次殿试，由皇上主考，在保和殿或其他殿角举行。试后不发榜、不定名次，只以皇上的好恶派差或任官。有的仍在翰林院任编修、修撰以至侍讲学士或任御史、部郎中等，也有外放知府官的。一些才名较大，地位较高，为皇上欢喜的或原来的鼎甲，很多钦派一任学政。如镇江状元李承霖，放过两广学政；苏州状元曾带着爱妾赛金花出使过英、法、德、俄等国的洪钧，也放过某省学政。学政的地位较高，尽管三年任满后可能任督抚下属的司道（即藩台、臬台等），但学政的地位是和督抚平行的。学政任满后，很多由司道过班，不久可任巡抚、总督，或内转侍郎，就有希望升任尚书、入阁。所以，科举时代的士子，若干年寒窗，加上一关一关的考试，确也饱尝了酸甜苦辣的滋味，但只要进了翰林院，锦绣前程就在望了。

翰林院散馆考试，要出一两道策问、对策。主要看字迹是否工整秀丽，不错不落；其次，要文理通顺。阅卷大臣们根据这两个标准评定，再经皇上看着顺眼就行了。但，要是书写中出了差错，后果就严重了。据传，乾隆朝有一个散馆朝考的翰林，考卷上将“翁仲”误写成“仲翁”。偏偏被乾隆看出来，随即用珠笔批了一首诗：“‘翁仲’如何作‘仲翁’，十年寒窗欠‘夫功’，而今不许作‘林翰’，罚去江南作

‘判通’。”由于应试者无意写颠倒了“翁仲”，无上至高的皇上开个玩笑，也将“功夫”、“翰林”、“通判”颠倒过来，为了押韵，而找到一个“判通”来处罚。于是这个翰林，只好卷起铺盖，去江南（江苏）报到。通判是六品，仅略高于七品的知县，但不是正印官，属于四品知府的佐治人员。通判要求有前程，必须降级干一任知县，才有可能升迁知府。若以通常惯例，翰林散馆，如外放知府，还感到委屈。不过，这个翰林一到江南，不须慢慢候补，立即挂牌放了实缺，自己还加了一对衔牌：“钦命江南通判”。这个级别的小官，竟是“钦命”，成了意外的殊荣。上司们对他如要给以降级、撤换等处分，必须奏准才行。

五、科场舞弊

按理说，科举是为朝廷选拔人才的，同时也是为考核士子们对先师孔子儒道的领会程度。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事，是绝对不许舞弊的。所以规定不管是事前的“私通关节”，当场的“传递消息”、“打枪”等等，一经发觉，处理极为严厉。如属主司的考官舞弊，重则“问斩”，次则“流放”充军。康熙年间江南乡试，正副考左必蕃、赵晋，一个私通关节，一个视而不见，以致有些颇欠文采的官宦子弟高中了。有人做了一付讽刺的对联：“赵子龙一身是胆；左邱明双目无珠”。御史据以参奏，结果赵问斩，左流三千里，还株连了不少人。可见，对科场舞弊处理极严；但，即使这样，也不能杜绝弊端。

据我所闻，最普遍的舞弊行为是“打枪”。一些纨绔子弟，钱多肚里墨水少，又需弄个功名装饰门面，就只有花钱买了。于是“枪手”就有了价格。买秀才的人不仅要给“枪手”钱；未入场前，先要取得廪生的保结，入场后还要招呼

执事、书吏（场内办事员工）才能协助和传递，这都必须花钱。“枪手”当然必须也是入场童生，一般要文思敏捷，除自己的文章和诗要缴卷之外，还要为那花花公子包办一套。幼时见父辈称镇江某公为“双料秀才”。因他在一案中自己进了学，还要为另一个“打枪”，也入了庠。请人“打枪”代做文章，誊抄总必须自己动手；偏有一些公子少爷，肚里墨水太少，分辨不清行草书字，又不善于顺文义猜测，以致露出马脚，别字连篇，被贴了卷子，罚停一科、两科考试。某次，某学政见到一卷，通篇文字很好，但有两句不伦不类。文为“二十一日上天，二十一日入土”实在费解。对照上下文，字数又不符合，准备放到落卷里，又实在舍不得。一再推敲研究，原来是“昔_𠂔（贤字的草写）昔圣”四字，因“枪手”起草时，随手将这四字直行书写拉长了，“贤圣”二字又是草书和省写，誊抄时不理解文义，就闹了个大笑话；以致这个可能到手的秀才资格，也“上天入土”了！

考棚、贡院都很大，“枪手”不一定能和他的“买方”在一起。写好诗文稿，总须有人传递，这就要仰仗执事、书吏了。执事、书吏能作传递，这是因为他们在考场里可以到处走动。某学政很懂得这些弊端，命将考棚内各院落的互通门户关闭，执事、书吏分值各处，一概不许串连，他自己终日度着方步，各处巡视。但执事、书吏们想出了一个绝妙办法，竟将“抢稿”用稀浆糊粘在学政的官服后背，由学政度来度去自行传递。弊端之难于杜绝，于此可见一斑。

有一个秀才，多次应过乡试，为别人“打枪”中举，自己则信手写成几百字不可能中的文章交卷，因此出了名。就有不少人及门就读，请他评改文章，收入很不错。他认为自己参加会试不可能，因而也不想中。每次为人打枪，收入至

少五六百两，足够中人之家的几年生活。他对这种平时教读改文章和入闱时“打枪”的“专业”生涯，很满意，不料最后一次进场，独具慧眼的主考于落卷中发现一卷，虽寥寥几百字，对题发挥，简练扼要。估计是屡试不第的斲轮老手之作，动了怜才之心，竟将他高中了。捷报传来，他反凄然泪下。因为他自己本已无意于功名，这样反剥夺了他再入秋闱的资格，那个“枪手”专业无法继续下去了。

其实，主持乡试、童子试的主考学政们，对于打枪、私通关节这些事，只要没人控诉、揭发，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不加追究。也有冒名顶替入场代考的，虽是极其个别的事，如被查获，则处理极严。至于考官收贿舞弊，那就必被参奏，成为钦办大案。

六、废科举以后

1905年科举废止后，获得科举功名的人，仍然保持其社会影响。过去的翰林、进士，大都做过高官、享有盛名，宦囊充裕，腰缠百万，他们以遗老姿态，麀集在北京、天津、上海、苏、杭等名城，过着“名流”的寓公生活。即使宦途不畅，无甚积蓄的人，以其能文善书和科场中的名气，为人写画扇面、对联、立轴、中堂，也可维持中人以上生活。一些富商大贾，沽名钓誉，往往拜求他们为活人作寿，为死人立碑传，索取他们的文墨，动辄以千元计酬。三十年代上海“闻人”黄金荣建“四教堂”，杜月笙造“杜祠”，都用了极丰厚的“墨敬”，请当时的翰林、进士为作碑记。上海有名的大财主犹太人哈同死时，他的老婆罗迦陵和总管家姬觉弥，大办丧事，请了许多名流致送挽联、祭帐，都是不惜工本，重金礼聘。还异想天开，模仿旧官场举行了“题主”仪式，邀请上海寓公、清代末科状元刘春霖为“题主官”，四

位遗老翰林为“襄礼官”。所谓“题主”又称“点主”，是死者亲属准备送进祠堂的“木主”，上写某官，某某公或某某夫人之神主，但“主”字的一点不写，成了“神王”，这一点要请有地位的人为“题主官”，在四个“襄礼官”的陪侍下，由主官用珠笔在“神王”的王字上补上一“点”。这场五分钟的“题主”仪式就算完成。“题主官”只在木牌加了一点，就得了“席敬”四千元。四位“襄礼官”各二千元。更离奇的是这“五官”和执事人等都穿上清朝官服，还要用旧制绿呢八抬大轿接送，配上旗、锣、伞、扇，抬摇过市，煞是一副复辟的架势。“五官”的官服是新制的，有些龙眼、杂物一时筹集不合，临时不得不向戏班、庙宇租用，从富贵人的阔气之中，又现出了狼狈的封建末路本相。

至于只是进了学的秀才们，就大不相同了。他们没有能猎取到较高科第，当然就当不上高官。他们人数很多，遍及全国各地。有的结交官府，鱼肉乡民成为土豪劣绅；有的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温饱，劳碌一生。其中也有个别的秀才，成为封建阶级的叛臣孽子，对革命事业作出贡献。以镇江而言，如秀才赵声（字伯先），曾任教两江师范，参加并领导了辛亥革命，是有名的黄花岗之役的组织者和领导人。还有人对近代学术作出了一定贡献。如《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又是研究甲骨文的鼻祖，编了第一部专著《铁云藏龟》。又如贡生陈庆年，曾任江南通志局总纂、长江图书馆监督、湖南全省学务处提调（相当教育厅长）、江南图书馆坐办；对经学、史学的研究，均颇有成就，著书、校籍千馀卷，为海内所知名。贡生杨邦彦，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为辛亥光复镇江的领导人之一。他还在两江师范任教，并任镇江府中学堂监学（相当校长）；又编纂了《丹徒县续志》。秀

才唐邦治（原籍丹阳，世居镇江）曾任清史馆协修，潜心研究舆地、清史，著作十余种。秀才柳诒征，先后担任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女子大学等校教职数十年，又担任江苏国学图书馆馆长二十年，为知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图书馆事业专家。

但是取得成就的清末秀才，毕竟极少。大多数秀才士子，有的在旧政府机关中任职，有的以“舌耕”为生。民国初年，学校极少，很多当了私塾先生，也有的当了中小学教师，以维持生活。我回忆在私塾及中、小学时代的老师中，为清末秀才的就有十一位之多。

随着时光的消逝，只减不增的秀才，愈来愈少了。到解放时，距废科举已半个世纪，秀才更成了凤毛麟角。我所知道的，只有五十年代任镇江市人民代表的唐子均，六十年代任镇江市人民代表的鲍敦典、吴次藩（原籍淮安），任市政协委员的王凝庶、李正学几人而已。李正学曾在1964年为其“重游泮水”征诗，1966年又为八十寿辰征诗。据他谈，是废科举以前最后一科进学，而年纪最轻的秀才。他于1967年去世，这可能是镇江秀才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了。

（本文承唐坦、陶成章两位老人修饰、订正，特此致谢。）

句容农民庚戌暴动目击记

严企光遗稿

“句容钥匙广东锁”

远在辛亥革命前的庚戌年间（1910年），句容县曾发生一场数万农民的大暴动。这场暴动连续爆发两次，声势浩大，行动迅猛，震惊东南，大快人心，狠狠打击了官府和豪绅，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次年三月广州黄花岗之役兴，十月武昌起义成功，星火燎原，民国成立；当时曾有“句容钥匙广东锁”之谚，说明了这场大暴动有深远的革命影响，是中国近代农民革命史上的光辉一页。可惜事隔五十余年，文献难徵，故老凋零，难以备述暴动的全貌。笔者当年十二岁，在官立高等小学二年级读书，亲身目睹，印象犹存，现将记忆所及，书其概略，以补史之不足，使这一伟大的农民革命史实不致久湮而无闻。

“谷为绅董积，粮是官吏财”

那年久旱不雨，农民要分“积谷”，以济燃眉。但在绅董把持下，官府不仅不允所请，还悍然提前开征下忙钱粮，因而激起四乡农民的愤怒，一声号召，揭竿而起，酿成了两次暴动。但这不过是导火线，主要原因还不止于此。

首先，清末各县粮赋方面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已达极端。如句容田赋，除上下忙漕米正税外，又有警团积谷、水利、自治教育等捐。特别苛重的是“上下忙银”（钱税名称，以银两为计算单位）、“漕米”（以米谷为计算单位，实际仍是按价以钱币缴纳）。不论是银是米，均凭官府粮柜和管

乡农书任意计算，七绕八转，层层剥削；再加地方税重重附加，甚至附税超过了正税，弊窦无穷。每亩田地要缴多少钱税，怎样算法，谁也搞不清楚。农民对此久有怨恨。宣统元年，曾因要办有名无实的地方自治，每亩带征二分自治亩捐。按当时句容田地约在五十万亩，每年就要征收一万元以上，全为城乡各绅董经手瓜分，农民更为不满。

据过去曾在粮柜工作的人谈，清末句容田地山荡已有五十万亩，上下忙每忙每亩缴银三分五厘七毫，要二十八亩田才完一两银子。当时银价不过每两一元半左右，每亩每忙只要缴纳五六分钱，“山荡地”，还要少到半折以下。句容县是普灾县份，每年山圩田地多少有点灾，还须扣灾，完银就更少了。但是实际上，“上下忙银”除正税外，还有附税、征收费，每两忙银要银币二元一角三分。各项亩捐尚不在内。银价既高，附加又多，农民交忙银，每亩每忙至少要缴到一角五六分以上，这就使附税大大超过正税。漕米也是同样情况，每亩收税是三升一合六勺，每石米折银币五元二角，而农民每亩田须缴三角以上。不论是忙是漕，反正一幅黑幕，是封建时代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吮吸农民膏血的导管。

不说别的，全县靠田赋吃饭的就有好几百人。句容有十六乡，在粮柜上就有十六个管乡书，上面还有个“漕总”，总管粮赋，直接于钱谷师爷管辖之下。每乡有十三个正图（副图还不在于内），这就有二百多个“图长”。与此相等，就有二百多个代农民完粮的“农书”。此外，每一图还有一个“县年”（值年办事的人，每年轮换）。在粮柜上更有数十个粮差（据传最多时达112人），他们一张差票到手，顿时如狼似虎，蜂涌下乡，真是“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

闹得鸡犬不宁。受害者多属贫苦农民，地主富农则自有取巧规避之术。至于上面所说的“农书”，歹劣之徒混迹其间者甚多。太平天国军兴后，句容曾被清军长期残酷搜括，弄得十室九空。事平之后，逃亡者相率归来，官府乃划分乡图，指定一些农村知书会算的人当“农书”，报垦完粮等事，由农民按亩给工食，每年每图可得二、三十千文。年代积久，竟逐渐变成了“农书”们的私产，自由买卖图份的农书，可得几百文，还不是从农民身上吸的血吗？田赋方面的极度盘剥，是农民愤恨的主要原因。

其次，豪绅勾结官府、盗取积谷，是这次大暴动的导火线。当初原系由农民按亩缴稻，实行积谷，后来以为太琐碎复杂，改为积谷捐，由农民缴现金，再由公家买稻存仓。县城内在西门设一总仓，名叫“永丰仓”，是一座长形对合约二十余间瓦房的粮仓，还有晒谷场。我曾亲见的积谷仓，已是一座空仓，颗粒无存。各乡原各有分仓，想也是同样情况。按制，积谷是专款存储，官府只监督而不干涉，完全由地方人董其事。恰好句容的一个总董和九个城乡董事（行政区域分一市八乡），就成为管理积谷的首脑，怎不养得他们脑满肠肥？初还真实积谷，董事们不过在购稻、换稻（每年糶陈换新）等损耗上做花样。其后，愈翻愈少，愈耗愈多，到了宣统年间，索性变得“积谷仓内无积谷”，积谷款子都给官吏绅董上下其手，朋分干净；稍有势力的士绅虽非积谷董事，也得分一杯羹。所以当年乡间曾流传着：“谷为绅董积，粮为官吏财”的谚语，农民愤恨非止一日。恰逢这年夏天久旱未雨，要分积谷，官府不许，农民忍无可忍，遂掀起扒绅董房子的大暴动。

再次，由于贪官勾结东乡劣绅，圈山卖地，严重损害农

民利益，农民上告无效，激起众怒。这是暴动的另一个触媒剂。这次大暴动为首的就是东乡人。原来东乡下甸镇附近有大片荒山荒地，有个华侨叫梁炳农（祖禄）想在句容投资开垦、造林，兴办实业，通过县官章维钧，勾结了东乡总董陈鹏来、东二乡总董严维清，收买了下甸附近一千多亩荒山荒地，开了一个“暨南林艺公司”（后改为“暨南垦牧公司”）。这位华侨付价是每亩荒山龙洋八元，可是发到农民手里的只有一元，究竟官绅如何朋分，董事对农民又如何欺骗，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黑幕。当梁炳农到句容成约之日，章县令见财神驾到，特别巴结，在南堂巷公馆大张盛筵，用满汉燕席，像接钦差似的恭迎这位贵宾。适本邑青年王厚滋新从日本游学回国，对句容第一个衣锦还乡的留学生，县太爷也优礼看待，列为陪宾。偏巧这两位座上贵客，都是没有辫子的，邑人乡民以为中国人脑袋后不拖“尾巴”还是初见，于是一时观者如堵，途为之塞。从此以后，在公司圈地范围内，竟然不许农民放牛、砍柴和通行。曾经激起众怒，联名告到府县，终以官绅相护，未得胜诉。当年下甸街头就出现过这样的揭帖：“荒地荒山，董事财产；牛不许放，柴不许砍；有朝一日，烧他妈的精光！”足见乡民怨恨之深。同时，南乡浮山脚下，也出现一个“浮麓林艺公司”，是由大乡绅胡景洛（修放）所办，情况类似，范围更大。因此，东乡人是这次暴动的领导人。他们一号召“扒董事的房子”，南乡人首先赞同，其他各乡闻讯响应。一场燎原大火就熊熊燃烧起来。

鸣锣传递“鸡毛信”

宣统二年六月中旬（日期已忘），四乡农民因久旱不雨，请散谷不准，反而传出差追上忙，预征下忙的风声，农

民大愤，就在这时就有两个好汉挺身而出，一是朱荣德，一是戴启禄。

朱荣德，东二乡乌亭子人，时年三十余岁，贫农出身，家仅瘠田数亩，不够生活，由其妻耕种，他却终年交游四方。性好赌博，然为人刚直无私，有任侠之风，讲信义，重然诺，嫉富怜贫。所与往还者多系贫雇农，在此阶层中号召力很大，却从来不屑与官吏绅董接近。虽只读过两年私塾，后来居然能写状子。据说没有一个县官不曾被他告过，其生平痛恨贪官污吏可想而知。年五十余岁在乡病故，现在原籍有一子五孙。

戴启禄，东二乡戴村人，时年三十岁左右，也是贫农，识字不多，与朱荣德性情相投。爽直刚强，胆大而遇事敢出头，在贫苦农民中也很有威望。这一暴动所以能迅猛展开，实为他二人策划号召之力。光复后不久戴即去世，且无后人。

正在四乡苦旱，农民要分积谷而不得、愤恨难平之际，朱、戴二人即先在东二乡的高庙（距城仅二十里），领头召集了一次秘密会议。邀集的对象全是各乡贫下中农村长、积极分子。绅董地富无一参加。连同自愿前往参加的群众，集有三四百人。朱、戴二人跳上了戏台，诉说近年粮赋之重，苛捐杂税之多，积谷之黑暗，有仓而无谷，农民提供的积谷金被董事们吞光了；还讲到东乡乡董勾结侨商，盗卖了大批荒山荒地，农民连放牛割柴的地方都没有了，日子一天天不好过。我们穷人要活命，非闯祸不可；要闯祸就非闯大祸不可。他最后号召说：“积谷分不到，农民活不得，就先扒了城乡董事的房子，不要伤他们的性命。好汉做事一人当，只要穷人活，我们不怕死。”这时台下欢声雷动，一致拥护。

怎样号召广大群众能够迅速集合行动起来呢？就在当天晚上他们想出了一个新鲜的传递方法——“鸣锣传递鸡毛信”，即用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四句话：“一村传一村，一家出一人，各带锄头钉耙，天明赶到城。”另在纸条右边烧去上角（表示急如星火之意），左上角粘插一根鸡毛，分东西南北四路敲着锣传递出去。正如八百里加紧文书一样，不过一天一夜工夫，就传遍了四乡每个角落。（传单可以各村依式仿写。愈传愈多，愈传愈快。）这一天城内市民只闻四乡锣声不绝，不知何事；官府也料不到农民有聚众暴动的胆量，因而毫无防备。

第二天黎明，城中人从睡梦中惊醒，只听四面八方锣声大作，各乡农民肩着锄头、钉耙、镢头，一拥入城，大街小巷，满坑满谷。原来句容城小，在鸡毛信外还有口头号召，离城二十里以内者进城，二十里以外者各就各乡先扒乡董的房子。当时根据各乡报数统计，进城的在两万人以上。锣声震天响，锄耙密如林，真有山岳为摧，风云变色之概。

其时，县官许文浚（号玉农），浙江湖州人，科甲进士出身，来句容是初任。句容人一向把他列为光复前后几十年间的一个“好官”。其实，在封建时代，“天下乌鸦一般黑”，许令官句两三年，所获赃款比那一任都多。单谈辛亥革命军兴后，句容逼近南京，过往军队不绝，供应频繁，两年间的忙漕田赋数十万，上解国库甚微，全报在军事招待费用账上。这一笔浮支数字惊人，谁也无从过问。他有一套手段高明的做官秘诀。一是联络绅董，一是笼络读书人，有时还会施一点小恩小惠，这就把舆论控制住了。譬如，他还亲身担任我小学堂的历史和说文解字教习。时学堂监督（校长）葛宝璋（号子玉）是一个包揽诉讼的绅士，教员亦都是秀

才、廩贡之流，县太爷肯屈尊就教，岂不“于汤有光”。这一回积谷案，他明知积谷为绅董们吞没朋分，无从散放，但不愿得罪绅董；又怕用镇压手段会激起民变，酿成大乱，而丢掉乌纱，生命难保。因闻只扒董事们房子，他既来不及关城，便紧闭了县衙门保卫自己，让农民闹一下，杀杀董事们的威风也好，他采取了先作静观的审慎态度。朱、戴方面，也早已分析了句容的官、绅、民三者之间的矛盾，分清主次，斗争矛头直指朋分侵吞积谷的绅董。初也料不到一昼夜间竟能发动十万之众，（进城虽只两万人，二十里外各乡就地起事的还更多）。这充分证明了封建社会里农民受尽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剥削和压榨，具有很高的革命积极性。

“杀猪宰鹿扒獐窝”

暴动展开了。黎明城门才开，朱、戴二位首脑即随队进城，以东门内茶馆作为临时指挥部。提出的第一个口号“杀猪宰鹿扒獐窝”，“只扒房子不杀人”。接着又发出几个号令，如：“不准进入商店和居民家”，“不许带走一点东西”，“不听到号令不得先出城”，“商店照常开市，百姓照常上街，决无惊扰”等等。其后，中途发生了若干问题，又经决定指示：“祖遗的房子不扒”、“典租的房子不扒”；

“农民轮流到茶馆吃茶给钱，事后总算”，反映了农民的通情达理。正因为这样，运动进行得很顺利，很迅速，很有秩序。不到半天，在城里就扒了三家房子约几十间。

口号上的“猪”是指朱清源（猪朱同音），号怀澄，本籍人，地主官僚家庭，秀才出身，父以历官县宰，致仕后，在籍购置房产田地甚多，并开设兆丰茶叶店、南北货店和酱园，都由朱清源一手经营。朱清源为人极奸险刻薄，公然霸占一个王家花店老板娘，迫使其夫羞愤而卒，堪称恶霸地

主，其时任城厢市积谷董事。他的家店房子，全被扒平。这就是口号上的所谓“杀猪”。

口号上的“鹿”是指骆文凤（鹿骆同音），号桐君，本籍人，仕宦家庭，但本人仅捐了个五品衔的直隶分州同知；盘踞绅董地位，对句容政事、经济具有最高权威，可算得封建土豪劣绅的典型人物。特介绍其生平二三事，藉以揭露土劣之丑恶面貌。其一，他日常生活有个三部曲，几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间，妇孺皆知。清晨，坐自备四人蓝呢大轿，跟班的捧着水烟筒、嗽盂之类，先趋中街王佐茶馆（历史悠久，以长鱼面闻名）吃茶、用早餐。这时请客的、问话的、回事的和请托的便纷至沓来，有势力地位的得陪坐座侧，区区小百姓只垂手立两旁。骆大爷左右逢源，一一接谈，自然惠钞的不乏其人，他只微微点首，不加谦让。重付的呢？三节年终，自有店主登门算还结余，真是妙绝人寰！移时，便登轿上衙，进签押房与大公祖款款密谈，究谈何事？无非同流合污、分赃协作而已。迨诸务完毕，便打轿直趋中街小公馆，由号称“白娘”的姨太太相陪，直待日影西斜，才尽兴回府。一天之中周旋于三种不同的环境，应接三种不同的人物，变换三种不同的面貌。

其二，骆文凤一生并未置田地，不营商业，挥霍的钱财从何而来呢？除广开贿赂外，还有一个“绝招”。专制时代新年期间，官衙封印，商店停市。骆公馆里从除夕起直到二月半止，公然大开赌局。每夜大厅、书房灯烛辉煌，四方赌客，如蝇附膻，大赌大博。在句容城公然开赌，是骆的“禁脔”。后来，把总刘钦伯仗着武力，起而效尤，但号召、场面都比不上他。历任县官对之无可如何，只好置若罔闻。每当夜幕初张，两家门前小贩云集，糖果点心，应有尽有，胜

如市集。其尤甚者，赌场上发行筹码，系特制竹筹，烙有火印，上刻钱数，如五百文、一千文、一元、五元之类，这种筹码在境内商肆买卖，竟然通用，而无敢抗者。这不是信用，而是威力。虽刘把总武官亦尚不能与之争衡。每年这个大赌场（摇滩与牌九两种）不知要抽多少头钱，要破多少人的产业，要害多少人的性命！单就以上两事而言，农民要扒这些豪绅的房子是完全正义的。

口号上的“獐”是指张长华（獐张同音），号萼楼，本籍人，原是秀才出身，后来全家信奉耶稣教，做了浸会堂的传教士。他以教民头衔，包揽诉讼，为句容几个恶讼师之一。此人姘占良家孀妇，谋夺财产，成了一个无恶不作的土劣。当时农民去扒他的房子，正准备动手，忽然发现他的住房是一个寡妇私产，不得不停下手来，只把他的室内家具捣毁一空，临时决定蜂拥到南首马槽巷内的徐萌泉家。

徐萌泉是全县“漕总”，总管粮赋，正是压迫和剥削农民的大头头。为人好摆架子、说大话，浑名“二万”，俨然是腰缠万贯的大富翁。农民接到“扒”的一字口令后，登时排山倒海，万锄并举，扒到中途忽又发现三间大厅确系祖遗老院。于是，保留了三间厅房，但屋瓦已飞，倾斜欲坠，破坏不堪。

当日城内只扒了骆文凤（全县总董）、朱清源、徐萌泉三家及东街浸会堂。各乡原是同时并行，计东乡扒了陈鹏来（一乡乡董）、严维清（二乡乡董）和下甸暨南公司三处房屋。南乡扒了胡景洛（浮麓公司主持人）、陈铸经（南一乡乡董），西乡扒了王大成（乡董）；北乡仅动了北一乡董骆文炳的墙脚，经家属苦求，停手未扒。这一幕大快人心的全武行，于此告终。

四乡被扒的董事中，民愤大的是东乡的陈鹏来，其人横行乡里，有土皇帝之称，威风仅次于骆文凤。其他各董事之劣迹，亦小巫大巫、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而已。

农民扒房子的技术，也很巧妙：先捣毁室内家具器物，次扒屋瓦，再用粗绳扣牢梁柱，千百人如行船背纤似的，“杭呀”几声，全架落地，再拆墙毁脚，直到华屋变成废墟，一砖一木，不堪复用而后已。

“二次会师援朱戴”

从暴动的迅猛展开到胜利结束，扒了城乡绅董的房子，欢呼凯旋以后，沉寂了几天。老奸巨猾的县长许文浚，眼见当前暴动的浪潮汹涌澎湃，清廷政权摇摇欲坠，他尚谙闹事农民的力量不可轻视，只能软化而不能镇压。他也看透了地方上官、绅、民三者的矛盾，只能调和而不能偏激，便采取了“两无损伤、于己有利”的策略。他一面申详上峰，平淡冲和；一面密召绅董集议，痛陈利害，劝各清理积谷，就地安抚。接着府衙回札，着令逮捕首犯，讯明惩办。据说在当时官场公文上，是个例行公事，许令乃即单提朱荣德、戴启禄到案审问一过，钉镣收监而未加刑讯，以示优容。

四乡农民闻讯大愤，激起了二次大暴动。这次场面更大，仍用鸡毛信鸣锣传递方法，齐集县城。东北乡农民到的最多，虽远在五六十里以外的下蜀、龙潭农民，都应召前来。五六万人之众，没有口号，只有一个“释放朱戴”的要求。这次县城里已有戒备，四城门紧闭，农民一个不得入城。有搬木梯爬城的，都被阻拦不得上。农民紧紧将句容城围困了半天，形成僵持局面。

延至下午，许文浚率领了全班文武吏属，亲登北门城楼，向大众发话（其时北门城外拥集的群众最多）、保证：

“第一、清理积谷，集中管理；第二、缓征忙银，暂不差提；第三、朱戴不加罪刑，宽期释放。”群众气势才见松动，但以朱戴未放，目的未达，最后要求和朱戴照面一看。许乃令差弁押着朱戴上城与大众相见，当时朱荣德大声向城下说：“众位乡亲父老们！我们人在牢里心在乡，好汉做事一人当。我们是不怕的，只要大家齐心……”说至此已被牵拽而下。许文浚重复向群众说：“时候不早了，还有离城很远的，赶快回去吧！”至此北乡人群先开始撤退，其他各乡逐渐缓缓四散，县城之围遂解。

许文浚狡猾多端，二次浪潮才过，他星夜电详抚院，陈述农民两次聚众犯城，深恐革命党人混迹其间，省垣咫尺，安全堪虞，请求派兵一营，驻县保卫云云。时两江总督闻电震惊，立调张勋的辫子兵一营，驰赴句容。不多几天，辫子兵居然“呜嘟”的掌着大号，捧着令箭，扛着毛瑟枪，威风凛凛地开入了县城，驻扎在圆照寺。这是他推卸干系，把县城治安责任推到上面去的一个计谋。这一营兵直到次年辛亥革命起义后才狼狽撤走，整驻一年多，供应费不知用去多少。

为首的朱荣德、戴启禄虽然闯了这样大祸，在狱中关了两个多月，未受大苦，就以无罪释放。这个巨大的风暴就此平息。

暴动产生的影响

毫无疑问，这场大暴动是农民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在这场斗争中土豪劣绅被打得头破血流，清朝官府也迫于形势，不得不向农民“让步”，尽管这些被扒倒的房子，后来仍由各乡地主富农们暗中摊费替绅董们重建了。然而，像这样惊天动地的聚众暴动，官府竟然莫敢谁何，四乡贫农也得了一

些积谷。为首的朱、戴安然无恙，无疑地农民是胜利了。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这场斗争不可能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农民未得到多大的真正的实利，也未曾给于贪官污吏以直接打击。在这场斗争后，清理出积谷、存款，被集中到官衙，由积谷改为积金，又被控制在县官手中了，仍然换汤不换药。后来有一个县长李某（名记不清）侵吞积谷金至数万元之巨，交卸后吃了官司，把南京马道街丁姓大公馆东侧，即堆草巷十号（解放前门牌）楼平房约十余间连同花园折价充抵，成为句容会馆之公产，后又拨作旅京同乡会使用，直到南京解放，产权未变。这就说明，吃人的封建制度不推倒，农民是不得翻身，贪官土劣是不会消灭的。

尽管如此，这次暴动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大大鼓舞了东南民气，对次年的广州起义、武昌起义都有一定影响。

作于1964年4月

德兴洲农民抗租事略

张大恒 沈元庆

一九二九年九月，扬中县德兴洲（今新坝乡新生村、新坝村和联合乡红联村一部）的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农民秋收起义的影响下，曾举行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抗镇江金山寺和尚逼租的斗争。

扬中县又名太平洲，是个冲积平原。德兴洲位于太平洲的西北一角，是一块面积两千五百多亩的“底荡田”。德兴洲的田亦称“和尚田”。远在明、清之际，德兴洲归丹徒县管辖，农民得去镇江缴银粮国课。由于交通闭塞，往返要步行一百五十华里。在苦于“纳粮过长江，累死在路旁”的情况下，农民就委托来这里“化缘”的金山寺和尚代缴，年复一年，金山寺认为有利可图，就来德兴洲强行建造庄房二十多间，霸占全洲良田。“祖辈围垦造田，世代耕种，怎么一下子就成了金山寺的呢？”农民做梦也没有想到。于是就去丹徒县府告状，知县查阅档案后，以“只有金山寺纳粮的存根”为由，作了不公正的判决，从此这方土地便成了“和尚田”。这一奇冤使德兴洲家家户户，男女老少无不放声大哭，愤慨天无公理。

德兴洲的农民怎么也忍受不了这口气，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一九一二年春，陈万和等人率领农民发动了第一次斗争，赶走了庄房管家，一把火将庄房烧了。四年后，金山寺勾结官府，以武力为后盾，重建庄房二十余间，继续骑在农民头上，残酷榨取：夏熟每亩收麦租2.5斗，秋熟收稻租8.4

斗，收租时还要过“三关”（筛子漏、风箱过、晒垫照），稍不如意，就是一顿打骂。佛家常说的“慈悲为怀”，连影子都没有！农民说：“踏进庄房门，就象见到二郎神；一担谷子半担回，苦日熬到何年头？”他们不堪压迫和剥削，多次进行反抗，其中最大的一次是一九二九年九月的抗租斗争。

这年夏季，连降暴雨，内涝成灾，致使秋冬“收的稻谷吃不到下霜。”面对此景，老弱忧愁，青壮愤怒；“要求减租”成了农民的共同呼声。大家公推陆厚元、陈世安等人为代表，与庄房留守和尚交涉减租事宜。这个和尚说：“减租是大事，需得方丈同意，小僧无权作主！”拒绝了农民的合理要求。陆、陈等人连夜召集各村代表计议，陆厚元在揭露了金山寺租米重、利息高、迫害农民的罪行后，说：“南方各地农民暴动，痛打了财主老爷，难道我们就不能同和尚斗一下吗？”大家纷纷议论，说：“等金山寺和尚来逼租时和他们斗！”于是决定：一是说理斗争，迫使和尚让步；二是如不答应减租，就撵走和尚，烧掉庄房；并详细讨论了参加斗争的人数、联络信号、行动路线等。会后各村代表在农民中秘密串联，发动大家参加这次斗争。

九月的一天中午，金山寺的五个和尚坐着独轮车来逼租，刚到德兴洲南边的童家桥，就被陆厚元、陈世安等人拦住，控诉了金山寺深重的剥削，叙述了今年歉收，百姓饥寒交迫的悲惨情景，提出了“减租”的强烈要求。和尚不仅拒绝了农民的合理要求，相反恶狠狠地说：“凡耕吾寺田者，均得缴足全租；若少颗粒，必执田也！”陆厚元果断地说：“你们蛮不讲理，莫怪我们无情！”话音刚落，一个农民立刻鸣锣，男女老少三百余人拿着钉耙、锄头、铁叉、木棍等，

齐呼：“和尚不减租，我们不答应！”队伍迅速从东、北、西三路云集童家桥，痛打并赶跑了和尚。

第二天，农民继续进行斗争。正当准备冲击和尚庄房时，金山寺的和尚和一个连军警已经赶到，愤怒的农民以农具为武器，与之搏斗，军警以鸣枪、殴打、分围等办法，驱散暴动的队伍。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之下，农民被迫撤退。接着军警大肆搜捕，六十多人被关进三茅镇监狱。随后，五百多名农民赶至扬中县反动政府门前抗议，高喊：“要求减租无罪，政府关人是残害百姓！”吓得军警束手无策，县官闭门不出。县里一些开明士绅对农民也表同情，主张释放被捕农民，反动政府担心事态扩大，难于收拾，不得不作出了让步，除对陆厚元、陈世安各判三年徒刑外，其余全部释放。

这次德兴洲的农民群众自发的抗租斗争虽然被反动政府镇压下去了，但它在扬中人民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材料系当时参加暴动及被捕的农民陈老四、包吴氏、温祥和、陆国光、陆相春等提供）

伊斯兰教在镇江的传播

伊斯兰教是我国十个少数民族共同信仰的宗教，它对回族的形成和发展有过重大的影响。探明伊斯兰教的传播，是了解回族源流的一把锁钥。本文就是通过志书文献记载和故老传闻，探讨伊斯兰教在镇江传播的一个尝试，并给有志地方宗教史和少数民族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起步的阶梯。

一

伊斯兰教何时传入中国，历来说法不一。史学界过去多以公元651年（唐高宗永徽2年）阿拉伯使节首次来华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我们认为，阿拉伯使节固然信仰伊斯兰教，但使节和传教士究有区别；使节的来朝不等于伊斯兰教的传入。因而，唐高宗永徽二年只能是两国正式通使之年，而不能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

据明人何乔远《闽书·方域志》载：穆罕默德的门徒中有大贤四人，于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来朝，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这个说法，是比较可信的。

唐初，扬州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而镇江位于长江与运河交会处，又与扬州仅一江之隔。二贤进入扬州传教，势必会有阿拉伯人把伊斯兰教带过江，传入镇江。所以，明万历廿四年修的《镇江府志》说：“清真礼拜寺系唐贞观二年始建于仁安坊阜民街，明洪武年间毁后再建。”清光绪五年《丹徒县志》也记载了：“清真寺在城内

剪子巷。唐贞观二年始建于仁安坊阜民街。明万历卅年移此。”这个记载还得到实物的佐证：现在镇江市伊斯兰教协会内还保存了一块明万历丁丑五年进士李一阳石刻，所记的内容与上述志书相当。由此可以肯定：早在唐初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同时，也传入镇江。镇江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最早据点之一。

二

伊斯兰教在我国大规模传播是元代。随着蒙古远征军的东归，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迁入中国。他们和唐宋时期侨居中国而信奉伊斯兰教的大食人、波斯等中亚人的后裔，被统称做“回回”；他们系当时政治地位高于汉人和南人的色目人。

元时来中国的回回，大多数是士兵。这些外来民族被元朝政府赐予土地，而分布中国各地和汉族杂居。“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即来源于此。伊斯兰教也因此传到中国广大地区。元时镇江是江浙行省的一个路，下领“录事司”（路的治所，掌城中户民之事）一、县三（丹徒、丹阳、金坛）。元《至顺镇江志》记载了录事司按民族分类的镇江户籍：

（见下表）

从这份宝贵的资料可见：当时镇江城里人口的民族结构，汉人最多，回回第二。这些回回，就是镇江回族的先民。这部志书还记录了回回任官职情况：

1.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到廿六年（公元1276年——1289年），镇江称“镇江路总管府”先后有七人任达鲁花赤（蒙古语，意即监临官或掌印办事之官）；其中回回两人：札刺八丁、忻都察。

族 别	户 数	口 数
汉人	3671	9407
回回	59	374
蒙古	29	163
女真	25	261
也里可温	23	106
契丹	21	116
维吾尔	14	93
河西	3	35
总数	3845	10555

2.从至元廿六年起，到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先后有十五人任达鲁花赤；其中回回三人：卓马儿、乌麻儿、亦刺马丹。

3.从至元十三年到至顺三年，先后任“同知府事”有十八人；其中回回六人：舍里甫丁、苦思丁、暗都刺瓦薛、哈散、怀间、速儿哈散。

4.镇江路管领的录事司的达鲁花赤，自至元十三年到至顺二年有十七人；其中回回八人：亦刺马丹、麻合马、不鲁罕、马合麻、兀都蛮、苦思丁、萨都刺、获独步丁。

5.镇守地方的武将，如“镇江上万户府”达鲁花赤脱罗帖木儿，回回人；“怀庆翼上千户所”达鲁花赤完泽都，也是回回。

回回在乡村自成村落，在城市自成街巷，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现在镇江尚遗三条“爸爸巷”（山巷清真寺附近有“爸爸巷”，剪子巷清真寺附近有“大爸爸巷”与“小爸爸巷”）。推究“爸爸”和“巴巴”同为波斯语的音译，意为有德性的长者。由此可知唐、宋时期，就有大食、波斯人侨居镇江上述三条巷子，他们的后裔习惯用波斯语，才在他们聚居的地方用“爸爸”称呼。这也可以作为镇江早在剪子巷以前就建立了清真寺的重要佐证。

三

镇江回族的形成，与全国各地一样，是在元明易代之际。回回人在汉族中杂居了几代，长期受先进的汉文化的熏陶，这时已由侨居转化为土著，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起了深刻的变化，最后连西域的姓氏也汉化了。镇江《金氏世耕堂族谱》称：“迁润州之始祖锡爵，其祖先来自西域。至明太祖起兵襄成事业，吾祖锡爵以土司从事，克奏麟阁之功，叨受分茅之赠，御赐金姓，荣封世袭武德将军”。这个记载就标志了回回到了这个历史阶段，只是宗教信仰及与之相联系的独特生活习俗未变；其它如胡服、胡语都已汉化，最后他们改用汉姓汉名，表示臣服于明朝，并放弃了色目人的特权，从而形成了与原来回回人有别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之一的回族。

明王朝统一中国后，对待伊斯兰教采取优容政策，伊斯兰教有了发展。镇江穆斯林的人数也大有增加。原在仁安坊阜民街的清真寺，无法容纳众多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故老传闻：穆斯林集资买下剪子巷杨天官的花园，改建成礼拜

寺。据清光绪《丹徒县志》说：剪子巷的清真寺是“明万历三十年移此。有李一阳记石刻。”李是万历五年进士，他写的《古润州礼拜寺碑记》也说明了城里的清真寺建于万历壬寅（三十年），庚申（四十八年）修葺的经过。地方志上又有镇江“清真寺二。一在城内治安坊剪子巷。一在城外山巷内，始建未详，康熙间廓其基宇。咸丰三年，城外西寺毁于寇（太平天国革命军），同治十二年重建”的记载。这表明了镇江伊斯兰教和回族在明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四

清朝建立后，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需要，中国伊斯兰教转向“以儒诠经”。所谓“以儒诠经”，就是用儒家孔孟思想注解或改造原有的伊斯兰教义，使伊斯兰教更带有中国色彩。这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的重大变化。

“诠经”作品中，影响较大的有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问答》，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等。

清初刊印王岱舆、刘智的“诠经”。因为西北回族聚居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清起义——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苏四十三事件，所以，清廷官吏余悸未消，各省抚为了邀功，在回民中搜查，因而即使涂染了儒家色彩的伊斯兰经典仍逃不出统治者的严密“文网”，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广州崖州回民海富润携带阿拉伯文经典及刘智的著作《天方性理》、《天方典礼》等书，至广西被逮捕下狱，并追查到刘智书的收藏者及印刷者。因《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二书的版片在镇江谭在文家中，谭也被拿获。抚臣请旨根究，乾隆皇帝的“圣虑”比臣下深远明达得多，他看

到“以儒诠经”的伊斯兰教义对清朝统治有利无害，因此下诏责令将拿获各犯释放回籍，书也准许流传。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江南地区的回民由于与汉族长期杂居，且以汉语作为交际工具，汉化较深，对伊斯兰教信仰也不象西北地区那样热烈，加之人数又少，形成不了象西北回民那样坚实的民族力量。另一方面，镇江回民多数是经营商业，生活基本安定。再则由于镇江伊斯兰教是格底木派，把中国封建道德规范揉入伊斯兰教义中去，维护“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序”，这就和阿拉伯伊斯兰教旨主义不一样了。据八十多岁的花贵麟阿訇讲：过去的清真寺的大殿一进门，供桌上摆设了三尺高、一尺宽的兰底金字万岁牌写着（木刻）：“大清当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表示敬真主与忠君主是一致的。这说明江南的伊斯兰教已经不再有西北以及中亚色目人那种热烈的宗教精神和剽悍的民族风气；在统治者的眼中，江南的穆斯林已属“顺民”之列。清朝政府允许伊斯兰教传播的原因就在于此。

五

清代镇江伊斯兰教继续有发展。剪子巷和山巷的清真寺均重建并有扩大，特别是山巷清真寺发展到占地四亩多，大殿面积为430平方米，可容五百人聚礼，规模不仅比剪子巷清真寺大，而且好，在江苏省内是著名的礼拜寺。同时又由于回民的增加，大约在乾隆年间（公元1736至1795年）南门外的穆斯林在米市、柴市商业区的苗家巷又兴建一座清真寺。另在牌湾一带聚居的安徽寿县等外地来经商的回民，约在同治年间（公元1862年——1874年），也集资在京几岭西下坡

建了第四座清真寺。

老者回忆：山巷清真寺自同治十二年重建后，又多次修建和扩展，至民国初年穆斯林杨子华等人还改修和扩展水房（浴室）。山巷清真寺能成为具有较大规模的礼拜寺，并购置了百余间房屋，以租赁收入归寺充作日常经费，都出自全教坊内穆斯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加上乡佬杨白山、谈济昌、杨俊方等人先后献计献策、悉心筹划的结果。

自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镇江与九江、汉口等地按《天津条约》辟为商埠后，回民的商业活动也随镇江的半殖民地化有了较大发展。近百年来，镇江回民经营商业著名的有：

- 1.铜锡店：涌兴裕、源康、源康西、永茂恒、杨兴裕、涌泰昌、谈涌茂等；
- 2.五金店：裕康、裕源、复兴、复昌、中和、庆康、庆昌、光明、福昌、光华、新光等；
- 3.糕点店：皆吉、春生和、春生阳、紫阳观、吉升斋、老天禄、天升斋、福禄全、一品香、庆鹤斋等；
- 4.茶坊、餐馆：元兴馆、大兴馆、清一色、九如、龙江、天升楼、天庆楼、万和楼、极升楼、得和楼、春源、鸿翠、惠丰、如意、泳源楼、畅和、胜春、春升园、春江楼等；
- 5.绸布店：恒源昌、乾大昌、义顺祥等；
- 6.酱园：谈森和、谈源和、谈万和、谈森和裕等；
- 7.文化事业：三山报馆、新苏印书馆、华生印书馆、镇江书店等；
- 8.到外埠开设的五金、铜锡店：九江涌兴裕、余春和；樊川谈涌茂；安庆涌兴德；芜湖永恒昌、谈涌茂；东台永洪成；南通协盛昶；上海涌兴裕、福裕、德昶、华兴等。

这时，穆斯林出“乜贴”（施舍或捐赠财物）的愈来愈多，而要“乜贴”的却愈来愈少。如属山巷清真寺教坊的穆斯林除交“天课”外，并自愿交“日儿钱”（后改为“筒子捐”）为寺内修建及其它经费之用；并有穆斯林将产业献寺的，现在该寺墙上还有两块石刻记载了杨志传、完盛麟二人捐产献寺的事实。

光绪年间，镇江也兴办了经堂教育，山巷清真寺教长杨正慈，延请河南王宝云阿訇（又称“王四阿訇”）为经师。我国近代知名伊斯兰教学者哈德成、刘彬如都是他的门下。另外还延请过刘宇振、杨竹平、李福真、马常青、杨瑞祥、罗俊三、马品山等为开学阿訇，以培养本地教职人员。

光绪年间，山巷清真寺陆续刊印《天方性理》、《天方典礼》、《杂习辑要》、《古兰经文选》等十七种汉译伊斯兰经书。当时镇江、泉州和西北某地是全国三大经版处。本世纪四十年代，乡佬夏容光、杨贯之合作出资印刷过《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以赠人阅读。据故老传闻：上述二经的版片就是谭在文赠送清真寺的。

光绪卅一年，乡佬童锡疆、杨白山、杨兴斋、金品山、金宣山等在杨家门创办了穆源学堂。宣统二年，回民在剪子巷清真寺旁办了志成学堂，并在该巷内还办了清真第一女学（按：女学是伊斯兰教向回民女子传授宗教教育的场所，又叫女寺）。同时在支水巷办了清真第二女学，以后迁山巷。

再有乡佬杨光宇、谈鸿钧、法捷三等，在商团操场旁购地一方，砌了围墙，筹建“清真公学”以培养经学人员；旋因时代潮流影响，他们改变初衷而改为“穆源中学”建校基地。这也可见穆斯林“振兴教育，使本民族能有作为”的苦心孤诣。

民初以降，还举办过一些福利：

1. 丧葬百份：乡佬金执庵倡建，凡回民去世而确系穷困者，其丧葬费用由穆斯林共同出钱负担。

2. 敬恤会：谈季禎、童隆斌、金恒谦等任董事经管，对年老回民而生活困难者施赈济、以敬老人、示体恤。

3. 集义堂：在穆斯林开设商店内工作而家在外地的汉族职工病歿时，其家属未能及时赶到，即将死者暂放在集义堂内，等待家属成殓埋葬。

据年老穆斯林回忆：（一）清末民初，由于沪宁铁路通车，镇江商业继续保持繁荣局面。当时，山巷清真寺斋拜时，匍伏在大殿直到天井与对厅上的穆斯林，不下千余人。（二）民国初年，我市有虔诚的穆斯林戴宣才、完长顺二人，履行宗教规定“五功”（念、礼、斋、课、朝），自费往麦加朝见，迨至新加坡，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折回镇江。这两事可作镇江伊斯兰教发展的鼎盛时期之佐证。

六

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末，穆斯林法捷三等传入伊赫瓦尼派（新派）。它不同于镇江原有的格底木派，但又和清朝乾隆年间甘肃马明心所传新派（哲赫林耶）无关。伊赫瓦尼即伊赫万，系阿拉伯语“兄弟”的音译。这个教派最先是甘肃临夏果园东乡族人马万亩从麦加朝见而带回来的。镇江伊赫瓦尼派是法捷三等在上海看了虎嵩山阿訇宣传伊赫瓦尼教义的手抄本，就接受了宁夏虎嵩山阿訇的理论指导，同时得到上海回民达进轩等人劝募资金的资助，1929年在新河街六十三号购置房屋创设“进德会”（即“回教堂”），自称遵经坊。“遵经”一名标志了这派的宗旨。他们主张“凭经立

教”而提出“遵经革俗”的口号，要求按《古兰经》和《圣训》规定行事，极重视每日五次礼拜，取缔代办丧葬仪式，不准阿訇收取“乌支勒”（代价）等等。实质上，他们的主张“革俗”者，是要求摆脱汉化习俗。这个要求，对民族融和的历史总趋势来说，是一种倒退。在实践上，也不能为广大镇江穆斯林所接受。所以，这个教派在镇江没有什么“市场”，是不奇怪的。

七

抗日战争爆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冬月初六日）镇江沦陷，南门外苗家巷清真寺毁于日寇纵火。在日寇铁蹄下，回民终年为生活的窘迫而奔波，无暇顾及宗教生活——穆斯林不再交纳天课，到清真寺聚礼的人大大减少；出“乜贴”的人也越来越少，而要“乜贴”的人却越来越多。伊斯兰教中可称道之事只有：一九三九年，穆斯林马仁山、谈镜如、石焕章、夏容光等劝募资金，创办了回教施诊所，每年从端午节开始，到重阳节止为施诊期，回、汉病患者均可免费就诊取药。

一九四一年，回民童楚江独自置资，办了自助小学（即今“电力路小学”），资助回族子弟读书。

同时，乡佬马仁山等为了整顿当时土工、抬送者向丧主强讨恶索的陋习而成立了镇江回民殡葬服务社。

八

伊斯兰教在镇江一千三百多年的传播，推动了镇江回族的发展。据1982年人口普查，我市登记为回族者达8406人，仅次于南京。长期以来，他们和汉民族一直和睦相处，对镇

江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至于他们具有伊斯兰教传统的一些独特的饮食、丧葬习俗以及宗教信仰，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尊重和保护。

现在研究和回顾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回族发展的历史，对于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四化”建设都有重大意义。

由于在“文革”中，我市各清真寺和穆斯林所保存的匾额、包柱、书籍、文物等无一幸存。这就为写史增加了困难；加之我们的水平不高。本文疏漏、不实之处，在所难免。尚希知情同志订正。

镇江市伊斯兰教协会文史小组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镇江焦山佛学院

李 守 静

焦山屹立于镇江市区东北扬子江中，与金山、北固山并称为“京口三山”。在宋真宗时，因有东汉高士焦先（一作焦光）隐居于山中而得名。历来以江山雄秀为游览胜地。

焦山上有十余处寺庙，掩藏在古柏丛林之中，若隐若现，故有“金山寺裹山，焦山山裹寺”之说。其中规模最大的叫“定慧寺”（取佛家“由戒生定，因定发慧”）之意。定慧寺原名普济禅院，始创于东汉献帝兴平年间，至今已有一千七百余年历史。唐时，玄奘法师的弟子法宝和鉴真法师的弟子神邕曾来此寺主持。南宋年间寺被火焚毁，重建后改名为焦山寺。明代宣德年间扩建焦山寺，距今已五百多年。康熙年间又改称定慧寺。

定慧寺为我国著名古刹之一。唐代，先有法宝法师传“法相宗”，后有神邕法师传“天台宗”。他们后代的传承，史志未见记载。在五代、宋、元、明，又有禅宗的“曹洞宗”和“临济宗”分支交叉传承。清初以后，由“曹洞宗”代代相传。（曹洞宗的创始人洞山良价和曹山本寂，均为唐代后期人。后人为了音调的协调，不称“洞曹”而称“曹洞”）。传至清同治七年（1868年），大须和尚开始提倡传戒、念佛，直到现在。所以，镇江焦山定慧寺的宗派法系名义上虽是继承“曹洞宗”，实际上则宏传戒律，属“净土宗”。

我国佛教界一向认为焦山定慧寺是教下，主讲经说法；

金山寺是宗下，主参禅悟道；龙潭宝华寺是律下，主弘传戒律。这三处寺院是全国僧徒参学的模范丛林，而律、宗、教是僧徒学修的纲领。

定慧寺为了培养僧才，“弘扬佛法”，1934年（民国廿三年）经方丈智光法师倡导，本山办了焦山佛学院。智光法师任第一任院长，定慧寺监院雪烦法师为第一任教务主任。招收第一届学僧110多名，其中海云堂一个班（亦称正科、甲班、高级班），有30多人；大雄宝殿后面的禅堂一个班（亦称予科、乙班、初级班），有80多人。开办时，甲班学生住学戒堂，乙班学生住念佛堂。

焦山佛学院的院长前后有五任：

任 次	任 期	法 名	备 注
1	1934—1936年	智光	五任院长 同时也都是定慧寺 的方丈。
2	1936—1942年	静严	
3	1942—1946年	雪烦	
4	1946—1947年	东初	
5	1947—1948年	圆湛	

智光法师毕业于月霞法师主办的南京华严大学，与著名的太虚法师是同窗好友。他对华严宗的造诣很深。

静严法师俗名陈炎，又名大镛；一九〇七年生于兴化县。七岁出家为沙弥，一九二二年在苏州西园寺受戒。此师青年时代即不“安份”，一九三〇就读厦门闽南佛学院，院长佛面而尘心，竟然贪污，静严敢于向那位法师挑战，领头

闹学潮，而被迫离院。以后曾在焦山、竹林两寺参禅侍佛，一九三二年任竹林寺维那职(专司唱诵)，一九三四年任定慧寺监院，一九三六年起，任该寺方丈兼佛学院院长。

这位法师，颇似鲁迅先生的名篇《我的第一个师父》中的主人公——长庆寺龙师父一样，“披着袈裟未出家，身入空门心不空”，俨然方丈大和尚，却服膺孔圣人的“食色性也”之说，患有“寡人之疾”，不但吃荤饮酒，而且有女人；这个女人竟又是一位女菩萨——尼姑！加以此师又不善作伪，公然率性而为之。有时甚至饮得酩酊大醉，不能为学僧按时讲经说法。作为一寺的方丈和佛学院的院长，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此不守佛门的清规戒律，难怪乎种种物议非难，纷呈毕至了。

但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静严的政治态度。当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存亡之秋，静严法师大义凛然，不避艰险，以一个方外之人，不惜名刹方丈的社会地位，大力支助以彭炎同志(当时化名林逸樵)为首的中共长江工委所领导的地下斗争，把焦山寺院变成了新四军南来北往的重要联络地。在他焦山住处下的密室，成了工委存放枪枝弹药和机密文件的仓库。工委不少重要会议，都曾在焦山寺院召开。日伪“清乡”扫荡紧张，彭炎等领导同志都到他这里隐蔽。后来，他也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经长江工委批准、吸收他为秘密党员。彭炎同志当时还特意为他填过一首《临江仙》词：

“几番曾经风雨，半生不染纤尘。华严阁上论鲸鯢。同仇憎敌寇，报国识高僧。

潮涨三山松吼，枕边千里江声。禅林院落夜深沉。梵钟仍断续，斜月更光明。”

这首词高度评价了静严法师的爱国主义精神。由于静严参加了地下党，他的妻子费俊瑛也为长江工委做过不少掩护工作。就一个女尼来说，也属难能可贵。

一九四二年秋，因叛徒告密，汪伪镇江县长郭志诚以通“匪”罪名通缉静严。他被迫离开焦山。后来，他买通日本宪兵队特务队长邱逢宜，才得以息事销案。但郭志诚只准他在城内居住，不准回山，并迫使他登报声明放弃焦山寺院的僧职。

静严虽和中共地下组织断了联系，但并未叛党，也未后悔他的“孟浪”和“误落尘埃”。在云游浪迹数年之后，于解放前夕，再度参加了地下党。可是，解放后，因其浮浪旧习不改，犯了错误，吸食鸦片而被政府拘留强制戒绝；一时弄得声名狼籍，候补党员资格也被取消了。一九五四年，他做了中学语文教师，干脆从此脱了袈裟。正如鲁迅先生笔下的龙师父一样，他原“不过是一个剃光了头的俗人”。一九六九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喧嚣声中，他寂寞地病死在丹徒县辛丰中学。

静严出走焦山后，由雪烦法师继任佛学院院长。他生于一九〇九年，江苏泰兴人；十四岁时与其弟在海安县出家为僧。曾云游大江南北寺院，精通佛学。也是焦山佛学院的发起者之一。抗战期间，他在焦山也掩护过新四军和地下党员。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当局安上“通匪”的罪名，投入牢狱。幸得本地冷御秋和陆小波两先生的营救。出狱后，雪烦避走上海。反动派仍企图加害于他。上海《大美晚报》以显赫标题报道：“镇江焦山匪首雪烦畏罪潜逃上海”。上海反动当局又把他关押了十七天。后来他先后任常州清凉寺（上苑）和上海清凉寺（下苑）方丈。上海解放前夕，雪烦法师的一

些师友、学生因受国民党的蛊惑和欺骗，纷纷劝他远走台湾，还有个别人用谣言来恐吓威胁他，雪烦法师大义凛然地说道：“我留在大陆上不走，这里就是我的故乡！国民党的罪我受够了，共产党杀我一个和尚干什么？”而坚决留在上海。上海解放后，雪烦法师在上海三昧寺任职，被选为上海南市区人民代表、政协常委。现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江苏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和省政协委员等要职。

圆湛法师曾在闽南佛学院、镇江竹林寺佛学院、泰州佛学研究社等处学习。他是焦山佛学院的最后一任院长，亦是解放前焦山定慧寺的最后一任方丈。解放后，赵朴初同志推荐他到北京中国佛教协会当研究员多年。他对佛学研究精深，曾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刊物《法音》的编辑。他还担任过“中国三时学会”的研究员、北京广济寺客堂知客等。1982年来“中国佛教协会栖霞寺僧伽培训班”担任副班主任兼教务长。

茗山法师是焦山佛学院的最后一任教务主任，兼《中流》月刊主编。他原是焦山佛学院第一届甲班高材生，1936年在本院乙班任教。同年赴武昌佛学院深造，当研究生。抗战期间在湖南“南岳山佛学讲习所”继续学习。在衡阳、宁乡一带的寺院当方丈，并筹办“衡阳佛学讲习所”和耒阳“澈悟僧众学校”。1946年回到焦山。解放后任定慧寺第二任方丈。现任江苏省暨镇江市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江苏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暨镇江市佛教协会会长及南京栖霞寺方丈、镇江焦山定慧寺方丈等职。

1981年4月，应香港大屿山宝莲寺和宝林寺两寺方丈圣一法师邀请赴港讲学三月。

焦山佛学院从开办到结束，教师可分为两类人，一类是

佛门中人，如又山、现月、雪烦、圆湛、茗山、望亭、曼陀、玉泉、明性、介如、东初、觉先等法师。还聘请了仁山、守培、芝峰、槐然、震华等法师为特座讲师。守培法师生于光绪十年（1884）农历九月廿九日，圆寂于1955年农历十月初三日，终年七十二岁。生前曾任镇江超岸寺方丈和超岸寺佛学院院长。他一生戒行精严，潜心佛学，著述颇多，且精书擅画。解放后任镇江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省、市政协委员。1983年十一月三日，镇江、上海、南京、扬州等地的僧众齐聚金山寺，隆重纪念守培老法师一百冥寿。其徒孙新加坡的隆根法师搜集师祖的遗作编成《妙心襟咏》在新加坡出版。香港“守培法师纪念会”也出版了《守培法师纪念集》。

佛学院的特座讲师和教师们讲授的课目有：佛学（包括经、律、论）、佛史、唯识论、因明学、文学、历史、代数、法律、地理、统计学以及英语等。智光院长亲自参加教学，讲授佛学和文学。

另一类教师聘自在家人。主要有：薛剑园，上海暨南大学文学硕士，教文学和统计学。还有两位教文学的教师潘效安（原江苏如皋师范学校校长）和钱右东（江苏海安人，任过江苏省长韩国钧的秘书）。现在扬州师范学院的章石丞，也来教过文学。戴玉华，律师，教法律。最有趣的是彭遵路老师，是德国留学生，曾在旧政府交通部工作。他曾代表中国参加过国际电学方面的会议，到过许多国家考察。在佛学院教代数、物理。他平日善饮酒，酒量甚大，喜用花生米下酒，往往一醉方休。他一贯彻夜打禅而坐，通宵达旦，显系一位仕途失意而又不愿完全隐身佛门的人物。佛学院对学僧的戒行要求很严，平日说话声音很轻，不得高声喧哗；除按

规定攻读佛学外每天还要上殿过堂两次。清晨三时起床，三点半上殿念早课，四点三刻下殿；还有一次是在晚间六时至八时。一日四餐，晨五点过堂早食，吃粥；中午十一点过堂午饭；下午二点吃点心；下午五点吃放参（即吃晚餐），吃厚粥。

上课时间是上午两小时，下午两小时，其余时间和晚间为自修。

每日晚九点放养息（即休息）。每月初八、十四、廿三、三十放香假（即休假）。有时还要出坡（即参加一些劳动）。

除平日上课外，每半个月要诵戒一次。每年夏季念《华严经》半个月。冬季要“打七”（即敲木鱼念佛），整天坐在那里念阿弥陀佛，时间为两个星期至七个星期，名曰“打佛七”。意谓整天念阿弥陀佛，会打掉心中的一切杂念，达到忘我纯净的境界。

1941年至1945年间，日本国友松圆谛、藤井草萱、岸文贞等佛学大师曾来焦山佛学院讲佛学。学院师生也有到日本访问或留学的。如教师有芝峰、东初、圆湛等人，学生有智平、佛宗、本沧、梦初等人。芝峰法师还从日本携回《禅学讲话》一书，为学僧讲授，并译成中文，登载焦山佛学院的院刊《中流》上。

《中流》月刊是1940年由圆湛法师创办的。前后的主编、编辑有圆湛、圣璞、茗山、觉先等。这个刊物起初是油印本的旬刊，后改为铅印本的月刊。“中流”的含意是：一、佛学院所在地焦山屹立江心，宛如中流砥柱；二、取意佛家“从生死此岸，渡过烦恼之中流，达到涅槃（不生不死）之彼岸”；三、勉励学僧努力成为佛学界的中流砥柱。

该刊的主要内容有：佛教经论解释、佛学研究论文、国际佛学动态、外国佛学译著、佛教文物古迹介绍、国内外佛教活动报导以及诗词创作等。刊登过的重要文章有：雪烦作的《外侮频仍与僧伽教育》，茗山作的《唯识廿论讲话》，现月作的《戒律概要》，望亭作的《八识规矩颂略什》，介如的《法显法师西域求法记》等。

此刊曾与日本佛学杂志《大法轮》相互交流赠阅。另外，还与菲列宾、新加坡、马六甲、锡兰、缅甸、暹罗、香港等佛学界交流刊物，或转载论文。该刊还出过《建院十周年纪念刊》，上有雪烦法师写的院史，圆湛法师写的《十年来之僧教育》，延载有全院师生名册。民国三十五年（1946），佛学院还办过佛教会务人员训练班，《中流》月刊也为之出了一个专刊。

抗战军兴，焦山佛学院停办。1940年，始招收青年僧人入学，延聘教师，重开学院。1948年底，又因解放战争迫近而结束。

焦山佛学院每届学习期为三年，自1934年至1948年（其中，1938—1939年停办两年），有四届学僧：

第一届1934—1937，两个班，计110多人。

第二届1940—1943，两个班，计60多人。

第三届1943—1946，两个班，计60多人。

第四届1946—1948，一个班，计40多人。

焦山佛学院的教师和历届学僧健在者，大部分仍在佛门。教师年龄最长的现月法师，年近九十，现在如皋定慧寺安居。绍宗，现为上海市佛教协会秘书长。觉先（又叫惠庄），现为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教师，教因明学，苏州佛

教协会秘书。圣璞，原为佛学院高材生，后当教师，现在上海佛教协会工作。

学生如：峻岭，第一届毕业生，原在南京毗卢寺当方丈，现为上海龙华寺知客。性空，第二届毕业生，现为苏州寒山寺监院。觉非，第二届毕业生，现为无锡开元寺方丈。觉星，第四届毕业生，现为南普陀佛学院讲师，厦门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焦山佛学院也有部分学僧，由于各种缘故，离开了佛门。如普莲，在高邮县三垛中学工作。静修，在江苏省海安县某公社卫生院行医。宗如，在上海行医。道达，五十年代初，入南京华东军政大学，现在广西友谊关部队中工作。智愿，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工作，现退休居无锡。冶愚，现为安徽大学教授。本昌，自佛学院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后在镇江搞工程技术工作，现退休。理祥，佛学院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并毕业于该校，

焦山佛学院的学生在海外知名者颇多：悟一法师，原为台湾佛教会常务理事，台北“金山”分院（以镇江“金山”为总院）负责人，先后任“世界佛教僧伽会”（在锡兰）中国组秘书长和中国组主席。今度法师，现名星云，美国东方大学佛学博士，常在欧美各地讲学。他和悟一都是世界佛教界的知名人士。知定，现在美国夏威夷的虚云寺，据闻该寺为全美目前一座最大的中国式的寺庙。圣严，在美国纽约等处讲经，曾得日本文学博士学位。圣一，为香港大屿山宝莲寺和宝林寺两寺的方丈。佛宗（现名法宗），曾留学日本，原为南京栖霞寺监院，现是香港鹿野苑（栖霞分院）负责人。达道亦为鹿野苑负责人。大同，原名悟因，现在加拿大当工程师。

一九八二年举办的中国佛教协会南京栖霞山僧伽培训班的班主任，即是茗山法师，任教的介如、静之、融通等，都是焦山佛学院出身。

补白：

雪烦智护“瘞鹤铭”

智仙

1937年冬，镇江沦陷前夕，焦山寺监院雪烦法师在德峻老法师的同意下，秘密领了一位职事僧将原在伽兰殿南的瘞鹤铭推倒，移至一个偏僻处，碑文向下，窖藏在一堆乱砖碎瓦下面，以防日寇覬覦、掠夺。然后雪烦避居和畅洲。

1938年春节，雪烦回山后，日寇常来盘问瘞鹤铭的下落。有一次还从南京来了一位将军，站那堆乱砖瓦前追问他。尽管鬼子百般威胁利诱，雪烦均推说铭石被国民党军拆走，才把鬼子骗走。抗战胜利后，雪烦将碑石挖出，在华严阁西、靠近陆游石刻下花墙里，为瘞鹤铭重砌了一个碑亭。国宝重见天日，雪烦法师之力也！

镇江“旗人”琐忆

王凝庶 遗稿

镇江少数民族，先有回族，后有满、蒙。而满蒙的来此，起于旗兵驻防。按清朝军制，除绿营外，有满、蒙、汉三个八旗，俗称“旗兵”；其驻扎地称为“旗营”。又因是世袭兵役，家属依例随营居住，旗兵家属也就被称为“旗人”。

驻防镇江的旗兵，原是汉军，官兵都是汉族。康熙二年（公元一六六三年），抽调内蒙古六盟四十九旗中的一部分到北京。当时征调是为了填防久驻，并非作战，所以准许携带眷属，名为携眷兵。后又调遣一部分驻南京。乾隆二十八年（公元一七六三年），有一股土匪约千余人，首领名张家狗儿，从东南饱载所掠，来到镇江附近，意图渡江北窜（《东北录略》有记载），与镇江驻军通款假道，竟得安然过境。追缉的部队揭发了镇江驻军的怯懦通匪，这批汉军旗兵被裁撤，原驻南京蒙旗的六、七两甲全部人马携眷调来填防（三、四、五甲仍驻南京），故镇江的“旗人”全是蒙古人。满人仅花、那、胡三姓而已。

内蒙六盟区域很广，镇江蒙族如何从原旗调进，这类档案，恐已很难稽考。但镇江蒙族呼母独与内蒙东盟各旗（今属辽宁辖境）相同，这可作为镇江旗人原籍出处的佐证。

满族、蒙古族人多以其世居地方名、或山名、水名为己姓氏。虽有姓，平时却不称用而皆以名为姓。辛亥后，为免受民族歧视始冠用了汉姓。今镇江蒙古族中的包或鲍姓，鄂

或郭姓，项或向姓，巴姓，敖姓皆为汉姓，而其本姓却是博尔吉特、翁牛特、奈曼、克什克腾、敖汉。这些内蒙地方名迄今未改。推其姓氏可知其本源。这是镇江“旗人”祖籍的又一佐证。

满蒙旗兵既到镇江，进驻原汉军营地。主要兵种有名为马甲的骑兵一一一七名，配以少数步兵、炮手（炮兵）、匠役（修缮鞍辔弓箭），由副都统统领，与南京副都统均归江宁将军节制。镇江副都统的职衔是京口掌印副都统，管理沿江沿海等处军务，他的职权范围似乎超过江宁将军，是一特殊制度。又因南京副都统有官职无印信，公文上盖印，须用其直属左右两协领的关防合并钤盖，是又一奇特之事。

清制各地驻队八旗人等既不准经商，又不遑做工，全仰给于饷项。而饷项也是够清苦的。因为它按粮米折价发给，但这个价一经折定，并不随时价调整，以两百年固定不移之价用于屡次市场变化之后，怎能应付？况且生齿增加，兵员却有定额，饷额也有定数，来源不稍增，而食指日多，旗人的生活自然每况愈下。马甲每月饷项，按二石五斗米折价；步甲等递减。一户五六口者，只有一人服役赡养全家，当然就很困难了。如服役者死亡，其子幼小不能服役，为了承饷，必须花钞雇人代役。又如男丁死亡，家中全是妇女，视人口多少，酌给孤孀一人或二人之养育费；但为数甚微，就必须以针线、挑花、络丝等活计收入作补助。外族人不明原委，往往羡慕“旗人生来吃皇粮”；其实，“吃皇粮”的优裕生活，是满清入关的早期情景，到了晚期，下层满蒙的“吃皇粮”早就不美了。

镇江蒙旗饷项系从江苏藩库（在苏州）按月拨给的。一年之中，仅两次稍优：一为二月份，实发本地产米。据故老

传闻，后来因民族芥蒂，一个汉人出了一个点子：乘乾隆南巡之际，在皇舟经过处，唆使两岸妇女夜哭，哭声吵了乾隆的“龙卧”，派人查问，哭者诡称“军米不容有一砂一稗，苦于日夜粒粒挑选；已十多天不顾寝食，疲乏极了才哭出声的”。于是骗得乾隆口谕：“从此军米只用糙米”。这无形中降低了旗人的饷粮标准。

另一次稍优的是十二月份，为了照顾过年，规定由丹徒县就近按市价拨款。但在拨款之日，知县和营内经办官吏往往故意压低米价，俾便他们从中渔利。据先辈传说，甲午年京口副都统保年，也在饷米上捣鬼，把他的家丁杨雨亭也报在饷内，协领荫浓趋炎附势，竟在兵饷中按月克扣数十元奉之。当时的数十元相当于军中三、四品的俸给。此款表面系家丁杨雨亭支领，实际上成了都统太太的花粉钱！总之，在饷上暗赚窃取，是不在少数的。荫浓细大不捐地贪污还不过瘾，竟使其子私铸铜元，事发被逮往南京梟首。这是一桩轰动全城的丑闻。

蒙族保守旧礼教的传统，尊师重友，尤尚气节。鸦片战争镇江之役，闭城而战，蒙族有职守的男子都登城战斗，无一降逃。许多妇孺举家积薪自焚，或相率投井，或投入沿城水塘，尸满水涸，后来者就攒入尸底以掩死自己。有抱婴儿投水的蒙妇，尸体捞上时乳头犹未脱儿口。死亡惨重，令人不忍目睹。蒙族初至镇江，男女有四、五千人；经此浩劫，人丁锐减。到辛亥年间又回升为七千余人。后来因散往各地谋生，今留镇江尚有二千人。

清朝统治者是严“满汉之大限”的，禁与汉人通婚，彼此风俗殊异，民族隔阂是客观存在。但蒙汉和睦相处者也为数不少。辛亥革命中，我家和汉人的关系就经受了考验。当江

苏程德全在苏州宣布独立后，两江总督张人骏、将军铁良，一筹莫展，虽有提督张勋每日到署壮他们的胆子，他俩还是相继出逃。南京发生战事，一时社会秩序大乱。我舅父崇朴奉外祖母居南京，我母亲前去省视，适逢其会。有人提刀蜂拥进宅搜杀旗人。万幸的是，他们只以南京旗人口音来辨识，而我母舅是镇江口音，才得幸免。当时镇江蒙族在南京任军职而被杀的，有宪兵司令桂诚和陆军连、排长等十数人。我舅父出城乘轮船拟往上海，有一个镇江汉族同乡姓陈的（名已忘记），追至船上，要捕我舅。正在危急时，船上的一个外国人把我舅推入舱房，把门从外上锁。陈才悻悻而去。后有人问陈：“崇朴营救革命志士多人，你和他又有世谊，何以相逼如此？”陈竟说：“我要杀一旗人立功！”“功利”重于友谊的人，在时代剧变下一反常态，与亲者相仇，本不足怪！

镇江光复之前，人心惴惴不安，以为地方必遭靡烂；蒙族举家迁往苏北的很多，一时满街车马塞途，昼夜喧嚣不绝。我父亲无职守，本可离镇。但因病不能走，我也留下陪他。父亲的挚友汉人徐义山先生，从江北六浅镇来我家，坚要我父子随他过江。我们这才随之寄居其叔父处。不久，镇江按照商会及各公团与都统约定，旗兵缴械，各不相害，以保全地方元气，因此起初还算安谧。后因攻打南京初战失利，有退到镇江的部分民军，专以杀无抵抗的旗人为快意，竟有数十人被砍死、枪杀，其中妇女占多数。因城市妇女唯蒙族无缠足习惯，容易辨认。副都统满人载穆为亡朝效愚忠，自缢而死（同死者尚有都统府参谋长蒙人恩沛和参谋蒙人德霈）。

六浅镇与镇江仅一江之隔，闻镇江有杀旗人的消息，于

是也有搜杀旗人和包庇者的谣风。徐君之叔十分惊骇。徐君对叔父说：“如有事，由我为侄的一家承当；决不相累。”及风声平息后，徐君才把真情告诉我家。

镇江光复后，“旗人”生活来源突然断绝。有文化的多从事教育工作，无甚文化的多在本城或上海等地当警察（因旗兵习武、会马术，为外国跑马场养马者也多镇江“旗人”），等而下者做小贩、卖苦力，也为数不少。当时担任民政长的杨邦彦，为笼络旗人、安靖地方，成立了“旗民生计所”，自兼所长，用蒙旗祖制产业沿江滩田和旗营的公房地产（基本上是公廨、庙宇、校场等）为基金，以这些产业所生花利，作为旗民生活补贴；并计划创设一些小规模的手工生产事业，以从根本上解决旗人生计。可惜计划由于多方掣肘，不能实现；只好从消极性的救济着眼，而这种救济又是采取“杨柳水、大家酒”的平均摊派，只要是“旗人”，不问贫富，不分老幼，人人有份，每月发放，但每月所得之数，不过银元二、三角而已。另外对死亡和出生婴儿，略有一点津贴。这种“救济”旗民个人所得甚微，但整个开支却是庞大的。这个制度，执行三十余年毫未改进；直到解放，始行结束。其间，因死亡隐瞒不报或冒报出生婴儿等等，还发生不少纠纷。可见虽是“鸡肋”之味，尝者终不肯易手。有些有正当职业、生活优裕的旗人，尽管自己无此需要，但宁愿给亲友代领，也视为应享权利，而绝不轻弃。有些明智的人要放弃，但他的亲友也不允许这样做。旅沪的镇江“旗人”也每年造册来领取救济。这对“旗人”虽属“杯水”，但对经办人却是一笔可观的“车薪”。故而，有时还引起争吵打架的丑闻。

杨邦彦卸任民政长，旗民生计所由清末进士杨鸿发（字

子磐）继位。杨系汉族，信奉佛教，对设坛扶乩很“内行”，对真正的事业却不会经营。加上在生计所里又公私不分，侵吞中饱，引起旗人极大不满，终致涉讼，把他轰走。从此，就由蒙籍人士中推选所长，而不再容汉人染指“禁脔”了。

比较有名气的所长是苏润宽，字硕人，蒙族秀才，是江南知名的书法家、金石家和考古家，榜其书斋为“考盘书屋”。他担任旗民生计所所长多年，虽素有公正廉明之名，但书生本色，也不善治理，一切事务不得不假手执事。这些执事又良莠不齐，加上蒙籍头面人物颇多眼馋所里的公产，时而制造纠纷，以致外间啧有烦言。苏弄得焦头烂额，不得不辞职让“贤”。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统治时，认为“八旗”、“旗营”、“旗人”等等早已随辛亥革命而成历史名词，不应继续沿用；就把“旗民生计所”，改为“蒙籍救济院”，由蒙籍人士成立管理委员会，推选院长，报县政府核准备案。最初推了蒙族王根祥（字瑞卿）任院长。王曾在租界未交还前的“大英工部局”当翻译，是青帮“通”字班，深得工部局头头克利的信任和栽培；加上包庇贩运烟土，早已腰缠多金，能再弄个“院长”之名，就成了蒙族的自然领袖。而蒙籍人士倒也并不想王根祥掏腰包、“挖里肉”，只是想凭借他的帮会势力，在整理房地产及滩、田方面，可以有所作为。但他就任后，被那些头面人物包围，也无所作为。这时有人向民政厅及省会救济院揭发，说蒙籍救济院执掌的许多产权，应当属于地方公有，不应仅为蒙籍公产；特别是沿江滩田甚多，并不全是指拨给旗民生计所的，有侵占国家权益之嫌，当由省会救济院和镇江县政府派员会查。某些蒙籍人士竟怂恿王根祥变卖部分房产，集资千元，对查案人员进行

贿赂。又请地方知名人士向县长张鹏、救济院长陈斯白疏通，恳请怜恤蒙籍贫民，不必深究。结果千元多被经手人中饱朋分。一时在蒙族中议论沸腾，王知事不可为，乃辞职。

在蒙籍救济院管理委员会担任过委员（或院长）的高慕庭、曹协恭、关耀庭、余仲鼎等人，即使还不至“生于斯、食于斯”，至少他们高于一般蒙族同胞的生活来源，是直接或间接得自救济院的公产。他们不仅能说会道，而且会动笔杆子，熟悉法律，交通官府，是救济院的实权派，即连王根祥这种“老江湖”也不免为之操纵。沦陷时期，他们拥立伪警察局长胡春潮兼主任。胡虽有一双魔掌，但在蒙籍救济院里也沾不到什么油水。胡卸任后，又抬出当时任私立成志中学校长的赵式如当主任。抗战胜利后，教育界出身的卜金门也做过主任。但赵、金都是被人利用而无实权的。

镇江人向称蒙籍救济院的产业为“旗产”。它分两大部分：一是房产、地皮，都在原旗营范围以内。一是江滩，则在江边或江中。而一般购置、租典房地产及开垦承贖江滩者，如遇“旗产”，都特别谨慎小心，就是因为旗产的纠纷比较复杂，弄得不好往往涉讼经年累月，无法脱身。如镇江瓜洲间的征润洲，就是最典型的。征润洲已成滩的有五千余亩，未成滩的叫做“水影”，仍会继续淤滩成田。附近业主有优先承贖及上价报领之权。而邻近的各业主往往觊觎争夺，所以纠纷特多。即以已成滩五千亩的征润洲而言，约有三千五、六百亩可以开垦成田。蒙籍救济院无力经营，就召人围垦，以收取押金。围垦者又成立“垦业办事处”，筑了土围之后，又召人垦种。而这些垦种者也仅是准备农具、种子，再召佃耕作。实际上形成了蒙籍救济院是“大地主”，筑围的垦业办事处是“二地主”，准备农具、种子召佃者是“三

地主”；真正耕作的佃农要受三重剥削，而政府的法定赋税还在外啦！三千五百亩圩田之外的约一千五百亩柴滩，每年秋冬收割芦柴是稳获厚利的。垦业办事处认为，它在五千亩承垦范围内有权收取芦柴花利，即招伙承包割柴。蒙籍救济院则认为这未经投资开垦，应是原主的权益，也招伙割柴。自然双方争执，甚至斗殴、兴讼了。其实，垦业办事处是利之所在，志在必得而决不退让的；蒙籍救济院只不过是盘马弯弓，故作姿态罢了。结果由垦业办事处给予前者若干滩柴补贴，息讼了事。这项补贴大概十分之二三正式入帐，蒙族数千口利益均沾，虽极微末，总算为大家争得了一点利益。其余十分之七八，名曰“脑后”，则被中饱朋分。此事几乎年年如此，成了执事者的陋规。

至于旧旗营内的房地产，每年必定要出卖几处。因为这些房产平时不注意整理维修，收取的租金又比一般个人产业低廉得多。数千口月贴只增不减，不卖产就不足以维持。加以卖产又是分为“正价”和“脑后”，执事者也就乐而为之了！如此年复一年，房地产也就糟踏了一半。最典型的是解放前一年多，竟将小校场也半卖半送掉了。

小校场原系旗营演武、校阅骑射场所。辛亥后，县劝学所（即教育局的前身）辟为县公共体育场，引起旗民生计所的抗争。后经县裁决，产权属生计所，由教育局酌给一点年租。八年沦陷期间，日寇将镇江城基西南角包括县体育场在内划为禁区。日寇还在场内开了一条路（即今健康路北段）。抗战胜利后，蒙籍救济院虽屡动脑筋，但也无法把该场弄回来。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及省政府厅处长周厚钧、钮长耀等看中了这块地方，也摸清了产权的麻烦，与中国农

民银行崔淑仙联系贷款，以建筑他们的小公馆。他们商请了县参议会副议长杨方益代为疏通，并允分给杨一幢房屋基地和建房贷款。杨即代为牵头，向县教育科科长（可能是赵式如）、县中校长岳德珍（因县中校址就在原体育场里）疏通，得其默许；并介绍他们与蒙籍救济院直接商洽。救济院本无力争回该地产权，见对方来头大，就做了个顺水人情，让他们建屋。杨方益爱惜“羽毛”，并未接受房基和建房贷款，而中农经理崔淑仙倒近水楼台，插了一脚，搞了一座小别墅。这批小公馆建成后，名之“合作新村”，然而当时群众却呼之为“贪污新村”，就是现在座落健康路军区内和中山路小学内的小建筑群。至于蒙籍救济院执事者与“合作新村”主人私下说合的条件，必然也是既有“正价”，也有“脑后”的，这有待知情人来说了。

解放后，蒙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安置，三十多年的“旗人”畸形生活从此结束。什么“旗民生计所”、“蒙籍救济院”之类都成了历史陈迹。

（编者按：本文经我们整理过。文中关于“旗民生计所、蒙籍救济院”情况，系我会政协委员杨方益同志补述）。

飞机设计师巴玉藻

闻 思

辛亥革命后，镇江蒙族人士卓著声誉者，首推巴玉藻。他设计、制造飞机虽在冯如之后，但却是我国航空工业的创始人。一九〇七年，他在京口八旗中学毕业，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一九〇九年因成绩优异，为北洋大臣选调，去英国留学（同去者共二十三人），学习船舶机械。辛亥后，又奉命去美国学习航空机械，入麻省理工大，专攻飞机制造，又以优异成绩毕业。美国飞机制造厂商竞相延聘，但他爱国心切，说：“中国极弱，我要为我的国家制造飞机”，辞谢了高薪厚酬而毅然归国。返镇后，始知其先人罹难于辛亥兵乱之中，巴固悲痛，但开创我国航空工业之心更切，服务于北洋政府海军部福建马尾船政局，北洋政府仅允拨款五万元，尽管杯水车薪，他团结有志之士王助等人，筚路蓝缕，白手起家，终于自己设计，选用本国材料，于一九一九年造出我国第一架真正的国产飞机。他一生为我国共造过十一架飞机，并曾代表我国去德国柏林参加万国飞机展览，以制造精湛，性能优良而获奖。日本帝国主义者发现，即起觊觎之祸心，竟挑之以“族恨家仇”，并诱之以高薪厚禄，但巴爱国之志弥坚，不为所动，持中华民族大义，表现出崇高的节操。

回忆四益农场

沈嘉徵

镇江北濒大江，三面环山，过去绝大部份是未植树木的荒山，故此俗称镇江是“穷山恶水”之地。其实，这不是山丘本身穷，而是人们没有开发利用所致。这些荒山不但没有收益，而且遇到大暴雨，就要酿成水灾。抗日战争前，曾由热心举办地方近代企业有识人士冷御秋、严惠宇、陆小波、凌少曾等发起，从镇江南门向西，经四摆渡、高资、桥头，到下蜀一带沿沪宁铁路线南侧的大部分丘陵山地，着手开垦，种植桑树，建设蚕种场。当时，四摆渡有严惠宇、陆小波主办的益民蚕种一场和凌少曾、凌幼曾主办的益民蚕种二场，以及由葛敬中主办的明明蚕种场；高资有冷御秋、陆小波、严惠宇主办的均益蚕种场；桥头有冷御秋、陆小波、严惠宇主办的三益蚕种场。这几个蚕种场各有桑园四、五百亩到一、二千亩不等，蚕室也各有一、二十间到三、四十间。这些蚕种场，虽然都是私营企业，但对发展蚕桑生产、改善地理面貌，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镇江沦陷，蚕种场停止生产，桑园荒芜，部分桑园被日寇破坏，把桑树作为烧木炭材料，挖掘殆尽。只有四摆渡一、二场和高资三场的蚕室幸未遭到破坏，尚可养蚕制种。抗战胜利后，冷御秋、严惠宇、陆小波、凌少曾等计议恢复生产，议定联合经营，扩大业务，把益民一场、益民二场、均益场、三益场合并创办四益农场，成立董事会，推举冷御秋为董事长，严惠宇为总经理；设蚕种、种植、园艺、畜牧四个

部和一个办事处，由胡鲁泉主持驻镇办事处，负责总务会计、运输工作；蚕种部主任严忠婉，主持改良蚕种的生产工作；种植部主任沈嘉徵，主持桑树、油桐、茶树、桑苗、绿化树苗的培植和蚕期的桑叶供应工作；园艺部主任王太一，主持蔬菜、花卉、果树的培育和推销工作；畜牧部主任陆理成，主持乳牛、绵羊的饲育和牛奶的销售工作。肥料的收集和供应工作，由陆元培、许春华负责。另设自卫队，队长由陆元培兼任，负责蚕种场的保卫工作。每年生产的几万张改良蚕种，大部分供应给浙江省的桐乡、双林、湖州、德清、海宁的农村，因此，又设有推广所，浙江由俞锡九负责；江苏由何志纯负责，向溧阳、宜兴、吴江等县农村推销。由于严总经理住在上海，为了密切场务联系，在上海、镇江两地各设办事处，上海办事处设在江阴路，负责人李家本；镇江办事处在大埂街，负责人胡鲁泉。平时一切场务活动情况，都由胡鲁泉按时具报上海办事处。每年春秋两季蚕期，总经理严惠宇来镇到场领导生产工作。

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以致滥发纸币，通货膨胀，物价暴涨，民不聊生。严惠宇把工资额以米量为基础，每月发放工资时，即依当时米价为标准。这才保障了职工的基本生活，进而稳定了职工的生产情绪。

由于场地东西绵延六、七十里，为了运输便利起见，农场置备了十轮大卡车两辆，三吨卡车一辆，小吉普一辆。为了一场和三场的蚕期密切联系，还架设专用电话，随时可以互通消息，五、六、七场也可就近联系。又为了解决肥料来源，在镇江市区建筑公共厕所五座；并向各饲养场、屠宰场联系，常年提取猪粪；还向镇江麦粉厂联系，购其麦灰，沤作肥料。

农场为了培养有文化的农工，在高资四乡试办小学四所，受到当地农民的欢迎。

严惠宇总经理几年来经营农场是积极的，也是有效益的。所有资金的筹集和费用开支，都是他筹划解决的。但是，到了一九四八年秋末，徐州贾汪煤矿已为解放区，由于交通阻隔，影响本场经常费的来源，严总经理不得不紧缩开支。因此，大量裁减了职工，各部职员，酌留1—3人，每个分场的工人，大约解雇了五分之四。一九四九年四月，镇江解放以后，镇江与上海交通阻断，场用经费依靠向镇江人民银行贷款应用。

一九五〇年十月四日苏南行署农林处派工作队到场领导生产，队长李卫裕，副队长何洛及队员十人。

一九五二年春季，由董事长冷御秋出面申请江苏省人民政府农林厅接收四益农场改为国营。同年12月27日，农林厅顾厅长来场接收，把一场、二场及五场改为江苏省镇江蚕种场，委派李卫裕为场长，何洛为副场长；把三场、四场改为国营高资蚕种场；六场改为国营高资茶场；七场改为国营下蜀茶场；八场拨给镇江市改建为市第六中学，九场拨给镇江市乳品厂。

现将四益农场各部门的生产概况简述如下：

一、蚕种部

蚕种部以春秋两期养蚕、制造农村饲养的改良杂交蚕种为主要业务，原种、原原种是在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才开始先后饲养的。一场、三场饲普通种（即杂交种），二场饲养原种和原原种。那时饲养的品种，是洽桂、华七、沅瀚、华九、沅文、华十，这些品种和普通种春期饲育蚁量，一般是4000—4400克。秋期由于容易发生蚕病，所以饲养蚁

量较少，最多是2000克左右。每年普通种（杂交种）的生产数量，约有7～9万张。

当时春期生产均比较稳定，但由于一九四六年桑田才开始恢复，自产桑叶供应不足，须向南京、仪征、埤城等农村购进桑叶补充，因此，一度传染上微粒子病，一九四七年春季，曾在溧阳县农村，造成蚕茧歉收。

秋期生产不够稳定，当时往往受到脓病和软化病的损害。因此，蚕期以前，所有蚕具蚕室，必须进行严密的防病消毒。特别在秋期，消毒更加细致严密。消毒的方法，蚕具采用蒸汽消毒，蚕室采用福尔马林、硫黄、升汞以及漂白粉等药品消毒。

养蚕制种工作是季节性的，所以固定长工比较少，当春秋两季蚕期，另雇熟练养蚕制种的临时工，到现场工作。

二、种植部

种植部业务范围遍及七个分场，所以常年职工比较多，一般有三百人左右。由部主任主持各分场的经营管理和日常肥培管理工作，每场各有技术员一人负责。各分场的生产概况，分述如下：

(1)一、二场在四摆渡，以培植桑树供应本分场蚕种部养蚕需要的桑叶为业务，由技术员宋锡仁负责日常工作。共有桑园九百二十多亩，计湖桑二十七万多株，剑持桑二万株。由于都是复壮抗日战争久经荒芜的老桑树，所以产叶量不高，平均年产桑叶：计春叶三千担上下，秋叶一千多担。当时蚕种部需要叶量不足之数，分向南京、仪征、埤城等地农村采购桑叶补充。经过几年的复壮工作和逐年开辟新桑园，产叶量逐年递增，因此，蚕种部饲养蚁量，相应的逐年增加。

(2)三四场在高资、桥头，也是以培植桑树、供应桑叶给本分场蚕种部养蚕为业务。由技术员张全元负责日常生产和供应工作。共有桑园六百多亩，计湖桑十七万一千多株。因为也是复壮的老桑树，而且患有严重的细菌病，虽经历年喷射波尔多药液防治，但效果不大，所以产叶量很低，平均年产春叶一千四百多担，秋叶六百多担，虽然也开辟了一些新桑园，因受细菌病蔓延，未能尽量发展。

(3)五场在七摆渡，有桑园三百八十多亩，桑苗圃八十亩，计有湖桑十一万多株，所产桑叶，专供一二场蚕种部育蚕需要。桑苗圃培育的桑苗，供给各分场桑园补植缺株及扩充新桑园应用。由技术员陈毓磊负责培育桑树、桑苗及供应桑叶、桑苗任务。

(4)六场在高资马步桥，有丘陵地三百八十多亩，其中二百五十多亩种植油桐，八十多亩培植茶树，培育绿化用树苗四十多亩。油桐种籽购自皖南及浙西，一九四六年春直播后，第三年即一九四八年春季就开始开花结果。油质和出油率，仅次于湖南洪江桐油，茶树种籽是向杭州龙井采购的，一九四六年春直播后，第三年春季开始采叶制茶，品质很好，有发展前途。

一九四六年一月，沈嘉徵初到镇江时，鉴于市区所有马路大部分没有种植行道树，而且极小部分所种的行道树，都是不一致的杂树。因此向上海市园林管理处联系，协商购买法国梧桐扦插枝条二十吨，由六场专辟苗圃进行扦插，三年后即一九四八年生长树苗，已高达一丈二三尺，当由镇江市移植在大西路、解放路、中山路等几条主要干路的两侧作行道树。目前主干最粗壮最低矮的法国梧桐行道树，就是四益农场六场培育的第一代法国梧桐树苗，其余主干较细的是以

后逐年自行繁殖出来栽植的。该场的日常生产工作，是由技术员汤我负责。

(5)七场是在下蜀镇东南的戴公山，有丘陵低山一千二百多亩，大部分面积直播油桐，小部分面积培植茶树，和六场业务大致相同，不过面积比六场约大两倍，由技术员姜天佑负责日常生产工作，一九四六年春季直播的油桐，一九四八年夏季，已开花结果，共剥得油桐籽6655斤，去籽壳后，净得桐仁3859斤，榨得毛桐油2176斤，滤得净桐油1828斤，油质和出油率虽不及湖南洪江油，但因幼树第一年开始结果，以后树龄逐年长大后，油质和出油率，一定会逐年提高，是有发展前途的。不过解放后，七场改为下蜀茶场，专门培育茶树、焙制茶叶，把开始结果的油桐树，全部砍伐，其实油桐的播种和肥培管理，所费人工，比其他树木少得多，在劳动力不足地区的荒芜山丘，最适宜开发利用来种植油桐。

三、园艺部

第八场是园艺部，由部主任王太一、技术员包鸿瑞负责经营管理。本部设在和平路，东南北三面环绕着马蹄形宽广的水池，环境很好。这里种植花卉和盆景，供市民需要，盆景中有上万盆的松柏、榆树、枸杞等珍奇古老盆椿。建有温室一座，培育热带盆景花木，沿池边栽植各种果树。另在面粉厂附近辟有蔬菜区，种植各种蔬菜，供应市场。

四、畜牧部

第九场是畜牧部，在牌湾街，由部主任陆理成、技术员谢叔皓负责经营管理及生产任务。饲养良种乳牛三十多头，种公牛一头，是从美国采购的良种牛。三四年后繁殖小乳牛二十多头。怀胎后期的乳牛，饲养在高资三场。所产牛奶

销售于镇江居民，供不应求。良种绵羊四十多头，饲养在桥头四场。

补白：

由易君左的住宅想起

苍 松

《闲话扬州》的作者易君左，在青云门的住宅，购自北伐后曾任溧阳县长及省建设厅秘书的胡惟和，并命名为“琴意楼”。看门的卢老，是其祖父易佩绅的听差；此人倒颇似《红楼梦》中的焦大。五十年代他还对人言：当年易佩绅在原籍筑“琴趣楼”，后来君左父顺鼎又另筑“琴心楼”，这已没出息了；君左题其宅为“琴意楼”，就更加没出息了。实际上，此宅是平房，易君左手书“琴意楼”三字镌刻在三块方砖上，嵌于门楣。庭中原有绿梅、茶花、辛荑，俱数百年物，极为名贵。1958年，这些东西全毁于大炼钢铁之中。

易佩绅，曾任清末江苏藩台。易顺鼎在庚子之后，曾私撰一联，讥讽慈禧：“金献民膏四万万，天垂珠泪一双双”。倒颇不负汉寿才子之名。

我是怎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吴 慎 裕

苏联著名作家A·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描写了俄国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的巨大冲击波下，如何从迷惘彷徨，走向革命的过程。三十五年来，我们这些原工商业者也有个“历程”问题。就资产阶级来说，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而被消灭，这当然是个“苦难的历程”；但作为这个阶级的分子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帮助之下，却从剥削者改造成劳动者，和其他劳动人民同登了社会主义“彼岸”，这个“历程”就又是十分光辉的了。

回顾一下如何渡过了这三十多年的历程，是十分有益的。漫长的“历程”有痛苦，也有欢乐；痛苦的，应成为我们的教训；而欢乐的，则应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

解放前，在上海滩上，我是个小有名气的“纸老虎”。蒋经国搞“八·一九”限价，说我的纸号“囤积居奇”，逮捕了我。我和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同狱同号七十天。出狱后。我和小杜接触较多。他多次劝我到台湾，我叔父也早做了走的准备。地下党及时做了我的工作，我也觉得：我才吃过国民党的苦头，共产党并未碰我一根毫毛；应该看一看再说。于是我未去香港，也未飞台湾。

一解放，共产党在上海就大力恢复生产，我看到共产党是关心国计民生的政党。我响应号召把停产十年的江明纸厂修复，尽管不少好心肠的人为我捏把汗，还有人认为我少年（当时我只二十八岁）麻木；我听信党的指引，生产当时急

需进口而又无啥利润的白报纸。在1950年华东纸张会议上，我受到表扬，《新闻日报》用半版篇幅作了报道。

这时还有两件事：工商业者谢淮训刚从香港回来筹建合众纸厂，遇上该厂经理谈某案发而牵连被捕，我向胡子婴同志反映了真实情况，次日就让我保释了。这样合众厂就不致因群龙无首而垮台。碰巧又因限电，合众厂无法生产，我通过市工商联向工商局反映，第二天厂里六百匹马力就通了电。这两个难题，一支烟没点就解决了。要在旧社会，起码三十根“大黄鱼”。

上海民主党派第一期干训班开办，我是市工商联保送的十名学员之一。在班内不但受了很深的教育，而且由朱鸿仪、唐慧敏二人介绍参加了民主建国会。

“三反”、“五反”开始，谣言四起，工商界很恐慌。陈毅市长派周而复同志在陕西北路市民建会内，召集十多个行业二十多位代表（我和朱鸿仪是造纸业代表），讲明了方针、政策，使大家安定下来。我对这次运动有了正确的认识，也敢于顶歪风。例如镇江有一个工商业者朱文荪胡说有十根金条放在我处，派人来提，被我痛斥。杭州有个工商业者经不起考验，竟拿出存款说是贪污犯寄存的，害人锒铛入狱。我向华东统战部反映，后来纠正了这起错案。由于我态度端正，我的两个企业均列为“守法户”，“五一”劳动节，我作为上海守法户代表参加游行队伍，顺利地通过了“五反”关。

在党的鼓励和事实教育下，我说服了叔父去港调回资金九十万元，筹办新厂——大东纸厂。新厂建在哪里呢？党要我建在可以就地取材，便于销售的镇江。但镇江我却人地生疏，亲友、同行都劝我厂建在上海。有个熟悉镇江的同行告

诉我，过去镇江两片纸厂夭折的惨痛教训，好心地劝我不要重蹈覆辙。但华东工业部领导同志说服了我，我毅然决然到镇江筹建了大东纸厂。经过一年时间，终于安装成功一台圆网机而投产，这一步“棋”又走对了。

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我被任命大东厂厂长。我感到有“用武之地”，向上级建议：调用上海、苏州、丹徒三十多家公私合营纸厂的闲弃打浆、造纸、切纸等设备，无需国家投资，即可使大东的生产扩大六倍，得到省、市领导同意。我即带人到苏州、上海，拜会过去的老同行们。他们都和我一样成了“公家人”，听到我来调废旧、闲置设备为社会主义立功，都热情地摊开帐本、打开仓库，并帮同出主意，随选随运。（后来补了中轻部无偿调拨单手续）。不到两星期，在十四个纸厂中就配齐可年产六千吨纸的四百多吨旧设备。记得我到的第一家厂，是苏州1919年创建的盛华纸厂，原工商业者朱葆良同志让我从仓库里把两只1936年他从日本进口，却睡了二十年觉的烘缸调走。在旧社会，同行是冤家，调走他的设备去增强对手的竞争能力，是根本不可想象的。然而，一旦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旧时代不可能的事业办成了。应该承认，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集中反映。

省、市领导听了我的汇报，也觉得惊奇；立即应我要求，调四名工程师，帮助设计，当年投产一台，第二年又上两台，这样就使1958年大东纸厂的生产出现了真正的“大跃进”。可见下表：

年 份	产 量 (吨)	产 值 (万 元)	利 润 (万 元)
1955	1015		
1956	1475.98	176.38	19.05
1957	3006.89	374.28	59.86
1958	6169.36	784.79	138.32
1959	8462.39	854.83	224.51

这一阶段，尽管在镇江的生活远不如我过去在上海时优裕，工作也辛劳有加，但却是我从事造纸工业最有成就，也最为开心的时期。我由衷地感到听共产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工商业者的最好归宿，我决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永远走下去，而且走到底。

我大胆地抓工作，敢做敢为，我和工人同志渡过好多沸腾的日日夜夜。

1966年浩劫来临，大东造纸厂是镇江第一个“造反”的厂、“文革”的重灾区。我们这些原工商业者“理”所当然地首当其冲。“四清”工作队进厂伊始就指责我“篡夺企业领导权，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其实，我如果“复辟资本主义”，又何必当初把在香港的九十万资金拿回来，那不是现成的“资本主义”吗？稍具常识的人就会理解这个问题。可是，被“左”的思想弄糊涂了的人却昧于常识，随便陷人于罪！但也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敢于顶逆风的。厂党委书记明知自己的乌纱不保，但也当了我面，怒斥了他们：“吴慎裕吃了很多苦，做了很多工作，你们全知道。现在反咬他一口，

这怎么能行？”他又对我说：“你所做的事，党委均有决议，我不赖！”接着他被罢官，我被赶下车间劳动。虽经多次冲击，但我对党的信心并不因此而动摇。我对一位有怨言的原工商业者说：“越是困难，越要乐观！”当时我就不相信：共产党会陡变其一贯的政策，这样残酷对待跟他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志。我坚信：共产党的政策的和煦阳光和春风终究会消溶那反常的“文革”之冰的。

由于长时期的大幅度减薪，生活十分困难。我“狗胆包天”，晚上躲在帐子里写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陈说困难，要求适当恢复工资。我请有回家自由的原工商业者寄给北京我弟媳，再由她换个信封寄给毛主席。一个月以后，“群众专政组”召集所有私方谈话：“群众不同意你们恢复工资，你们在小组里仍拿生活费。其余部份由张某从会计那里拿回来再分给各人，但不要泄露出去。等群众思想通了，再讲出去”。于是我们就秘密恢复了工资。其实，工人们是通情达理的。隔了几天，人保科忽然通知我们七个私方人员，去领一套新工作服。我拿时高呼“毛主席万岁！”科室人员都出来看“吴慎裕发疯”。事后一个原工商业者埋怨我说：“地富反坏右都发工作服，我们七年才发一套，喊的什么万岁呢？”其实，这些年来我们穿的七补八钉的百衲衣，很多老工人背后议论造反派无理，说：“人家来开了个工厂，多少人受益，现在这样亏待他，岂不恩怨颠倒？！”这才给我们发了新工作服。这又给我们上了一大课，使我坚信群众的大多数。

打倒“四人帮”，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党肯定原工商业者已改造成社会主义劳动者，落实了各项政策，党和人民给了我极大的荣誉，我被选为市民主建国会主委，重新任命

我为大东付厂长。今春，体制改革，我又被选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大东建厂三十周年时，同志们问我有何感想！我说：“我经历了旧社会的朝代更迭，饱尝过亡国奴的痛苦，深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新旧社会孰优孰劣，谁恩谁仇，我深有体会。概括我数十年历程的经验，就是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唯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条光明大道，我要毫不动摇地走到底！”

现在大东纸厂上下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当初惨淡经营的大东厂真是青春焕发，今年将生产一万三千吨纸，产值达二千三百万，利润达三百五十万。我觉得骄傲的是，每一吨纸里有我的一份汗水，每一元利润中有我的一点价值。三年后，经过技术改造，这个厂产量将翻番，利润将翻两番。我相信一定能实现这个目标的。我现在已六十多岁了，但将继续“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

——1983.10——

夏佩白先生二三事

金维藩

一八八七年农历九月十五日，夏佩白先生诞生在一个书香家庭。父亲夏观澜世居丹徒，少时两应府试未中，即无意科举功名，决心跳出“八股”羁绊，专研经史百家。澜老目睹清廷昏愤腐朽已极，革命烈火遍地，就设馆教书，终生培育青年。佩白先生幼年随父读书，思想言行深受陶冶。及长，在西学影响下，由书院转入中学；一九一五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当时澜老的弟子中，有政界显要愿荐之仕途，然佩白先生自幼鄙薄宦海浮沉，况军阀政府官贪吏污，更不愿混迹其中；因此一一婉词谢绝这些建议，立志继承父志，于是，执教生涯四十年从此开始。由于他执教认真，被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校长任孟闲先生聘为教务主任兼授物理。后又任江苏省立镇江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江苏省教育厅督学、省立镇江师范学校校长等职。一九四九年春，佩白先生抵制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诱骗，团结了全校师生，坚守岗位，迎接解放，使学校未有一草一木之损。先生长期从事教育事业，为培养人才献出了毕生的精力；解放后又历任镇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政协常委和市政协副主席、民主同盟江苏省委员会常委和市民盟主任委员等职，热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积极投入地方建设事业，在人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现就辑的材料，暂以先生二三事为题，写成下文：

一、授业解惑，卓有成效

佩白先生治学严谨，知识渊博，讲授知识态度严肃而语言温和，深入浅出，简练明瞭，谆谆善诱，深受学生欢迎。先生对于文理各科都有特长，能阅读外文书刊；在主持教务工作中，对各科教学工作，每多中肯意见，同仁们视为良师益友。

在多年讲授高中物理学中，发现课本教材，多抄袭外国材料，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他就广搜国内外资料，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编撰一套适合当时中学所需要的《高中物理学》；在抗日战争前，这部书为教育部选为中学课本，颁发全国中学使用。

二、为人耿介，廉洁奉公

佩白先生在五师、镇师等知名的学校时间较长，作风和能力久为人所器重。三十年代中，调任江苏省教育厅督学，负责检察全省各地学校和各县教育行政工作，针对问题，督促改进；并对教学人员有撤免之权。无如当时政治腐败，上下勾结，相互蒙蔽，形成风气；督学出发，事先通知，到达之后，设宴招待。因而真实情况，既无从获知；纵有发现，也难以解决。佩白先生认为教育事业，为树人的大计，如果优劣不辨，是非不分，效果、质量都无从保证。别人默许，我不为之。因此，他的视察都是秘密出发，直赴某校，全面了解，重点抽查，该奖该罚，十分公正。有的设宴招待，都一概谢绝，人情说项也就不堵自绝。

先生教育子女也很严谨。抗战爆发，长子寿仁到昆明同济大学读书。1939年11月间，先生寄一帧半身照片，在背面毛笔嘱辞，谆谆告诫：“爱惜身体，宝贵光阴，重视学业，礼貌待人，严格律己；不望一本不必要之书，不用一分不必用之钱；不涉政治，不近女人；守纪律，重道德；多交益

友，力戒嗜好。亲老家贫，弟幼妹弱，一切希望寄汝身上，勉之！”1950年，先生支持次子报名抗美援朝。1956年，先生支持唯一的女儿亚兰支边到新疆。1955年，子季仁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尽管扬师院长孙蔚民是先生的学生，但先生从未以子相托，要其子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到艰苦的徐淮地区工作。

三、清贫隐居，坚守民族气节

抗战爆发后，佩白先生暂避兴化；兴化将沦陷，又辗转逃到上海，从此闭门隐居，不抛头露面，连在内地读书的长子，也少书信往来。因为原江苏省政府教育厅长周佛海，已当了大汉奸，他知道先生未到内地，派了爪牙到处打听先生的下落，企图拉他“下水”，与之同流合污。佩白先生的家庭原住扬州，逃难时仅带了一些衣服和现钞。扬州沦陷后，也未敢派人回家料理，以至所有家具什物荡然无存，甚至连门窗都被人拆毁。然而祸不单行，夫人和两个孩子又先后患病而死；剩下三个幼孩只得托养亲戚，自己孤身一人埋名隐居不出，宁肯过着清贫困苦的生活，也绝不附逆，一直洁身自守。

四、困居“孤岛”，不忘教育事业

佩白先生困居上海租界，虽然贫而且病，但仍关心逃难青年的读书问题。他邀约了几位逃难沪上的已任教师的学生，在租界赁房，使镇江师范在上海复校，既解决一部分青年的就学问题，又使这些教师在精神上有所寄托，生活上有所安定。先生亲自承担筹组工作，出面向经营扬州三和酱园上海分店的学生借了部份经费，使镇师迅速复校开学。先生任名誉校长，经常到校指导工作，但不取工资和津贴。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租界，学校解散，先生从此埋

名不出，直到抗战胜利。

五、众望所归，主持镇师复校

抗战胜利后，佩白先生回到镇江。省教育厅正谋镇江师范复校。由于冷御秋先生的力荐，先生被任为镇江师范校长。该校原址在鼓楼岗的校舍全毁于战火，现在复校等于白手起家，一切均需从头做起；如房屋设备的规划，各科师资的罗致，学校经费的争取，教学计划的厘定，他都躬亲处理，日夜辛劳，使镇师在原省镇江民众教育馆旧址迅速复校，正式招生。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人民的内战，所拨经费微乎其微。学校物理、化学教学所需的仪器药品，十分短缺；先生有时竟拿出自己的工资交校方充添部分仪器、药品。捐俸兴学一事，足见先生对教育事业的热心。

六、主持正义，庇护进步师生

佩白先生幼承家教，把“重操守、持正义、律己严、待人诚”，视为立身之道；一生以爱护学生之“园丁”为己任，对学生、对同仁，爱护倍至。抗战前，蒋政权控制镇江极严，镇江师范一些同学为追求真理，砥砺学行，组织读书会，按期写文章、出墙报，有抨击时政之作，引起反动政府的注意，并逮捕了主编的学生。佩白先生力主正义，据理为学生申辩：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学生，追求知识，抒发感想，不应曲解、苛求，更不能以政治漩涡随意波及；否则真知灼见，必将断绝；有用之才，也难以成长。由于先生的奔走呼吁，深得舆论界同情，终使被捕者获释，继续留校读书。

1947年，学校音乐教师陈涛，思想进步，教了学生许多进步歌曲，如《茶馆小调》、《山那边呀，好地方》、《滚你的U.S.A》等；有一个特务偷了一张课堂散发的《滚你

的U.S.A》油印歌纸送省党部，并密告“镇师有共产党”！教育厅长找佩白先生谈话。先生一面力保陈老师没问题，一面私下通知陈老师，使之连夜转移，未遭迫害。

先生向以埋头办学为务，认为学校是弦诵场所而非喧嚣鼓惑的政坛，主张一切政治活动退出学校，不准三青团组织在学内活动。三青团组织竟不得不“秘密”活动，因此遭到国民党棍的忌恨。一九四八年镇师建大礼堂，须将门前两株银杏掘掉。于是党棍们抓住了“把柄”，大造舆论，竟在镇江报纸上以“如此校长——镇师毁坏千年古柏”为题，胡说“此树是范文正公手植”，大肆攻击，妄图籍此轰先生下台。但先生岿然不惧，一一据理驳斥了这些谬说，使党棍们的阴谋又不得逞。

解放初期，先生一度对工会、学联、青年团在学校内开展活动，也不以为然，稍有微词，甚至曾欲辞职。后来在实践中逐步改变了认识，自己也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了。

× ×

× ×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先生因患心肌梗塞症而不幸逝世，享年七十三岁。二十四日下午，由各机关、团体和各界人士组成的“夏佩白副市长治丧委员会”在金山寺为先生举行了公祭仪式。

（本文承夏艺瑛、夏寿仁、夏季仁等同志提供大量材料，谨此致谢。）

附录：

夏君佩白哀辞

蒋逸雪

余之知有夏佩白君，远在四十年前；识君，则近十五年事也。癸亥，将去淮阴，拜别先师徐公美先生，先生方与客论江苏师范教育。客谓：“本省言造士，当以淮、扬两校（指第五、第六两师范学校）为最。”先生谓：“扬校优异，固由得长，而贾剑青、夏佩白二人（君任教务，贾任训导）亦与有力焉。”此余知君之始也。丁亥，耕牧京口菊花山下，君时已长镇江师范学校，猥以讲席见畀，至以识君，并相与共晨夕者达十载。

君治物理，有专著行世（大东书局出版）；而于诗文有特好，传其尊人观澜先生之学。观澜先生擅案牍，游幕四方，有声江汉间。君自幼濡染，所为文，字句精核，脉理密致，老于刑名者欲摘其疵而不可得。省遇大政，士有献替，多推君主稿，一纸流传，万口交誉。然诗则乏音致，每与余酬唱，下询短长，余尝笑谓之曰：“君诗，申韩也；以申韩为文，仍不失为大家；以之为诗，则少蕴藉，诗与文体势本殊也。”君颌之，终不能易其格。

性方严，与人不稍假，心所然否，辞色无隐。有造蜚语谋中君者，而君之得任益专。说者谓君平日耿介坦荡之效，余则幸君暮齿之得逢明时也。君固果于自信，然遇名德，则肫肫拳拳，致其景慕。初，先师佐理江苏财政，时东台海滩新涨，由财厅领照，即分有其地，人以致富捷径目之，奔兢日众。或黝君同谒先师，先师谢曰：“诸君所图，原非规章

所禁，但清流讵容作浊事！亲故以此来者，吾必峻拒之。成人之美，尝闻其义；背斯敢相从乎？”君屡为我称述此事，深叹先师风操之不可及。其服善有如此。

余与君论事，合者十七、八，不合者常十二、三；稠人广座，或争持不相下，君不以为忤，转语所亲曰：“诤诤者，缓急可恃；诺诺者，实未足置信也。”余自惭无似，君殆欲诱而进之欤？君齿德皆上余，顾相处日契。余奉调北来扬州，君不久亦专长镇江市政。岁时南渡，把晤必畅谈，疲茶不支，犹唯恐余之去也。已亥夏，重建多景楼于北固旧址，落成之日，邀与同游。余念君年事高，又当盛夏，不宜攀跻，遂辞焉。呜呼，孰知此即永诀之日耶！

君矻矻自守，履旧能不失其清；翼翼宣赞，践新能矢其忠勤。故其歿也，公葬于夹山之麓，礼也。余曾挽以联云：

“居旧社会卅年，清白乃躬，疾风方知劲草；在新中国十载，步趋唯党，生荣合得死哀。”盖纪实也。

自君长逝，每过其庐，辄不胜凄然之意，以语相知，靡不同感。噫，微君之行谊卓卓，乌能系人思至于斯耶！爰为辞以抒哀，其辞曰：

“中有所主兮，不因物迁；出于污泥兮，未掩其妍；滔滔皆是兮，益见君子之贤。果于自信兮，时有所偏；日月虽食兮，终无害于丽天。逢盛世兮值华颠；矢忠勤兮得党专；‘人间重晚晴’兮，诵义山诗句而每感辘然。陟菊岭以遥望兮，佳城郁乎云烟；有德自不孤兮，赵墓（君坟去赵伯先墓数武）与之比肩；维遗爱之难忘兮，令名将照耀夫邑之简编。”

一九六一年二月，扬州原稿；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复阅于镇江。

我所知道的金运贵

郭维庚

中国戏曲曲艺词典第三七〇页，专条介绍了扬剧名演员金运贵。提起金运贵，扬剧界和扬剧老观众没有一个不知道她。金运贵创造出的“梳妆台”多种唱法，已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被称为“金调”，风靡至今，影响颇大。不仅为群众所喜爱，不少人都会哼上几句；而且直到现在，每当舞台上又响起委婉幽雅、清新流畅的“金调”时，剧场内就会沸腾起来，甚至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金调”所以能在观众中享有这么大的声誉，这是和她坎坷不平的道路与业精于勤的精神分不开的。

悲惨的身世

金运贵祖籍是湖北黄陂人，一九〇七年生于上海，原名刘秀卿。父亲叫刘荣光，是个铜器钻花手艺人。据金运贵讲，他父亲的一双长满老茧的粗笨大手，却能描龙绘凤、刻字镂花。精雕细钻，技艺不凡。但是在旧社会，尽管手艺精湛，也只能勉强糊口，有时候一日三餐都难以保证。加上中间剥削，苛捐杂税，地痞流氓捣乱，伪警察敲竹杠，象洪水猛兽一样袭击着他，生活十分艰难。

在这样一个家庭长大的金运贵，从小就学会一些钻花手艺。由于她很早就死了母亲，父亲就将她这一根独苗，骄生惯养、百般宠爱。自幼就把她当男孩子看待，短发、分头、长裤、对襟褂。她自己也和男孩子一样，手不停、脚不住，翻墙爬树。虽然她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瘦得皮包骨头，但

仍改不了顽皮的习性。

金运贵自幼就生得五官端正，秀丽俊俏，加上有一副天赋的好嗓子。在她七岁的那一年，就有一位好心的邻人，劝说她的父亲送她去学戏。但是，在旧社会里，优伶和娼妓混为一谈，社会地位比手艺人还要低下，因此，她的父亲情愿让她在家学一辈子手艺，也不愿意送她去学一天戏。后来，她父亲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一位叫侯金奎的京剧艺人，相谈甚欢，十分投机，不久就成为莫逆之交。在侯金奎的怂恿下，金运贵拜在侯的门下，学了几个月的京戏。侯金奎是唱老生的。因此，京戏老生的骨子戏如“李陵碑”、“三娘教子”、“空城计”、“硃砂痣”等，金运贵都学过。谁知，这段学戏生活，竟为她以后学唱扬剧、踏上舞台，垫下了一块基石。

她十六岁时，在她平静的生活中投进了一枚石子，激起了不平静的浪花。从此，她渡过了一段漫长的悲惨痛苦的岁月。她父亲因为欠人赌债，年关受逼，得人一百块钱礼金，就把她嫁给一个伪警察局的巡长。这个人叫张国权，蛮横凶暴，流氓成性，比金运贵大头二十岁。结婚以后，动不动就拳打脚踢，金运贵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备受虐待。有时，张甚至用手枪威吓她，夫妻之间毫无感情可言。丈夫粗暴的习性，野兽般的行为，使她无法忍受，终日悲悲戚戚、走投无路，曾几次吞红洋火头自杀。虽然获救，但感到人心险恶，前途渺茫，竟想到济良所去，了此一生。后来，她的丈夫因内部倾轧，被伪警局解职回家。由于失去生活来源，再也不能狐假虎威，敲诈勒索，反而要依靠金运贵父女钻花生活，因此凶恶气焰暂时有所收敛，金运贵的日子才稍好过一些。

辛酸的舞台生涯

一九二四年，一个厨师出身的扬州人，叫陈德元，在上海创办了一个女子扬剧班，名“新新社”。开始只有三个学员，后来，金运贵由于生活所迫也参加了这个班，改名新善贞。第一班共收了八名艺徒，这是扬剧历史上最早的一班女艺徒。进班以后，学的都是扬剧对子戏，如《探亲相骂》、《小尼姑下山》、《种大麦》、《磨豆腐》等。教师有名琴师江腾蛟、李庆元（筱荣贵的父亲）等。金运贵开始学的是彩旦、小花脸，第一个戏就是《探亲相骂》。由于她天资聪颖，当《探亲》学会时。其他同学学的戏，她也同时学会了。这个女子班于同年二月学戏，四月就在永安公司天韵楼演唱了。从此，她正式踏上了戏剧舞台，开始了舞台生涯。她们先后在“永安”、“大世界”、“神仙世界”、“如意茶馆”等处演唱，很受观众欢迎。当时最受观众欢迎的戏为《活捉》、《下山》、《探亲相骂》等，这几个戏都由金运贵主演，并成为她的拿手戏和看家戏。

当时，扬剧的名艺人史寅生、戚雪梅等也在上海演出，金运贵常与他们配戏，配戏时则演娃娃生，即剧中的幼儿。如《瓦车蓬》中的安寿保，《江流认母》中的陈江流，《杀子报》中的王官保等，一般唱老生腔。（很多名演员在幼年时或稍长一些都常演娃娃生）。由于她幼时近似男孩，孤苦伶仃，因此演娃娃生时，感情逼真，深得观众和老艺人的喜爱。

一九二七年，金运贵的丈夫张国权病故，她的精神枷锁得以解除，很想出外见见世面。乃和她的女友，京剧王家大班的王秀英、王秀云姐妹结伴，改名为王秀卿，远离上海，同去福建，唱了一个月的京戏，老生、老旦、小生戏都唱。

后来，由于地方把头的敲诈勒索和卖票收入被人骗去，实在演不下去了，只好又回到上海。

回上海后，又在新新公司重新唱扬剧。有时候也唱唱堂戏，堂戏即堂会戏，是大户人家在私人住宅或假饭店、旅馆，为喜庆寿辰而举办的演出。

在这一时期，由于金运贵扮相漂亮，演唱俱佳，名噪一时。社会上有些豪门巨绅、地痞流氓对她不怀好意。当时，上海有一个大亨想娶她做姨太太，花钱买通领班从中说合。由于领班用了这个大亨很多钱，就对金运贵威吓诈骗、软硬兼施，逼她改嫁。但金运贵坚决不允，并当众骂了他，这就捅了马蜂窝。过了几天，领班带了一帮地痞流氓来到戏院，想趁金运贵晚上散戏出门时，洒硝镪水，毁容报复。幸亏有人事前通风报信，她改从边门出去，才免遭毒手。金运贵虽然暂时摆脱魔影，但在上海随时随地都有遇害的危险，便连夜乘车离沪，逃往南京，投奔正在南京演出的女子扬剧班同学筱兰珍。但不巧得很，就在金运贵抵宁的前一天，国民党当局以“维扬文戏聚众歹人，妖言惑众、有碍风化，不登大雅之堂”的莫须有罪名下令禁演。这时，金运贵住在南京海乐春旅馆，一筹莫展，焦急万分。就在这个时候，正在南京大世界演出的京剧王家大班姐妹，得知金运贵在南京，便邀她再度去王家班。这样，她又改唱京戏，取名为王继芳。她在南京，一直唱到第二年的六月份。

一年过去了，王家大班在宁业务日趋清淡，领班的提出要回上海演出。这时，金运贵由于长期在外，不免念家，又加上时过境迁，因此便随班回沪。谁知到了上海，新新社的同班姐妹筱兰珍，又来约她唱扬剧。这时，她对扬剧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自己又有了一些京剧的基础，希望在扬剧上

有所创造和发展。加上扬剧比京剧简单，当时的扬剧小生只要有两件褶子就可以上台了，但京剧不行。因此，她毅然决定离开王家大班，随筱兰珍到先施公司唱扬剧，以唱小生为主。

从这时候起，她的艺名改为金运贵，在这个时期唱过的戏有《分裙记》、《秦雪梅吊孝》、《珍珠塔》等。连唱几个月，甚为轰动。接着虹口新舞台又邀她去唱，同台的男花旦有吴双喜、吕正才等，吴双喜挂头牌，她挂二牌。由于她唱戏卖力，观众喜爱，不久就改挂头牌。以后，又到新新公司游乐场演唱。

“人怕出名猪怕壮”，在新新公司的五、六年中，名气大了，但受的气也更大了。旧社会的艺人，尤其是出了名的女艺人，随时随地都要应付突如其来的麻烦和迫害：包打听的敲竹杠，地痞流氓找外快，黄色小报上的谣言和侮蔑，反动军警和老板小开的戏弄，戏老板的威胁和要挟等等。有时候，金运贵一出门，身后就跟了一群人，满嘴的“金先生”，伸手却要“金戈戈”（钱）。如果稍有不如意之处，坐在黄包车上，礼帽就常有被人打掉的危险。这些都使金运贵感到头痛。有时，她心灰意懒，甚至想退出舞台。卅岁那一年，她终于离开了“新新”，在家休息了三、四年，除了电台上挂着捐款、救济招牌的义唱外，对所有的戏院、堂会的邀请一概谢绝。但是，时间长了，物价不断增长，生活开支越来越大。她卅三岁时，父亲去世，又背了不少高利贷，于一九四〇年，她不得不重操旧业。

当时，由救火会邀请她到新世界挂头牌，唱本子戏。和她同台演出的有高秀英、王美云、高玉清等。在新世界的演出，每晚七到九时是高玉清的武戏；九到十一时是金运贵的文

戏。

到了一九四四年，由潘喜云介绍，认识了扬州大舞台的老板杨正祥。经他邀请去扬州大舞台演唱。合同一个半月，包银十万块储备券。这是她第一次到扬州，同台演出的有潘喜云、潘玉兰、筱秀兰、十岁红、小奎童等。到扬州后，几天前就挂了客满牌，由于场内不对号，很多观众在太阳还没有落山的时候，就带着饭盒前来看戏。戏老板发了一笔大财，但当地的一些光蛋流氓，看了眼红，就想和老板杨正祥分红。但是由于杨正祥后台硬，他恃仗有人撑腰，根本不睬他们。于是，这批流氓恼羞成怒，嫁祸于金运贵。一天，当她乘黄包车外出时，一群光蛋流氓围了上来，不容分说，上来就打。这样一来，激起前后台的义愤。后台老板杨正祥也表示当晚不开锣，并对金运贵说：“话不说好，不唱戏。”但金运贵认为票已全部卖出，得罪她的只是一小撮光蛋流氓，不能因此而让观众跑空趟，坚持照常演出。当晚演的是《丁郎寻父》，当金运贵唱到其中一句台词：“欺负我们异乡出外的人”时，由于情绪激动，声泪俱下，引起观众的同情，上台台下一片掌声。

扬州合同期满后，她又回到上海，在通商旅社，与筱玉香、筱艳香、筱金鸾等同台唱连台本戏。她自编的连台幕表本戏《新婚一度》就是在这个时期演出的。由于当时连台本戏风靡一时，几乎所有的剧种，戏班都争先恐后的上演连台本戏，并且以机关布景、华丽服装，招徕观众。因此，金运贵自编自演的连台本戏《渔家女》、《新婚一度》、《再生鸳鸯》、《两世夫妻》等也应运而生。《新婚一度》上演后，很受观众喜爱，上座率高。一天演一本，往往是一本演完了，散戏后再写下一本，第二天晚上就上演。后来愈写愈

多，收不起头来，一直写到十八本才结束。由于在通商旅社演连台本戏演红了，太元坊的老板又邀她去演出。当时太元坊是唱“大开口”的，金运贵去后，也唱“小开口”了。过去，扬剧大、小开口是分开来演出的，早在一九三五年就开始合并了。两者的区别是：前者又叫维扬大班，只用大小锣鼓，不上丝弦，大都唱宫廷戏或宗教色彩较浓的戏；后者又叫维扬文戏，不用大锣大鼓，仅用管弦乐伴奏。

在通商旅社前后，金运贵曾一度在虹口明华楼短期演出过。这个戏馆的老板是个流氓，手条子辣，要钱狠。到他那里唱戏，既要在戏馆里唱，又要唱堂戏，有时，一天唱两场，收入均归他，金运贵到明华楼后，就向老板提出，唱戏馆就唱戏馆，唱堂戏就唱堂戏，两者不能并行，否则合同就作罢，老板表面上答应了。但后来有个叫徐大狗子的大流氓，他老婆过生日，邀金运贵到金门饭店唱堂戏，老板惧怕徐大狗子，但又不是真心想把戏馆戏停了，让金运贵去唱堂戏，因此就推说金运贵不愿意。这下子惹恼了徐大狗子，背后泼口大骂金运贵：“唱戏的花子摆什么臭架子！她怕低了身份，就非要她唱，唱完了再给她一顿生活，没有什么便宜给她讨。”在徐大狗子和戏老板的逼迫下，金运贵只好去金门饭店唱堂戏。果然不错，刚唱完堂戏，就被一帮流氓打了一顿。金运贵分辨了几句，他们还扬言们抓她到宪兵队去。

“要金腔，不要老调”

虽然环境十分恶劣，时刻都会有意想不到灾难落到她的的身上，但任何艰难险阻都动摇不了她对艺术的忠诚，对发展扬剧事业的决心。当时，扬剧的文武场和舞台装置都很简单，没有布景，乐器也只有二胡、四胡、一个小锣放在凳子上敲。后来逐渐有了一些改革，开始用些软景片，乐器也用

了锣鼓加点。对扬剧唱腔，是否也需要改进的问题，金运贵开始产生了一些新的看法。她觉得扬剧的曲调丰富、优美、曲牌众多，有些曲牌行腔婉转，如行云流水，娓娓动听，但都给刻板的七字句唱得断断续续。一句曲调都是每唱两个字顿一顿，等一个大过门拉过去，再唱下两个字，观众很不耐烦，演员也无从发挥内心的感情，做到声情并茂。由此，她渐渐地喜欢在唱词中加字，而且多半在第三句上堆字，最多的一句能堆到卅多字，使语句前后连贯，既便于抒发角色的感情，听起来也悦耳动听。当她第一次唱《梳妆台》堆字时，一口气唱了廿六个字，观众席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就连很多在场的行家都惊叹不止，深为敬佩。这虽然还是一个开始和尝试，但却为今后“金调”的逐步形成、发展和成熟，奠定了基础。

此后，她在新新公司演唱期间，“金调”有了新的发展，逐步受到更多的观众的欢迎和大多数同行的赞赏，这就更激励她日夜琢磨，刻苦钻研，想在扬剧唱腔上再有一个新的突破。不管严寒酷暑，清晨夜晚，她都坚持练基本功。经常对着脸盆喊嗓子，对着镜子练身段。每天晚上散戏后，一边抱孩子，一边把《梳妆台》当催眠曲哼。同时，她还吸收其他剧种唱腔的长处，溶化到自己的唱腔中去。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也有个别同行心怀妒忌，风言风语，讥讽金调是“一把调”、“四不象”，把艺人金运贵改为异人金运贵等等。金运贵听了以后非常苦闷，一度曾怀疑她的改革之路是否走错了。但大多数同行在她困惑不解的时候，向她伸出了支援的手。她的私房胡琴李庆元为了发挥金运贵的唱腔特长，在伴奏上下了一番功夫，结合金运贵嗓门条件，在二胡指法上翻调，致使金运贵在演唱时能够得心应

口，尽情发挥。观众的情绪和反响，对她更是最有力的支持。她常说：观众的面孔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可以打开观众的心灵，了解他们欢喜什么，反对什么。每当她在舞台上引吭高歌金调“梳妆台”时，赢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掌声和骚动，疑云很快地就消失了。但她还不放心，自己常和看客交朋友，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甚至花钱请人看戏，请他们在观众席上听取看客的即席议论，并在散戏后跟随观众，吸收反映。从观众的很多议论中，她吸收了许多宝贵的营养，更坚定了她对唱腔改革的信心。尤其是在一次轮到她休息的时候，由她的徒弟小金运贵上台演唱。由于她是初学金调，还不能运用自如，观众听了不象，就在场内起哄，高喊“要金腔、要自由调”、“不要老调”，使戏无法继续演下去。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金调已在观众中享有盛誉，观众热爱金调的情绪，已经达到如火如荼的境地。

在这一时期，上海的堂会风很盛。一些大老板、阔太太都欢喜请艺人到家里唱堂戏。很多有“身份”的阔太太，大都是苏州、宁波和上海人。金运贵去唱堂戏，她们点的戏几乎都是《珍珠塔》里的一折“方卿唱道情”。为了使她们听懂，不得不在唱腔上又作了一些改革，行腔吐字，多用中州韵，而不用扬州话，在唱腔上堆字变调，变化更多了一些。同时在表演、服装、道具等方面也比较认真、讲究。如《珍珠塔》里，方卿唱道情用的道情筒，是她父亲的同行用紫铜精雕细刻，精心制作而成的。从这时候开始，金运贵就有了“活方卿”之称誉。

金运贵的文化水平不高，只有初小三、四年级的水平。但她为了演好戏，经常向人讨教，补习文化课，把容易混淆

的生字写在字块上，随身带，随时看。并且利用休息时间，看戏、看电影、看七字书，学习编写幕表戏。那时候唱的戏多是幕表。所谓幕表，就是唱的戏没有固定的剧本，只有大纲，唱词均由演员在台上任意抓词，即兴发挥，所以水词很多。这种幕表制，据民间传说是从唐明皇开始的。她在一九三一年开始学习编写幕表戏，到解放前夕，共写了卅二个剧，一百廿二个本。由于历史的局限和金运贵本人思想水平的限制，这些剧本的内容大多是不健康的，有的糟粕和精华参半。但在当时，仅有初小水平的金运贵就致力于学习写戏，这种精神是可贵的。同时，她一度产生的创作激情也是不可抹煞的。有一次，她接到一封观众来信，信内附一张剪报，内有后母逼死儿子的新闻。她根据观众的要求，很快就编成幕表戏《后母恨》。演出时，感情激动，衣襟都哭湿了。由于她能经常演些新戏、新闻戏，在唱腔上又富于改革精神，因此，在新新公司演出期间，虽然各个场子的戏班、剧种繁多，而她始终是佼佼者、遥遥领先。

从“戏花子”到人民演员

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金运贵度过了廿五个舞台春秋。在这廿五年里，一面是凌辱，一面是勤奋；一面是生活的拮据，一面是刻苦的钻研。“不经一番寒彻骨，哪有梅花扑鼻香”，由于她的顽强的毅力和坚强的信心，终于使她的艺术能够立足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开始绽出了灿烂的新蕾。

“雄鸡一唱天下白。”在旧社会，金运贵虽然已成为“角儿”，但其社会地位仍然是一个为人轻视的“戏花子”。廿五年辛酸的舞台生涯，使她深深地感到在那样一个万恶的社会里，唱戏难、做人更难。因此，当上海解放以后，在共

产党领导下，她立即满腔热情、欢欣鼓舞地参加了扬剧协会，并积极参加协会组织的各种学习和会议，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逐步提高认识和觉悟。同时还参加各种义务演出，结合形势、编写剧本，她自编自演的《三打节妇碑》，连演十八场不换戏，创当时扬剧剧目上演的新纪录。

一九五二年八月，她应镇江市金星扬剧团的邀请，来镇江参加该团，从这时起她就在镇江“落户”了。

一九五五年五月，金星扬剧团根据中央文化部的要求，在镇江登记，改名为镇江市扬剧团。自此，剧团除主要为本地服务外，经常在大江南北巡回演出。

在演出中，她不仅积极坚持上演经过整理的传统戏，而且还克服各种困难，积极参加现代戏的演出。她演出的现代戏有“红色的种子”、“红霞”等。

一九五七年参加了江苏省第一届戏曲会演，获得一等奖。一九六〇年又参加江苏省文教卫生群英会，获得奖状，曾当选为市人民代表、市文联委员和副主席、省政协委员。金运贵经常激动地对人说：“在旧社会，戏子被人看不起；新社会，戏子当家做主人；没有共产党，那有幸福的今天”。由于她对党和人民政府的热爱，当时虽已年近半百，又有胃病，但仍然和全团一起，背起铺盖到苏南、苏北、安徽等地演出。有时还跋山涉水，送戏下乡，和大家一样吃大锅饭、住牛房、睡稻草铺。虽然生活艰苦、演出劳累，但她从不叫苦，而且一贯保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台风，即使有点伤风感冒，胃疼发热，她仍然带病上台。一九五九年五月，剧团在滨海东坎镇演出时，突然胃疼得比较厉害，剧团领导劝她休息。但她认为剧团第一次到沿海地区演出，观众又非常热情，早几天，票子就预售一空，当晚又是她主演的炮戏

《借子》，不能让观众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仍坚持演出。当她化好装，将要走上舞台时，胃疼得更厉害了。她强忍着疼痛，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把戏演完，在台上，胃里几次泛出血液，几乎就要吐了出来，但她以顽强的毅力，强咽下去了。戏演到终场，大幕刚刚落下，金运贵再也支持不住了，大口的血喷在鱼鳞片上，昏了过去。前台赶忙联系车子，和剧团负责人一起，把她送到医院。全团演职员为她的精神所感动，纷纷来到医院，排起队来，要求为金运贵输血。镇江和当地的党和政府都十分重视，给予极大的关怀和照顾，竭尽一切力量组织抢救。

一九六〇年八月，镇江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扬剧训练班，由我兼主任，金运贵、徐平兼副主任。当时，金运贵大病初愈，病后还需要很好调理。但她为了扬剧事业后继有人，带病坚持教戏。“冬练三九夏练伏”，她每天不厌其烦地教学员练腔吐字，手把手教学员身段动作，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地传授。在生角、旦角中，她尤为精心地传授金派“梳妆台”，使金派唱腔得到继承，并有了比较出色的传人，如姚恭林、金桂芬等。

一九六一年六月，在贯彻中央文化部提出的“继承遗产、挖掘传统”的精神中，金运贵积极参加这一工作，并在新文艺工作者的帮助下，整理了“羞姑”、“哭灵”两出折子小戏，于一九六二年参加了江苏省扬剧流派会演，得到好评。

扬剧艺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解放以后，金运贵在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鼓舞下，更加发奋地致力于唱腔的改革。当时她所在的镇江市扬剧团，演员阵容整齐，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一台无二戏，对她唱腔

艺术的创造和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琴师王少华的二胡，烘云托月，同入佳境，为演员的演唱生色不少。因此，在这一时期，她在唱腔上的改革又有创新。

她在演出扬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时，根据悲剧特点，从人物感情的需要出发，设计和变换唱腔。过去的金调“梳妆台”一贯唱得较高，她在这个戏中改唱低调，表现了悲痛的心情。以后，金运贵又继续创造几种不同的“梳妆台”唱法，如《梁山泊与祝英台》中，《临终》一场的“梳妆台”和《楼台会》里的“梳妆台”的唱法就不同；而《珍珠塔》《羞姑》中的“梳妆台”则又完全是另外一种节奏。除“梳妆台”以外，她对其他曲牌如“数板”、“补缸”、“哭小郎”、“鲜花”等达十七种，也进行了改革，不同于原来的唱法。

由于党和政府对地方戏剧的重视和金运贵自身的努力以及全团同志的通力配合，金派唱腔日趋成熟，春风催发的瘦蕾已日益丰腴，成为芬芳四溢、光彩耀人的盛开花朵。特别是金派《梳妆台》，已成为扬剧艺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六日，镇江市人民政府为了加强对“金调”的研究，帮助金运贵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唱腔艺术，特邀请了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在我市工作的音乐家宗震名、汪秋逸及扬剧团的作曲张欣木，一起参加讨论研究、记谱总结。金运贵、筱荣贵等也参加了这一讨论。

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金运贵在唱腔上有几条经验很值得重视：1. 兼收并蓄，融会贯通。金运贵曾经学过京戏，京戏是板腔体，不同于扬剧的曲牌体，她能够把京剧的大腔大调吸收到扬剧的唱腔中来，并且溶化进去，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金运贵不仅向京剧学习，而且还向各种小曲学

习。扬剧是小曲的仓库，湖广小曲和扬州小曲是中国两大小曲系统。扬剧是曲牌体，本身就是小曲，金调“梳妆台”就是在最老的《梳妆台》曲牌上发展起来的。把许多优秀的曲调吸收进来，再加以变化，集众家之长，才能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2. 向别人学习，也要称称自己的分量，要结合自身具备的条件，扬长避短，加以溶化。金调堆字的特点是音调平行，音域超越不大，阶梯式的。金运贵根据自己的特点，成功地运用了音节重复，唱腔老实，平易近人，落音不变，不用奇声怪调，不哗众取宠，和说话相似，因此缩短了观众和演员的距离，听起来亲切舒服。音节重复在音乐里是一个重要手段，金运贵虽然不懂乐理，但她从实践中摸索出的经验，是符合规律的。3. 瓜熟蒂落。力之所及的戏尽量唱，要唱足，唱到最高峰，力所不及的戏绝不冒险，更不能在台上装腔作势，画蛇添足。天下没有什么戏都会唱，什么戏都唱得好的。著名京剧演员刘鸿声唱了一辈子戏，最拿手的也不过是三斩一碰（即斩黄袍、斩子、斩马谡及碰碑。）金运贵唱得最好的戏也只有《方卿羞姑》、《宝玉哭灵》、《借子》、《僧尼下山》等那么几出。4. “业精于勤 荒于嬉”，勤学苦练，活到老，练到老，永葆艺术之青春。由此可见，金运贵的唱腔所以取得观众的承认，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正当人们对“金调”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以便更好地发挥其特点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她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黑线人物”、“反党份子”等帽子，受尽了摧残和迫害，于一九七〇年一月含冤郁闷而死。

一九七六年，粉碎了“四人帮”，我国迎来了又一个万

紫千红、百花争艳的文艺春天。为人民群众所喜闻的金派唱腔，终于又重演于红氍毹上，葆其美妙之艺术青春。

陈直教授赠稿家乡

明 光

陈直，镇江人，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他一生苦学，著述宏富。1980年病逝前，捐赠镇江市图书馆未刊手稿十八册；计有《说铎(玺的古写)堂金石经眼录》二册，《汉魏六朝碑刻题跋》三册，《摹庐书跋》二册，《汉鐙汉鼎小记》、《汉碑额举例》、《北魏墓志题跋》、《书画品注残稿本》、《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考证》、《说铎堂古铎印存考略》、《秦居瓦谈》、《摹庐自写精骑诗卷》、《东坡词话》、《慈萱室骈文残稿》和《朱育对濮阳兴问校注》等各一册。陈桑缅怀尧梓、嘉惠后学的可贵精神，将长远为镇江人民所怀念。

“画郎中”徐世洪

徐大奎

国画和书法作品，是中华民族特有的艺术珍宝。但是，好字好画，要求有好的装裱。“红花还得绿叶衬”，一件好的书画作品，除了作家高超的艺术水平而外，精良的装裱也是不可少的。装裱得好，不但能使作品增色，而且利于珍藏保管，可以“延年益寿”。装裱不好，就会使作品大大逊色，甚至遭受不应有的摧残，周身暗疾，缩短“寿命”，往往令书画家、珍藏家为之扼腕、叹惜。于是，就出现了书画装裱业和许多著名的装裱师。先父徐世洪就是其中之一。

历代书画家、珍藏家无不注意装裱工作。尤其是旧画，或因原裱不佳，发生空壳脱落；或因收藏不善，受潮发霉，虫蛀鼠咬；或因在流传过程中被折断、撕破；或因长期埋在地下而朽烂、叠粘；更需觅得有妙技之“良工”，重新加工整理，去污霉，揭补洞，全色填缺等等，以恢复艺术效果和延长艺术品生命。装裱业是我国特有的传统手工技艺。《唐书·百官志》记载，早在唐朝的史馆、崇文馆，就设置了专职装潢人员。大书法家褚遂良做过监督书画装潢的官，并且亲自参加过装裱操作。宋代也设有专门职官主管装裱书画名作，社会上已有装裱行业。明代周嘉胄作的《装潢志》在阐明装裱的重要性时说：“古迹重裱，如病延医。前代书画历传至今，未有不残脱者，苟欲改装，如病笃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则随手而毙”。主张“不遇良工，宁存故物。”现代著名大画家傅抱石先生一九五七年为《人民日

报》写的《裱画难》一文，称装裱师为“画郎中”，比喻得十分确切。

我国自南宋、特别自明清以来，书画家、鉴赏家和收藏家多在江浙一隅；而装裱书画的能手巧匠亦多出此域，其中苏州、上海又是最大的据点。

镇江的书画装裱业，也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起伏的。远且不谈，仅就一九三七年抗战前后，到解放后一九五六年的手工业合作化之际的二十年内，西起云台山、小码头，东到南门街、宝塔山的市区范围内，裱画店先后就有杨方贵的天宝斋、罗吉安的德古斋、杨衡义的墨香斋、戴焕的锦云斋、曹如庆的鉴墨斋、陆云山的云古斋、曹伍的翠竹斋、崔广信的锦华斋、王松春的松古斋、徐世洪的两宜斋、陈茂庄的凌云阁、储立贵的青云阁、马光林的松光阁、李月波的霞光阁、王振泉的清笔轩、何达明的何达记、陈裕善和贾子彝的南岭书画会等十七户之多。这些裱画店，一般都以新旧来件加工装裱为主，品种大体有中堂、对联、立轴、屏条、册页、镜片、手卷、宗谱等类。至于装裱石刻、碑帖、经文、拓片，那就另需特种专长，一般的裱画店是不能承担的。他们能否兼营字画文物的收买，还要看这个店主人的艺术修养和鉴赏能力而定。

近半个世纪以来，镇江的裱画业，几经历史辗转；特别是在解放前的一、二十年中，上述十几家裱画店，由于种种原因（如技术、质量、信誉、活动能力以及时局影响等），装裱业务长期不振，处于风雨飘摇、汲汲可危的境地。有的是两天打鱼、三天晒网，经常空潢板；有的长时间无人问津，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不得不被迫歇业改行。同时，他们本人虽有技术，已处于无用“武”之地，所以他们的子女

后代也无一个肯顶班接业的，更谈不上传授门徒了。如当时有一个裱画科班出身的周以荣，师傅是锦云斋店主戴焕，岳父是锦华斋店主崔广信，按常理他接业守业的条件很好。结果，一九四五年锦华斋闭歇，锦云斋改行经营小百货了，周以荣虽有整套裱画手艺，也无立足存身之地。走投无路，只得依附镇江金山寺、南京毘庐寺，为和尚打杂以混生活。再如墨香斋的杨衡义、翠竹斋的曹伍，都因裱画店坚持不住而歇业，分别在镇江五条街、扬州皮市街的路旁道边卖童儿糕，到上海市的弄堂口卖汤圆糊口。镇江唯独两宜斋裱画店几经风霜，勉强站住了脚，一直保持那块招牌。镇江解放，两宜斋裱画店总算熬出了头，而镇江的裱画事业才得以相延不绝，并在一九五六年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中参加了手工业联社，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

回忆在那艰难困苦时期，为什么两宜斋裱画店能在霜打雪压的困境下婷立不凋？解放后两宜斋又能在继承和发扬祖国民族文化艺术，丰富与活跃人民文化生活，促进国际文化艺术交流方面做出新贡献，博得声誉，这和先父徐世洪的独特技艺、创新精神以及个人品质是分不开的。

先父徐世洪，字鹏，江苏仪征人，生于一九〇四年五月十四日（光绪甲辰年三月二十九）。先祖名长慈，业村塾师，有三子三女，先父是行三、长子。一九一二年祖父死，家境清贫，先父童年自然读书不多，十二、三岁不得不帮乡邻放鸭牧牛，十五岁时投扬州宜宜斋碑帖店学徒，即为这一独特的技艺所吸引，深深爱上这个行当。旧社会在小店铺学手艺是很苦的事，而先父竟在这个无名的小店里从师十五年之久，可见其从师学艺之笃。这爿店以经营碑帖为主，其实它近似关门作，前后两进房子对合，当中天井；前面一进，

当中大门，两厢摆满架子，存放各种碑帖。师傅王澄乾本人天天早上到富春吃茶，为的是谈生意。不但本地文人，外地的碑帖客人也都到他家求售。特别是王澄乾全无市侩气，是个文人雅士，琴棋书画，瓷铜竹石，无一不爱，对书画不但精于识别，而且也擅仿制。他常与友人在店里探讨、鉴赏文物古董，研究书法画派，先父就从旁细听，记其要领，并遍阅有关历代书画名人的历史资料，增长知识，得其精髓。由于师傅的教导熏陶和自己长期实践，终成此业中著名的巧匠能人。

先父尤精于碑帖鉴别和拓制，对全国较著名的碑刻拓片，他只要看一个角落的几个字，就说出这个碑帖的名称、出处，初拓还是二拓，原版还是翻版。镇江焦山碑林的摩崖石刻，包括“瘞鹤铭”、“陆务观题名石刻”在内大大小小共计三百另三块，一九六四年市博物馆委托他拓制八、九套，拓片质量很好。一九七二年四月，市博物馆在畜牧农场二七大队清理东晋砖室墓葬，全套壁画与各种画像砖五十四块，他也亲临现场，主持制作拓片。这些拓片刊于一九七三年《文物》第四期，是他晚年拓制的精品。

另外，他对于玉器、石章、砚台的辨认是新坑、老坑，对书画作品的鉴别真迹、仿制以及珂罗版等，都有研究。这些知识基础，为他在镇江堰头街创办两宜斋碑帖店，并能守业四十多年而不衰的一个重要因素。

先父一生为人正派，待人和霭，年轻和年老的书画作者及爱好者，都乐与交往；与冷御秋、陆小波、严惠宇、于小川、赵棣华、李轶哉、张翼谋、卢润洲、吕凤子、苏涧宽、赵八雁、张太素、吴镜塘、傅抱石、项介石、夏遒声、邵象伊、夏佩白、法度、白丁、丁金声、丁士青、霜亭、妙华、

慎然、王少堂、康重华等各界人士，无不结友，“增益其所不能”，使装裱业务得以开拓。

特别是他对装裱有较强的事业心，工作严谨认真，一丝不苟，讲究信誉，并能在业务上适应市场变化而有所创新，从而使其装池保持活力。一九三四年他从扬州来镇江创办两宜斋碑帖店，以经营和装裱碑帖拓片为主，兼营装裱书画。一九三六年两宜斋由四牌楼堰头街迁大市口，并改变了经营范围，店名改为两宜斋装池，取义既“宜”装潢，又“宜”碑帖。

解放初期，字画装裱业务不多。对于道林纸、绘图纸等西洋纸张件的装裱，别人视为“禁区”而不敢染指，他独能巧加试验，毅然承受各院校的教学挂图、地质部门的勘探图、部队机关的军用地图等装裱；有时还应聘到南京、扬州去裱，业务上开拓了新的领域。随着外贸的扩大，镇江裱画店与上海书画社、友谊商店、出口公司挂钩，使装裱业务还有所扩大。三十多年来，他还为镇江装裱事业培养了一批新手，使这一技艺，在镇江后继有人。

两宜斋装池参加手工业合作化后，先父把私存的镇扬名家郑板桥、王文治、张文庵、顾鹤庆和姚叔平等的书画赠给市博物馆。他被选为镇江手工联社第一届理事会理事、美术公司负责人、市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等。但他向以匠师自处，从不脱离潢池案板的劳动，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六十年代中期，他曾与张介侯先生合作，撰写《装潢艺术》一书。十年内乱中，老匠师也身受劫难。多次因店名为“两宜”而被批判，诬陷他既“宜”资本主义，又“宜”封建主义，唯独不“宜”社会主义！书作被迫中辍。一九七四年十月廿二日下午，他终以积劳成疾，心脏病猝发而死，享

年七十。

《装潢艺术》内容包涵一般装裱、装裱手卷、装裱碑帖、装裱旧书画、裱制红货，装裱挂图、裱托剪纸、裱托板画等八项。现张介侯老人正在修改此稿，俾便将来出版，使先父的装潢技术得以推广流传。

补白：

伯先夫人气节高

赵家连

一九四四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进入战略反攻时期。敌伪为了收买人心，粉饰太平，挽救自己的危亡，对辛亥革命烈士忽然心血来潮而关注起来。

汪伪镇江县党部和县政府，特意把被日寇毁坏的伯先铜象、伯先祠修缮一新，并订于一九四四年三月廿九日（黄花岗起义纪念日）举行揭幕剪彩仪式。为了使这次“盛典”更加隆重，特派人邀请赵伯先夫人严承志来参加。伯先夫人自抗战开始，即蛰居乡里，从不与敌伪往来。她早就看穿了敌伪的鬼蜮伎俩，严辞拒绝前来。汪伪请不到伯先夫人，没法下台，只好请了解朝东为其“代表”。可是这位代表和烈士是风马牛不相及，既不姓赵，又不姓严，只是东乡人士，总算稍和先烈挂了点边。这才把这场闹剧掩饰过去。而伯先夫人坚持民族气节，不为敌伪利用，却更加赢得人民的敬佩。

丹徒人民送“瘟神”

沙一鸥

血吸虫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疾病，在旧中国流行极广，病情极重，它像瘟神一样，蔓延到哪里，那里的人民就深受其害；广大疫区，呈现田园荒芜，家破人亡的悲惨景象。丹徒县地处滨江，在解放初有80%以上的乡村，程度不同的流行着血吸虫病，为我省重点流行区之一。三十多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积极组织医务人员，不断采取综合防治措施，已达到基本灭病的目标，解决了几千年来没有能解决的问题。从一个病种的流行和消灭，充分反映出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孰优孰劣，客观地体现了两种社会两重天。可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往事将成陈迹，后来一代青年，将不知人世间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悲惨事。本文回忆我县血吸虫病防治的一些片断，命意所在是想在这天翻地覆的历史画卷中，留上一个小小的印记。

蕞尔小虫，华佗无奈

长沙马王堆出土汉墓女尸，在解剖中发现肠壁有血吸虫卵，为该病流行于汉代的见证，其实再上溯到殷商时代，甲骨文即早有“蛊”字，根据许慎《说文》“蛊，腹中虫也”，以及联系到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也有很多关于腹水、痞块等记载，这些记述，虽不一定是血吸虫性肝硬化，但其中有部分属于该病是可以相信的。这就说明此病在我国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到解放前夕，血吸虫病已在我国十二个省、市、自治区流行，约有一千万人受到威胁。另外，以

血吸虫病的传播环节来看，在社会落后的条件下，确实又难以防治。

血吸虫病传播过程的中间宿主是钉螺。我县除三个江心洲地有大片江滩外，还有东乡大面积水网地区和西南片部分丘陵山区，都密度不同的有钉螺分布，加之历史上粪便管理不善，农村仍有随地大便的不卫生、不文明的习惯，并喜欢把粪缸埋置河塘边，贪图洗马桶、洗粪桶方便，造成水源严重污染。农民防汛排涝、栽秧割稻、捕鱼放牧，乃至日常生活、临河洗物涤器等和水接触，感染吸血虫就难以幸免。因此，严重流行区的居民感染率，高达80%以上。

旧社会的历朝历代，特别是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政治腐败，根本不关心民瘼，血吸虫病人越来越多，病人越多就越增加传染源，传染源越增则病人又越多，互为因果，恶性循环，愈演愈烈，以至上下数千年，纵横千万里，只能听凭瘟神肆虐，危害人民，而束手无策。

千村薜荔，万户萧疏

血吸虫病的危害，可以概括叫影响“五生”（生产、生活、生长、生育和生命）。得病较轻的影响了体力劳动，也就直接影响生产；如不能及时治愈，经常缺乏劳力，势必就影响生活；儿童得了这种病，能影响生长发育；严重的可使男子不育，女子不孕；最后到了晚期，就影响生命了。血吸虫如是一次大量感染，可出现急性症状，特征是长期发热不退，不及时治疗，可迅即进入晚期。如是慢性多次感染，日长病久，出现面黄肌瘦，大腹便便，肝脾肿大，腹水，那就已到晚期了。血吸虫有一个可怕的特点是：它会造成大面积流行，使大片大片的地区受灾和成批成批的集体感染。例如江南解放初期，解放军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南下，为了能顺利解

放舟山群岛，三野九兵团二十和二十七两个军，于1949年夏季，在苏南、浙西一带进行水上练兵，加强游泳、涉水、渡河强攻等战术训练，不料到了秋天，大批指战员纷纷病倒，许多人大便不正常，拉脓拉血，有的还发高烧，卧床不起。又如1960年前后经济困难时期，镇江市不少乡下芦滩打粽叶、挖芦笋、打茭白菜，结果全市有几百人发生急性感染，临时筹设病房，集中收治病人，尽管及时抢救，还有不少进入了晚期。我县世业公社老红旗第九生产队，共有三十多个劳动力，1956年秋熟登场时，因急性感染，全部病倒，只剩老队长王信友一人挑稻把。至于因村庄周围，河塘田块有钉螺，生产、生活密切接触疫水，积年累月，导致进入晚期，全家受害，甚至灭门绝户的，重疫区这类惨事，更不胜枚举。青浦县任屯村，解放前十年因本病流行，人口相继死亡，全村死绝的有十一户，全家仅存一人的三十二户。我县石桥公社石桥大队，据调查，解放前10——15年时间，先后死亡一百十五人，其中80%死于晚期血吸虫病，因该病全家死亡的有邱万狗等三十六户。江心公社原来的速益乡复兴村，大便化验血吸虫病阳性率成年人高达90%以上，晚期病人多，人们叫它“腰鼓村”，单老三全家八人，最后仅仅存一个童养媳。五大队五墩子，是一个四面环江的小岛，居民感染率极重，靠江边一个生产队叫三八队，其命名“三八”之由来，因该队有三十多个劳动力是妇女，每到上工时，只有两三个男劳力。男的为什么这样少？其中除个别男性外出工作，绝大多数男性都是在旧社会血吸虫病猖獗时被夺去了生命。更加惨痛的是，反动统治时期，农村缺医少药，这类病人只能在肚子胀极时自找江湖医生放水，世业公社老红旗九队徐三姪，腹水胀极不可耐，自己用针在肚子上穿刺放水。

由于该病流行面广，受害人多，当时几个江心洲地，固然病情严重，惨象明显；就是姚桥、大路一类，如闸头桥、田家荡、罗汉荡、照临村等水网地区，也是由于病人较多，劳力缺乏，不但田里庄稼长不好，到处都可见断墙残垣，一片萧条景象，毛主席诗：“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是这种惨象的真实写照。

瘟神送走，换了人间

由于血吸虫病面广量大，危害严重，解放后，党中央十分重视，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中央成立了领导小组，地方建立了防治机构，组织和培训了大量医务人员，深入疫区设点，集中收治病人；同时发动群众，逐段逐块地查灭钉螺，切断传播主要环节。党中央〈70〉2号文件颁布以后，各级党委更加重视，血防工作更加进入高潮，出现了“千军万马送瘟神”，“百里江滩百里营”，各行各业齐支援的动人场景。在灭螺方法上精心设计出围埂筑坝，提水药浸的新措施，既保护了芦苇，又消灭了江滩大面积钉螺。在治疗方法上，也不断有所突破，继锑钾、锑273之后又发现了吡喹酮新药，疗程从20天静脉注射缩短到仅需两天口服，加速了病人的根治。在晚期病人治疗上，也摸索到一些规律，用中药扶正纠偏，西药保肝利尿，外科手术，使六百多病人得到合理治疗，取到了一定效果。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我县有螺面积从四千多万平方米下降到三万多平方米，下降率达99.92%；六万〇六百多病人，现在只有91人未治，病人下降率为99.85%；全县耕牛感染率以原来33%下降到1%以下；从而达到了省规定的基本消灭的标准。随着血防工作的深入开展，群众卫生知识、环境设施等方面，也有了很大提高，粪便散失的污染情况，也大有改善；保护水

源也逐渐成为群众自觉行动，多数农村已饮用井水，有不少公社还筹建了自来水，例如江心公社就有三分之一群众安装了自来水，并计划普及。结合治山治水，平整土地，改变环境等综合治理，山区和圩区的水系也大为改观，江心公社原由六块小洲小套组成，现已连成一片陆地，摆脱了出门就要涉水的困境。今年我县洪涝灾害，是对血防工作的一大考验，因防汛排涝抢险下水的人数之多，为历年所仅见，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一例血吸虫病的急性感染。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疫区受害病人，对党怀着无比感激之情，有些晚期患者，深切感谢共产党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世业公社东方红大队吕祥武说：“我小时全家六人，父亲、伯父、两个叔父和一个叔母，都死于血吸虫病。解放后，我治过四次，腹水消除后又切除了脾脏，恢复了健康，下一代过着幸福生活，忘不了共产党的恩情”。江心五大队第六生产队张正年，从小得了血吸虫病，个子长不高，还有腹水，经过三次治疗，1971年切了脾，逐步得到正常发育，32岁结了婚，生了孩子，现已八岁。由于“瘟神”送走，疫区出现了巨变。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青壮年的体质，有了显著的改善，仅举服役为例，以前几个重疫区，由于有血吸虫病，体质差，从来没有人参军；通过积极防治以后，现在基本能完成国家兵役任务。世业公社1964年开始有青年应征入伍，以后逐年增加，体检合格率都在50%以上，最高年分参军的有三十名，没有一个退兵。江心公社1967年开始有人参军，1970年以后逐年增多，最多年分出22名，体检合格率在90%以上。这两个公社粮棉产量，也有大幅度增长，原来两个公社的水稻三麦每亩只有三、四百斤，现在都在千斤以上，棉花产量原来每亩皮棉三、四十斤，现在都在百斤以上。到过江心五

大队五墩子的人都知道，从前全大队只有两家是瓦住房，其余都是芦草房，现在已建有瓦房六百八十多间，占住房90%以上。昔日荒村篱落，萧条景象，如今红墙一片，春意盎然。疫区“旧貌换新颜”，主要是依靠党的政策的威力，但和血防促进生产，生产又促进血防，互为因果，形成良性循环是分不开的。如血吸虫病不消灭，人民身体健康无保障，要想生产生活的改善是困难的。另外，这场消灭血吸虫病斗争的深远意义，还在于它是一首可歌可泣的不朽史诗，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见证，它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

为了全部消灭血吸虫病，我县血防战线同志们，正按照全省“八五规划”的要求，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正以“追穷寇”的革命精神，乘胜前进。

1983、10、11、

本文承邓华、毛志文同志提供部分情况，附此致谢。

镇江中医旧事拾零

柯拾萍·袁炳文·金维藩

镇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被迫辟为通商口岸，出现了海关、租界与洋行、货栈，华洋杂处，市井喧阗，呈现出畸型繁荣景象。医药人才，也汇集于此。当时丹徒全县（包括今镇江市、丹徒县）开业中医师约三百余人。由于自身受新形势的启迪，痛感祖国医学必须结合近、现代自然科学知识、技能，实现“熔本铸外，新旧沟通”，方能发挥更大作用。早于清末宣统年间，邑人吴鹤龄、陈邦贤、陈泽、金鳌等医界先辈，倡导、发起创办医学刊物，开设中医学校，以“灌输新学，发扬旧学，造成完全之医学”，“造成完全医学人才，立足于发明新理，中西会通”为宗旨，进行中医学学术探讨与谋求改进、发展医学。嗣后由于清朝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朽、昏乱，无视祖国科学、文化遗产，一味崇洋媚外，对各种医学、卫生事业革新要求，不仅不予支助，甚且横加干涉、阻挠；以致镇江医学革新，仅凭少数医界人士的努力，输将经费，义务供职，自难取得理想的结果。然而，即使在幸存的一些零星、片断资料中，亦可部分反映出远在七十多年之前，我市医卫界前辈，为了振兴医学的苦心孤诣与革新的首创精神，直到今天看来，也还是颇为可贵的。现将我们（主要是袁炳文医师）手头所收藏和搜罗到的有关文献实迹资料，择其要者，分项整理、写定于后，以供有关方面参考；并望各方知情人士继续多予补充、纠失，使得它能在今后更加充实、全面、完整起来！

【甲】 创办医学报、刊：

一、医学扶轮报

(一)、主办：镇江、扬州中医界。

(二)、发起人：吴鹤龄(子周)、金鳌、韩翥、孙功辅、陈邦贤(治愚)、陈泽(瑞辰)、杨燧熙、卜世良、孔庆铨、贾赞卿、沙猷廷、叶泽华(子实)、郭子玉、袁焯(桂生)。

(三)、编辑委员：陈泽、吴鹤龄、孙功辅、袁焯、陈邦贤、叶泽华、金鳌、韩翥。

(四)、发行所：镇江小街底——镇江医学研究会。扬州南河下——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

(五)、创刊：清宣统二年(1910)十月第一期。以后每月出一期。共出九期，至宣统三年(1911)六月止。

(六)、简章宗旨：本报以灌输新学，发扬旧学，造成完全之医学为宗旨。

(七)、内容：一论文，二学说，三译稿，四医案，五杂录，六问答。其中著作有：

百斯笃预防法

陈邦贤

察舌辨症新法

刘恒瑞(吉人)

痘科明辨

吴鹤龄

记怪胎、瘧症问答

叶泽华

春在寄庐医案

金 鳌(诵闻)

杏雨草堂医案

孔庆铨(瀛伯)

药物新说

朱浣秋

简便灭菌法

陈 泽

春泽堂医案

袁 焯

二、镇江医学公会月刊

由袁圣称医师主编，民国十五年（1926）创办。

三、镇江中医学术研究会月刊

由谢子文、乔鹤琴医师主编。

【乙】 设立医学堂、卫生院：

一、镇江自新医学堂

建校于清宣统二年（1910）。课程以中医学为主，兼授西医生理、病理基础课。教员有吴鹤龄、陈邦贤、陈泽、杨燧熙等。镇江张禹门医师等曾在该校学习。校址设在小街底卫生院内。吴鹤龄、李晴生为发起人兼经理人。

自新医学堂《简章》：

〈1〉宗旨：本学堂为造成完全医学之人才，立足于发明新理，中西会通，故定名为自新医学堂。经费由发起人自行筹贷开办。

〈2〉教授内容：课程以中医为本，参以西医，以补中医之不足。分八科教授：

（一）、修身（专以正心术、勤学业、守道德、保全民命为要义）

（二）、经义（内难诸经大义）

（三）、国文（讲读前贤论说及文法要义）

（四）、生理（解剖、组织学、卫生大义）

（五）、病理（内、外、妇、幼、针灸等科）

（六）、药物（讲解古今药品及西药、兼化学实验）

（七）、诊断（讲解表、里、虚、实、寒、热；望、闻、问、切要义及临床实验）

（八）、体操（柔软卫生体操）

〈3〉招生额数：本学堂暂以三十名为期，额满后，也可随时补收。本会以十三岁至廿岁文理清顺者为合格。

〈4〉学费：本学堂议定学费每月二元，膳宿费每月三元，走读仅留中膳者，每月一元五角。贫者学费酌减。

〈5〉毕业：本学堂毕业分预科、正科。预科一年毕业；正科三年毕业，由本堂禀请提学司派委来堂考试，分别等第，给予文凭。

二、镇江卫生院

建院约在民国十年（1921）。系镇江最早之中医院，得到镇江商界北货业全力支持。该院设立中医内、外、儿、妇、针灸各科，并有中药房，自制中药。

参加卫生院的医师：有吴鹤龄、闵金禾、唐芸甫、潘杰人、余殿琪、蒋德农等。仅看门诊，不设病房。每天就诊病人甚多，院址设在小街底。

【丙】 筹组参加江苏省中医联合会，开展反对“消灭中医”的抗争活动：

民国十一年（1922），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发《管理医士条例》（共廿一条），歧视、排斥中医，遭到全国中医界反对。镇江中医界同仁四出奔走、呼号于大江南北，联络江苏全省中医团体，云集上海（镇江代表吴子周、袁圣称），成立江苏省中医联合会（当时上海包括在内）。大会通过由镇江拟草的《宣言》，推举李钟钰（李平书）为正会长；丁甘仁、吴子周为副会长；夏应堂、朱少坡、隋翰民为名誉会长；殷受田为评议长。大会致力进行反对歧视中医的《管理医士条例》。后来该《条例》终于被迫取消。

镇江名医陈邦贤、吴子周

金维藩 吴调公

清末民初，随欧风东被，近代科学技术渐传内地，镇江医卫事业，亦稍除旧貌，日现新颜。一时医学报刊之出版，学堂、医院之创设，医学团体之建立，颇开全省医界风气之先。地方才彦，济济称盛。其中坚人物应首推陈邦贤、吴子周两先生。邦贤先生在首辟中国医史科学研究领域，编行专著方面，子周先生在毕生致力于讲学、治学、行医与从事地方公益活动方面，皆卓有建树，足为后人效法。爰写二氏传略于后，供纂辑地方医史者参考。

陈邦贤先生，字治愚，镇江人。生于公元一八九〇年（清光绪十六年）。幼年攻读四书、经史，以勤学见称。后以家贫不能供膏火，投师专习中医。受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自然科学勃兴、东渐之世界潮流影响，业余常浏览介绍西方医学之专刊，深感我国传统之中医学学术，至需借助现代科学理论充实、整理，方能发扬光大。适丁福保氏于沪上创立“中日医学校”，宗旨在于沟通中西医学，颇合先生意愿，即申请入学。因其刻苦钻研、认真攻读，为丁氏所赏识。结业后，被留校工作，协助编写医学书籍。此后，先生于写作实践中，对中国医学之悠久历史与深远影响，认识弥深，遂萌树编纂中国医史，不令祖国医学遗产遭致湮没之宏愿。自此辛勤钻研，数易寒暑，从各类史籍与医药文献中，梳理收集，积累大量资料，提炼精华，编成《中国医学史》一书，于一九一九年出版，是为我国近代第一部较完整之医

学史著作。后数十年中，复经本人多次修改充实，屡有再版发行，至今犹受国内外科学界重视。

清季宣统初元，邑人吴子周先生有志于整理中医学术，振兴桑梓中医事业，与镇、扬医界同人倡议，谋求普及宣传与交流学术经验，沟通中西医学，使历史长达数千年之祖国传统医学，得有提高、发展。邀请先生合作襄助，在镇江创刊《医学扶轮报》，举办中医学校、中医医院；先生以志趣相投，欣然应命，屡年惨淡经营，颇著业绩。虽以囿于旧社会境地、条件，仅恃少数有志者艰辛奋斗，无可能善其终始；然在当日，先生与诸医界同仁关心社会进步，从事革新医学之精神，弥可贵已！

中年以还，先生一直从事教育。于省立第五师范学校、省立镇江中学、镇江师范等校任教同时，并兼任舍监、校医等工作，对维护青年学子健康，不遗余力。江苏医政学院建立后，应聘兼任各科、班医史课教学。该院改为国立江苏医学院后，医本科之医史课程，仍由先生继续开课，俾青年学子于接受西方医学思想、技术同时，对我国固有之悠久医学传统历史，亦有一定了解，从而得以增强对我祖国文明之热爱。抗战期间，任职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对医学教育之规划，医学教材之审编，贡献良多。后复受国立编译馆之聘，任纂修重任，潜心于医学文献整理、编纂工作。

新中国建立后，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医卫事业得到飞跃发展。一九四九年，先生即应镇江市人民政府邀请，出任市府卫生科科长，虽当时年已花甲，但精神不减昔年，为贯彻卫生工作四大原则，为本市卫生工作开展，致力不懈。一九五一年，苏南行政公署卫生处为能集思广益、规划苏南地区卫生建设，筹组卫生建设协会；聘请各地富有经验之医卫界耆

宿，担任协会领导。先生与镇江戴穉季、江阴郭齐元，同被聘为正副主任委员，驻会工作，备党、政领导咨询。就医疗、卫生、教学、科研各个方面，提供颇多有益建议。中央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成立后，复被调任为研究院医史研究员。自一九五五年起，在院工作二十二年之久。对我国医学史科学之创建、开拓与研究，均有卓越贡献。一九七六年，先生八十七岁，逝世于首都。因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由全国政协于报端发布《讣告》，举行盛大追悼会，以资纪念。

先生毕生敦厚诚笃，乐于助人，治学严谨，有疑必究。收藏书籍极丰。每日黎明即起，读书写作，余时抄摘卡片，积累资料，数十年如一日，从无间断。凡与先生接触者，无不为其专精治学精神所感动。印行问世著述较多，涉及面亦较广泛。早年东渡日本讲学，有声于时。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曾多次与先生会晤、谈学；其新编之《中国科学技术史》叙言内记载著书缘由及与中国科学家接触情况文字中，即有提及与先生晤叙之事。可见先生之影响，非仅限于邦土、为国内医林所共仰已也！

吴子周先生，镇江人。生于公元一八八四年（清光绪十年）。原名鹤龄，以字行。少时，值清庭变法，潜心经世致用之学，尤嗜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论》，深以清季国势崩颓为虑，亟谋抒其发愤图强之夙抱，一度投考南洋公学，榜发录取。詎为母氏所挠，不得已，改从其伯父孝廉公兰宾先生习医，殫精竭虑，巍然有所成就。念中医教育之守旧也，乃于宣统年间与陈邦贤先生等创立丹徒县自新中医专科学校，开中医教育风气之先；洞鉴中西医学之必须沟通也，因与沪、扬等地医友合作，兴办《医学扶轮报》，慨疾病者之急盼医疗获济，与夫医学之深造不可不接受西医学有效理论、

方法，加强临床实习也。又复秉承兰宾先生所手创卫生医院之慈善事业而光大之。时，适有日本名医某君来华，先生欣与论道，商量旧学，培养新知，一破迂儒蔽锢之见。临床，则汲取西医科技之长与器械之精；教学，则为学生编撰生理学、内科学讲义凡多种；著述，则刊布有《中国医学异同论》等论著近二十篇；以此，知名于时。比民初北洋政府严令“取缔”中医，先生迅即与全国各地著名中医师丁仲英、施今墨、陈存仁诸君集会联络，并团结镇江中医界同人王硕如、章寿芝、吴崇伯、张禹门诸先生联名请愿，奔走呼号，驳斥当时柄国者之谬论。终以舆论哗然，迫使柄国者不得不收回成命。于是，中医界得以复苏。

新中国诞生以来，先生深庆国脉昭苏，倒悬获解，频频以诗词寄意。得暇，辄喜徜徉山水，品评丘壑，会心长远，益增翰墨之妙。古文宗昌黎、老泉，踔厉风发；诗喜乐天、东坡，得自然之趣。著有《活水轩诗稿》。一九五〇至五一年间，并曾积极襄助邑人、名学者柳诒征先生等，配合市文教局领导，重新修整、恢复伯先公园后山上之绍宗国学藏书楼。对保存地方古籍、文献事业，有一定贡献。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来镇江市作归国汇报。群众列队欢迎。先生不辞疝病宿疾，鹄立迎候终朝，复慷慨致词，迥异老境。平素在党领导下，除继续负责毕生所致力之镇江中医师协会外，复先后担任镇江市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职。古稀以后，疝疾加剧，体益就衰，顾犹为市西医学习中医班讲课，扶杖登台，娓娓不倦，深以诲人、助人与学术商讨为乐。

一九五七年一月初，病逝镇江故里。年七十有四。

一份记太平军在镇江的珍贵文献

——介绍馆藏善本《苹湖笔记》

忻元章

镇江市图书馆藏《善湖笔记》，以日记的体裁，从咸丰三年正月至十一年十二月止（公元1853年2月——1862年1月），逐年分月分日，详略不一地记载了太平军沿江东下，攻克南京，占领镇江，破扬州，攻六合，摧毁江南大营，挫败江北大营，以及张国梁多次反扑镇江，李秀成攻丹阳，张国梁兵败溺死，太平军乘胜取常州，得无锡，踞苏州，经松沪，克杭州等战事。其中暴露清政府腐败无能，反映太平军在镇江一带活动情况的史事，为它书所少见，可说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苹湖笔记》是作者手稿，未经刊刻的孤本，一册不分卷。长十八公分，宽十三公分，无行格，八行，每行十四至十七字不等，计约一万二千字。封面题签：苹湖笔记。不署作者姓名。右侧写：癸丑起至辛酉止。下方印有“竹报平安”、“天保九如”、“华封三祝”（按：字迹已模糊，用放大镜仔粗辨认，尚可认清）。钤朱文闲章三枚。首页有白文钤印“传经楼藏书章”。传经楼是清末民初江苏著名学者陈庆年（1862—1929年）在住宅内所建的藏书楼。这本手稿是陈的后人在“文革”浩劫之后赠给图书馆的。

“苹湖”是作者室名、别名，或是寓所地名，已无查考，根据《苹湖笔记》（以下简称《笔记》）所记：“闻家叔祖永康公在城，贼来时合家自焚”（《笔记》三年七月），

“族侄孙裕之在丹阳乡下被贼害死”(《笔记》六年十二月。)查县志亦有相同记载：“张永康……癸丑城陷后，合家登楼自焚死(光绪《丹徒县志·卷二九忠义》)。“张裕之在丹阳骂贼不从，凌迟死”(光绪《丹徒县志·卷三十忠义表》)。由是知作者姓张。《笔记》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内人三十岁。二月二十日家姊四十岁。”据此推算作者当年三十多岁。而陈庆年继配张氏，也许是作者后裔，《笔记》因此流入陈府，为“传经楼”所藏。此说虽有臆想之嫌，但也不无缘由，姑妄之。

《笔记》作者张氏，在太平军入城前，合家住在城里。太平军进逼南京时，见势危“送女眷到城南三十里外黄墟村避”(《笔记》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太平军占领镇江后，在乡间做了塾师。《笔记》四年正月：“予馆缪姓，寓在东乡石门村。”九年正月到南通“就卢姓馆。”江南苏北，易地换主，七、八年(咸丰四年至十一年)一直以教书为业，其间曾应试未中。显系一位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持敌视态度，然对清政府也无好感的失意文人。因而对于当时耳闻目睹之事，较能秉笔直书，且以日记形式笔录，当不轻易示人，记述时自然顾忌较少，也就较为真实地保存了事实的原貌，这正是《笔记》史料价值之所在。

作者在咸丰三年正月二十日的日记里，直言不讳地记述了太平军进逼南京，镇江城清驻军惊惶失措，闻风逃窜的见闻：“杨抚台(按：江苏巡抚杨文定)奉命来援，驻镇江城内。忽一日讹传贼至，杨抚台已乘车带勇奔丹阳矣。后二日知是讹传，又来镇城。知府、县、道均在东门外各庙设公馆，早则进城，晚则出城住宿，预为逃遁之地。”以致太平军由瓜洲渡江攻镇城时，“岸上绝无一人与之战，官军早已

远遁矣”（《笔记》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京岷山一带营盘十一座，忽然火起，或云贼匪来攻。邓提军（按：江南提督邓绍良）一闻此信，已乘匹马先逃，而数万官兵一时溃散”（《笔记》三年六月十四日）。武官贪生怕死，文官惜命尤甚：“安徽学政锡祉，贼未至已先逃走”（《笔记》三年七月初十日）。

官、兵、勇作战畏缩不前，妒功夺名争先，内部倾轧不息：“张国梁来九华山扎营，吉抚军（按：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渺视不合，且妒功，旋调南京去”（《笔记》五年正月）。“新到武勇，潮勇妒功，两不相下，斗殴”（《笔记》四年正月初）。“虎勇于十一日夜半出队，欲登城，将到城下，潮勇在后拍手呐喊，城中贼党，放大炮，伤数十人回阵”（《笔记》六年二月）。

大批清朝溃军危害百姓的见闻，《笔记》多有记载：“大兵四村嬉戏，或饮酒，或吸鸦片烟，或赌钱，绝无约束，而避难之民日形困苦，督兵者曾不之顾”（《笔记》三年四月初六日）。“大兵沿途要劫，虽数十文亦行取去，而民益困”。“潮勇亦一路掳抢”（《笔记》五年五月十五日）。

兵勇抢夺民物，官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仅咸丰十一年五月至十一月的半年里，镇江城内就有所谓“火捐”、“府捐”、“道捐”、“局捐”、“日捐”、“保卫捐”、“大捐”、“小捐”、“借捐”。以后又有什么“田亩捐”、兵弁“棉袄捐”等十多种。更有官吏巧取豪夺，

“扬州钦差雷以诚年来专事聚敛，怨声载道，其子某开钱铺，民间捐项皆输其铺业，有重利必趋之，与民争利，或云雷二、三年内，家资已有两、三百万”（《笔记》六年三月）。“江南总捐官金梅生住如皋，手下委员数百人，谋差

者盈门，家偶有事，虽数百里外，必奔赴庆贺，送礼者塞途”（《笔记》十一年八月）。所记都是作者亲闻，有些趣闻轶事，似是街谈巷议之琐闻，却反映了平民百姓（包括作者张氏本人）对官、兵、勇的憎恨，充分揭露了清朝统治者的暴虐无道，腐败透顶的本质。《笔记》就是历史的见证。

尤其可贵的是《笔记》作者描述了太平军占领镇江后，为了固守镇城，动员城内百姓，抗击围城清军的生动情景：“贼匪连日令城中百姓能战者驱之战，不能战者城头击鼓，妇女令其呐喊，拍掌助威”（《笔记》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虽寥寥数语，且有个别污蔑不实之词，但他却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镇城百姓同太平军并肩作战，共同击败攻城清军的历史画卷。

作者在《笔记》中还大胆地记述了太平天国提倡自由贸易政策的真实情况：“贼到丹徒镇，关照街市各铺照旧开张”（《笔记》三年六月十五日）。“镇江各乡镇，卖货者塞途”。“诈输岗极为热闹，店开多少，闻得人皆卖东西与贼者，常有官兵巡缉获之者辄斩”（《笔记》四年四月）。百姓无视清军禁令，敢冒生命危险，把大米、食盐、猪子等物卖给太平军，足见太平天国的商业政策很得民心。

太平军自咸丰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公元1853年3月31日）占领镇江城，咸丰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公元1857年12月27日）撤出镇江城以后，在镇城外围的活动，张氏以当时当地人，对当时事都有所述及。对于太平军在镇江一带得百姓支持，其政策受百姓拥护的见闻，虽不够详尽，且多传闻，却是已经刊行的、反映太平军在镇江的同时期著作：《从军纪事》（卞乃澠著）、《焦东阁日记》（周伯义著）、《遭乱纪略》（解涟著）以及光绪年间的《镇江剿平粤匪记》（陈庆

年著）等书所不载，

《笔记》还为我们提供了吉尔杭阿、向荣、和春等人致死的情况。现摘其要，以供读者比照：“高资贼匪猖狂，九华山兵去被围，吉抚军领军亲往虎营，贼围益急，水路不通，是夜吉自杀”（《笔记》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和已奔至无锡，由锡至苏，苏城弗纳，回驻浒墅关，自缢于观音阁矣”（《笔记》十年四月）。此说与李秀成自述“吉帅由九华山带兵来救，当被天朝官兵逼，吉帅进入高资山中，吉帅自己用短洋炮（按：即短枪），当心门自行打死”（《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第25—26页）。“和春独自一人而下苏州，舟赴浒墅关，听见副帅张国梁战死丹邑，和春在浒墅关自缢而亡”（《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第45页）。两说基本一致，吉、和二人都是兵败自杀。官修《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一五三和二三八）分别据向荣和徐有壬所奏，褒扬吉尔杭阿在鏖战时中枪殉难，和春在迎敌时胸受枪伤，数日后呕血而逝。后来许多清史皆沿袭此说。这在郭廷以著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中亦未定论（详见该书上册第462页和479页）。此条可作吉、和二人兵败自杀之佐证。《笔记》六年七月写道：“向军门（按：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湖北提督向荣）病故。”与《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一五八）据德兴阿、翁同书奏言：“向荣连日病剧不起，于七月初九日在营病故”，无甚出入。而《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所记“……失去孝陵卫大营，官兵失散，又被逼丹阳，是以向帅自缢而死”，郭廷以持向荣忧愤而死之见（详见《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第478页，则将李秀成说法否定，《笔记》所记可作附证。

此外，《笔记》对于上海小刀会、捻军占清江、清政府

科举考试、太平军“杨韦事件”、英军侵占天津、清帝避居热河、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清廷“辛酉政变”等史事略有提及，文省事繁，言简意赅，涉闻颇广，可以资考证、广异闻，对史学工作者来说，不失为一份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赵君举的《三顾堂日记》

赵凤来

赵彦僞(1819—1881)，字记楼，号君举，丹徒人，郡增监生。

先生有《三顾堂日记》二十余册，历记道光十九年己亥至光绪七年辛巳间事(其中咸丰、同治年间因避居江北，故只存散页)。抗日战争前，南京国学图书馆曾影印其道光己酉日记一册行世，拟陆续付印未果。柳诒徵先生跋云：“……吾乡赵君举先生绩学攻文，见闻无巨细，排日书之，绵绵绳绳，年竟一册或二三册，有齿不懈，其关于朝章国故者，虽较瓶庐为逊，而谭艺稽古觐缕佚闻，旁及民生物力之消息，可备史料；其文字之谨严深厚，尤可与越缦淑绮瓶庐日记朝颉颃也。”去年镇江市博物馆举办的“帝国主义侵华史”展览，即曾影印放大《三顾堂日记》道光戊申年一本中有关当时英国侵略军炮轰镇江的纪实资料。

新近发现的岳氏宗谱

杨再年

一九八三年四月，丹阳县发现《曲阿培棠岳氏宗谱》（下简称《岳氏宗谱》）。《岳氏宗谱》现存卷之首、卷首中和卷首下三册；《岳氏宗谱》卷首上一册和《云阳岳氏本支系图》一幅，分别由岳飞第二十八世孙岳德修（现名岳逸民，县农机公司干部）和岳飞第三十世孙岳世荣（现名岳发坤，县丹凤公社岳家村社员）捐献给国家收藏。

曲阿、云阳均为丹阳古称。培棠在今丹阳南乡全州境内，距县城二十余华里。据《岳氏宗谱》及《丹阳县志》记载：公元1142年1月，岳飞及其长子岳云被宋高宗赵构和宰相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后，次子岳雷随母李夫人徙居岭南，四子岳震、五子岳霆同隐湖广黄梅。三子岳霖，由于岳飞故交武德大夫都总军将贡祖文的搭救，潜居曲阿柳塘（今延陵柳茹）。孝宗登基，岳飞冤案昭雪，岳霖被授为南赣都督，食邑宜兴。岳霖有四子。三子岳珂，理宗宝庆年间（1225—1227）为丹阳县令，为纪念祖父精忠报国和报答贡祖文抚孤之恩，与兄岳琛在柳塘附近的紫阳渡共建“报本祠”。岳珂在丹阳任上有善政泽民，改任常州刺史后，乡民植棠树于“报本祠”，表达对岳珂的怀念之情。由于精心培植，棠树枝繁叶茂，因此，取培育棠树之义，将紫阳渡一带以培棠作为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岳氏发源于山东聊城，迁徙于河南汤阴，分派于江苏宜兴，而聚族于曲阿培棠，岳飞长孙岳琛为培棠始迁之祖。现今，培棠二百九十八户人家，

岳姓竟有二百八十八户。附近香草、万巷等村庄户，也大部分姓岳。至于县境内丁庄铺、留雁庄、邓村和泥亭等地岳姓，俱系培棠岳氏的分支。邻县丹徒的长巷，句容的墓东和金坛的庄城桥等地也有培棠岳氏遗族。丹阳岳氏除岳琛一支外，尚有其弟岳珂一支。《云阳岳氏本支系图》（210×170公分）就展现了以岳珂一支为本系，以岳飞曾祖父岳成为第一世，迄民国十九年（1930年）制作该图止，延续至三十三世的承接关系。

《岳氏宗谱》高31、宽20公分，是始修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继修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重修于清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和光绪年间，于中华民国十七年（1928年）再修的线装宣纸木刻版本。这个版本，计印有二十二套，分发岳氏各房收执。每套除卷首都分四册外，尚有培棠岳氏一至二十九世世系图和年表二十八卷。现今收藏的《岳氏宗谱》卷首部分，主要辑录有元朝脱脱不花撰写的《岳武穆王传》，系统地叙述了岳飞的生平事迹。还有明成祖于永乐十八年（1400年）所撰《忠孝传》，清乾隆进士吴锡麒所撰《岳武穆王论》以及明清两代名人撰写的岳王庙记、墓记等若干篇，从不同的侧面赞颂了岳飞的功绩。有关杭州岳坟遗迹、遗物的文章，岳坟碑版刻文，也与先儒论赞十三条，名人题咏一百十首同时录印入谱。这些传记文章和论赞题咏谴责了民族罪人赵构、秦桧祸国殃民，赞扬了民族英雄岳飞反抗异族侵略的丰功伟绩。《岳氏宗谱》卷首还汇编岳飞遗文，列为王祖王艺。辑录有《谢讲和赦表》等书表檄文数篇和《满江红》、《题新淦萧寺壁》等诗词数首。所辑《遗秦桧书》、《何铸鞫讯供状》和《万俟卨鞫讯供状》三篇，还属新发现（可靠程度有待进一步考证）。

《金佗粹续》是岳珂继承父志写就的著作，岳飞事迹大多收录于此。丹阳岳氏曾于清嘉庆年间翻刻印刷，与《岳氏家谱》同时分发岳氏各房收藏。有些失载于《金佗粹续》的岳飞有关资料，在重修《岳氏宗谱》时，也收录入谱。总之，《岳氏家谱》经过整理研究，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将不失为一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附录：紫阳渡报本祠记①

尝思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盖天地为万物父母，其分尊尊②，则惟天子得为坛以报之；而父母为一家天地，其分亲亲③，则凡昭穆④之子孙皆得立祠以报之。虽所报不同，其不忘本一也。至我始祖武穆王⑤，功冠古今，忠昭日月，其生于汤阴⑥，迁于九江，卒于临安⑦，而子姓之立祠奉祀，其食报也无论已。他如驻兵宜兴，屯守鄂州⑧，行军襄郢⑨，陈壘朱仙⑩，虽非其子孙，皆立庙图形，以崇厥祀，谓非王之功德不泯⑪于人心，何以享无穷之报若是哉？当王之遇害也，继忠侯云已殉父难，绍忠侯雷又随母徙，续忠侯霖乃遵母命遁迹⑫，以存宗祀，遂匿于王之故交贡文宪公家。文宪公欲保岳氏孤，即日挂冠⑬，潜居于曲阿紫阳渡口。公⑭应孝宗征，锡以官爵，欲还九江旧宅以居。道出宜兴，邑之父老念王旧德，争买田宅，留公居于邑之东北唐门里，今祠墓俱在焉。呜呼，岂公之有德于人欤？何宜之人戴王之德而报其后人者若是之深也。公生四子，长琛，即我族之祖也，次璞，三珂，四珪。珂公号亦斋，有逸才⑮，痛王冤抑未伸，尝著《吁天辨证》⑯，上之宁宗，王冤始雪。而王之子孙，皆锡爵封，并登显职。初，珂公为云阳令，念王之忠，痛父避难兹土，而又感贡公之德不忘也，遂建报本祠于紫阳渡。功未竣，

迁常州尹。时琛公适寄弟署，继弟志而落成之，因迁王与父之木主而藏于其内，四时致祭，而贡公亦配享焉。嗟呼，贡公不惜身家性命，为岳氏保孤，其义可为厚矣。而岳氏子孙感贡公再造①⑦之恩，为设主而藏于王之庙，与王并享厥祀，血食①⑧千秋，则报本之中又报德焉，抑何愧于宜邑父老之报王德也哉？昔者，王尝学射于周侗，侗死，常设礼而致祭于其冢，公真王之苗裔①⑨欤？不然，何与王之报德先后同揆②⑩也。兹修家乘②⑪，爰述报本祠之始末，亦愿我后人顾名思义，各竭报本之诚于勿替，爰笔而为之记云。

注释：

①紫阳渡即现今丹阳全州公社的培棠村。

岳珂和长子岳琛“念王（岳飞）之忠，痛父（岳霖）避难兹土，而又感贡公（贡文宪）之德”而先后建造了报本祠。

②其分尊尊：他们的关系是以尊者的礼节对待尊者。

③其分亲亲：他们的关系是以亲者的礼节对待亲者。

④昭穆：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次序，始祖庙居中，以下（祖、父）递为昭穆。

⑤武穆王：岳飞死后，孝宗给予的封号。

⑥汤阴：县名，在河南省北部。

⑦临安：府名，宋建炎三年（1129年）置行宫于杭州，为行在所，升州为临安府，治所在钱塘（今杭州市）。

⑧鄂州：在湖北省，相当今武汉市长江以南部分。

⑨襄郢：襄：在湖北省，辖境相当今襄阳、谷城、光化、南漳、宜城等县地。郢：古都邑名，在今湖北江陵西北。

⑩朱仙：市镇名，在河南省开封县西南境。

⑪泯：mǐn，丧失。

⑫遁迹：即隐居。

⑬挂冠：辞官的意思。

⑭公：指岳霖。

⑮逸才：世人不知道的才能。

⑯著《吁天辨诬》：写作向上呼吁辨明冤枉的文章。

⑰再造：重新给予生命。多用来表示对于重大恩惠的感激。

⑱血食：受祭祀。因祭祀有牲牢，故称“血食”。

⑲苗裔：后代。

⑳同揆：揆，道理。同揆，同样道理。

㉑家乘：乘，一般史书的通称。家乘，指家谱言。

雕版传播镇江地方志的两位热心人

殷光中

《宋嘉定镇江志》和《元至顺镇江志》，是现存镇江地方志中最早的两部。最初翻检镇江的方志，每每感到大惑不解，为什么明代的一些镇江地方志都已失传，而宋、元两志却得幸存呢？细读两志，始知事情并非偶然。两志编写有特色，为世所重，人多珍藏固是原因之一；但主要应归功于清代两位著名学者阮元和陈庆年的两次刊行。两公生平，人所熟知，不赘。这里介绍他们在雕版传播两志过程中的两段佳话。

阮元有家藏《嘉定志》和《至顺志》写本，这个写本乃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宣城张木青赠送阮元的。嘉庆间阮将此写本进呈内府，并录了两个副本。嘉庆十八年（1813年）阮元倡议建立焦山书藏，以两志的底本和其他书籍送存书藏，按当时书藏书橱是以《瘞鹤铭》中“相此胎禽”以下69字编排次序，两志被存入“相”橱作为一级藏品加以珍藏。由此可知，当时两志已是绝无仅有的稀世之本了。近三十年之后即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镇江盐商包怡庄，慕阮元诗书之名，急欲求阮书写楹联，阮元托人捎话对包说：“我有两部旧书应归镇江人刊行，如肯成此美事，必书楹帖以报之”。包怡庄应允以后，阮元即挥毫以七字联句赠之曰：“古籍待刊三十载，旧闻新见一千年”，并且写了一段跋语：

“嘉庆间，余得《宋嘉定志》、《元至顺镇江府志》两部，

皆四库未收之书，曾经进呈，得蒙恩鉴。因以底本贮之焦山书藏。三十余年无过而问者。辛丑岁，丹徒包怡庄学兄，请付枣梨，镇江之书归镇江人珍获甚善，不意归田老眼尚见此书之成，乃知书之行世及刊书之人迟早皆有福命焉，因喜而记之。”跋的题款署“节性斋老人阮元撰并书，时年七十有八”。从跋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这位外乡老人对镇江两志得以流传的欣喜之情。

包怡庄刊行的数量不多，后来又经过太平天国战事，书更少了，雕版也已失落。邑人陈庆年对宋、元两志推崇备至，他在《嘉定志跋》中称：“余笃嗜两志，多方从人通假，舟车所至，必携以自随”。光绪卅二年（1906年），陈庆年应端方之请，编写《列国政要》于焦山松寥阁，见到书藏的两志抄本，就有了雕版传播之意。恰巧镇江商人朱小楼住在焦山水晶庵，陈庆年因与朱小楼谈起阮元书写楹联赠包商的佳话。朱小楼表示愿意效法，以后又得到其他商绅的赞助，即在南京开始雕版，前后花了四年时间，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雕完，辛亥革命以后，陈庆年去南京将雕版运回镇江印刷。这两部地方志得以流传至今，实阮、陈二公之遗惠。

目前，全国各市、县开展地方志编写工作，这里介绍两公热心雕版传播地方志的精神，对我们加快地方志编写的步伐将得到启示。

关于恽代英来镇和 镇江国民党建党的史料研究

李 之 戴千林

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先烈恽代英在大革命时期到镇江来宣传革命，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引导了不少青年关心国家大事，这是镇江许多七十岁以上老人难以忘却的往事。但对恽代英来镇的次数、时间及影响，却说法不一。有人说恽代英到镇江来过一次；有人说是两次；有人说恽代英来镇“组党”后镇江才有国民党组织的；有人说镇江建立了国民党第一区分部以后，恽代英才来镇江的；有人说镇江第一批加入国民党的五个人是由恽代英介绍的，有人却坚决否认此事。

当年在镇江听过恽代英报告的人不少，但直接与恽代英有接触、有联系的人并不多。他们主要是江苏省第六中学体育教师陈景福、穆源小学教师杨公崖、润商小学教师陈斯白和柳健。陈景福在抗日战争时牺牲，柳健因反革命在解放初期被镇压，陈斯白和杨公崖也于七十年代作古。六十年代初，有关单位征集镇江革命历史资料时，最有发言权的陈斯白和杨公崖在回忆这一段往事时，他们的说法也不一致，现从他俩在六十年代写的文章上仍可看出他二位的分歧之处。

陈斯白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十日写的《军阀统治下镇江国民党的产生与成长》（此文已载《镇江文史资料》第五辑）一文中说：一九二四年冬，我们写信问在上海大学读书的嵇直（注：嵇直同志是镇江人，一九二二年三月在上海参加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六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一九八三年一月三日在北京逝世），有没有办法加入国民党，他来信说介绍不成问题。我与杨公崖、柳健商量，都表示赞成，乃又联系金铸人、杨效颜，由嵇直找恽代英介绍加入。一九二四年冬，镇江第一个小组在穆源小学内成立。

“孙中山先生追悼会（注：一九二五年四月中下旬）……事前我们接到通知，恽代英将如期来镇参加追悼会。恽代英同志我们都没有见过面，开会前都以兴奋的心情期待着，忽然夏霖同志（注：夏霖同志丹阳人，一九二四年参加国民党，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牺牲于无锡，当时是国民党丹阳县的领导人之一）指着一个装束非常朴素的人说，来了，来了……。”

杨公崖的说法与陈斯白的回忆迥然不同，他认为恽代英来镇“组党”，他才加入国民党的，但入党介绍人并非恽代英，而是丹阳的夏霖和黄竞西。关于恽代英到镇江来的时间和次数，他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三日写的一份回忆文章（此文现存市委党史办公室）中说：“恽代英曾由夏霖两次介绍来镇，均是由我负责接待的。两次来镇，其间有点距离。第一次来，他们到我家没找着，是在宝安新街奎羊馆找到后会晤的，他住在中泠泉巷内泰升栈，我帮他请绿阳春茶食店担的保。第二次来镇，是主持孙中山先生追悼会的。”

陈斯白第一次见到恽代英是在一九二五年举办孙中山先生追悼会的时候，本不能排除追悼会前恽代英来过镇江之说，但陈斯白说镇江第一批参加国民党的五个人，是由他将五个人的名单寄给嵇直，转请恽代英介绍加入国民党的情况看，镇江的国民党员中第一个与恽代英有联系的人在追悼以前从未见过恽代英，那么，恽代英在追悼会以前来过镇江的

说法，就容易使人产生疑问了。我们就此作了些调查研究，由于恽代英来镇与镇江国民党组织的建立是联系在一起的事，所以在研究恽代英来镇问题时，也调查了一下，提出如下几点看法：

一、恽代英在孙中山先生追悼会以前是来过镇江，恽代英第一次到镇江的时间是在一九二四年六月。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我们到北京访问了嵇直同志，嵇直在向我们介绍个人革命经历时说：一九二四年六月，恽代英要到镇江搞社会调查，宣传革命，我正因为母亲生病，要回扬州探亲，就与他一起到了镇江。恽代英回到上海后，还曾找到国民党驻沪办事处分析过镇江的情况。当时，恽代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又参加国共合作时期的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兼管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的领导工作。在此期间，他不仅在党创办的上海大学执教，主编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而且不辞辛劳地奔波于沪、宁之间，宣传革命理论，点燃革命星火。恽代英在革命青年中声望很高，嵇直非常尊敬他，陪同一位极受尊敬的革命者到自己的家乡宣传革命，并与之研究分析自己家乡的情况，这对嵇直来说，是一件毕生难忘的大事，他的回忆，应该说是可信的。杨公崖虽然记不得恽代英第一次到镇江的具体时间，但他对恽代英到镇江后与他晤面的地点，所住的旅馆都记得十分清楚。根据这两位老人的回忆，我们认为恽代英在孙中山先生追悼会以前就来过镇江，来的时间是在一九二四年六月。正因恽代英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到镇江作过社会调查，回沪后又与嵇直研究了镇江情况，所以到了一九二四年年底，镇江就有五个人被吸收为国民党党员。

二、恽代英对镇江建立国民党组织起过重要作用，但他不是陈斯白、杨公崖等人的入党介绍人。

陈斯白说，他与嵇直取得联系后，就将陈斯白、杨公崖等五人的名单寄给嵇直，由嵇直转请恽代英介绍加入国民党。五人之一的杨公崖一直不同意这个说法，嵇直也不承认有过这样的事。他说：“恽代英从镇江回上海不久，把我找到国民党驻沪办事处，介绍我认识江苏省党部的几位同志，他们准备到南京、镇江一带开展工作，要我向他们介绍一些情况……，我着重谈了镇江的情况，建议他们一定要到镇江去一趟，到镇江后可找陈斯白、杨公崖等人……。我在上海向恽代英、侯绍裘及担负一定领导工作的同志介绍过镇江情况，为办好《新镇江》周报，向他们征过稿，介绍他们认识陈斯白、杨公崖等要求进步的人士。至于他们到镇江后怎样发展党员，怎样建立国民党组织，我不清楚。”事实上，嵇直既不清楚，也不可能了解这一情况。因为一九二四年冬陈斯白等五人加入国民党时，一九二五年春镇江成立国民党区分部时，嵇直不在国内，早在一九二四年十月去莫斯科学习，一九二五年六月中旬才回国。

五人小组成员之一的杨公崖不同意陈斯白的说法，陈斯白新提的关键人物嵇直又不承认有过由他转请恽代英介绍陈斯白等五人加入国民党的事，陈斯白说恽代英是他和杨公崖等五人参加国民党的介绍人就难以置信了。为了进一步弄清这个问题，我们查阅了有关陈斯白的资料，包括他生前填写的履历表、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写的文章。陈斯白在一九五一年填写的履历表上，关于参加国民党的介绍人填写的是陈景福和黄始鸿。陈斯白的六十年代之说，已遭两个重要关系人的否定，五十年代之说是否可信呢，我们认为陈斯白在五十年代

的说法还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一九五一年，陈斯白年未花甲，记忆力总要好些。另外，我们还可从陈景福和黄始鸿是否具备介绍陈斯白参加国民党的条件来分析他二人能不能介绍陈斯白参加国民党，从而证实陈斯白五十年代说法的可靠性。

黄始鸿，广东人，侨居镇江，老同盟会员，大革命时期在上海参加国民党。

陈景福，又名陈震寰，常熟人，一九二四年在江苏省立第六中学任体育教师。因“不满腐败的政治，不平等现实”写信给曾在重庆公学同过事的肖楚女，探求革命真理，“寻求一有益于社会的事做”。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九日，肖楚女复信，要陈景福向群众宣传，“组织各种会社或组织为国民党，依靠群众推翻一切敌人”（原信件存常熟县档案馆）。从有关人员的回忆及当年陈景福写给团中央的七封信件（原件存国家档案馆）看，也可看出陈景福不仅是镇江建立国民党组织的积极分子，还是镇江建立共青团特支的重要人物。陈景福和黄始鸿是具备介绍陈斯白参加国民党的条件的，陈斯白在一九五一年说由陈景福和黄始鸿介绍他参加国民党是可信的。

三、镇江国民党第一个五人小组的成员是陈景福、黄始鸿、陈斯白、杨公崖和柳健。

陈斯白在一九六四年写的文章中先说五人小组成员是陈斯白、杨公崖、柳健、金铸人和杨效颜。在文后附两次访问杨公崖纪略中有说：“关于镇江国民党第一个五人小组的成员，公崖说没有杨效颜。我在回忆录中也只记得金铸人、柳健、杨公崖、陈斯白四人，另外一个记不清，据效颜说，他是最初五人之一，我就写上了，这一点可作存疑。”可是陈斯白一九五一年七月三十日写的《秘密时期的镇江县党部》（原件存镇江市公安局）说的是：“镇江秘密时期的党是由杨

公崖、柳健、陈斯白、陈景福、黄始鸿组成。”陈景福和黄始鸿既是陈斯白的入党介绍人，怎能不是五人小组成员呢？我们认为陈斯白在一九五一年写的回忆材料是准确的。另外，我们还可以从陈斯白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三日登在《申报》的《秘密期间镇江党史拾零》一文中得到佐证：“民国十四年一月，镇江第一个区分部在更楼巷口已未星期演说会阅书报处成立了，那时参加的有许耘生、杨公崖、柳健、黄始鸿、陈景福、杨效颜、陈斯白七人。”一九三〇年距一九二五年时间很近，这七个人的名字不会记错的，成立第一区分部时，金铸人尚未参加国民党，成立第一区分部以前的五人小组中怎么会有金铸人呢？可见陈斯白在一九五一年写的回忆材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镇江第一个国民党小组的成员是陈斯白、杨公崖、柳健、陈景福和黄始鸿。

四、恽代英第二次来镇时间是在一九二五年四月，镇江国民党第一区分部建立于一九二五年五月。

恽代英到镇江参加孙中山先生追悼会，在许多老人的回忆中是一致的。追悼会开于哪一天，尚未查到具体日期。根据当年报纸报导南京、无锡、常州、徐州召开追悼会的时间均在一九二五年四月来看，镇江的追悼会不会早于四月；从陈景福一九二五年五月写给团中央的两封信来分析，也不会迟在五月。镇江召开孙中山先生追悼会的时间与南京、常州、无锡、徐州等地一样，是在一九二五年四月。

关于国民党第一区分部建立的时间，有说一九二五年一月，有说一九二五年春。陈景福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写给团中央并转致恽代英的信中说：“……最近又与镇地本来热心社会事业的杨、柳、陈等六人组成国民党区分部。”如果恽代英第二次来镇以前，镇江已建立了国民党镇江第一区分

部，陈景福就没有必要再向团中央及恽代英汇报此事了。由此可见，镇江第一个国民党区分部建立的时间是在一九二五年五月。

恽代英在镇江的具体活动及影响，尚待进一步调查研究，现仅就几个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上述看法，供关心此事的同志研究。

首任黄山镇中校长是谁？

苍 松

读第五辑《镇江文史资料》法度先生遗稿《清末到解放前镇江公办中学简介》云：一九三五年省立南京中学迁镇，更名江苏省立镇江中学，首任校长王骏声。据我所知，首任校长仍由原省南中校长张海澄蝉联的。他是美国留学生。六十年代该校旧址尚予遗一方石碑，即是张手书的建校纪念物。迁校后，在一次建校劳动中，发生意外事故，压死一名学生。张因此去职。后曾担任私立京江中学第一任校长以及南通学院棉作学教授。解放后，张老在北京病逝。据闻“文革”中，因他系国务院外办负责人张彦之父，张彦在“造反派”所“打倒”之列；张老虽死，其墓也免不掉被毁的厄运。

《增辑》读后补遗

张容尘

《镇江文史资料》增辑《城市山林说南郊》一文，第二节写竹林寺，说到挹江亭中石柱上有一副原刻楹联：“江流山色遥空外，笠景钟声夕照中”，上句原刻“姓”字，是晴字的古体，不是遥字。下句原刻“景”字，是影字的古写，不作“景”字解。今体联文应为“江流山色晴空外，笠影钟声夕照中”。

在竹林寺林皋法师所开的“林公泉”上，清末状元陆润庠所书石刻泉名碑的左方，约三十步远的半山上，刻有“碧岩”二字，其下年月、署名及印章均清晰可见，是光绪时代公车上书、“维新百日，行四十万里路，游三十六国”的康有为先生所书。似应列入文中，以引起旅游者的注意，并供欣赏。

在《镇江文史资料》增辑的《焦山胜境书法山》一文中写道：“在此面北临江崖壁题铭中，还有一块近代石刻，以刚毅的笔力，镌五言诗一首：‘为废不平约，呼号满神州；来此暂偃息，行作世界游。’从署名上知道，这是中国律师协会在一九二〇年为废除列强对华不平等条约，大声疾呼，到处奔走，路过焦山留下的题刻；同样，也可作为镇江各界人士积极支持拥护这类反帝斗争的见证”（见《增辑》45页）。文中没有记明这块碑刻题写人的姓字，其实这位题写人是南京律师吴迈。现在这块石刻尚在，题名处只见斧凿之迹，而不见人名，恐怕这是“文革”英雄们的又一“业绩”

了！当时吴迈到处宣传废除不平等条约。焦山有一位和尚还指那碑刻对我说：“这个人好出风头，他想留名后世，自己写了，自己花钱叫人刻石。”

说起这位吴迈律师，他还有一段轰动南京的往事，值得追述一下：

当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侵华“九一八”事变以后，举国震憾，朝野沸腾，南京人民对国民党政府外交政策，深感不满。首当其冲的是王正廷为部长的外交部。工农商学妇女各民众团体，莫不群情激动，义愤集议，决定举行示威游行，向政府请愿。走到外交部时，高呼口号，在愤怒的激昂情绪冲动之下，竟冲入外交部，和警卫发生冲突，并发生捣毁行动。当时形势紧张，大批军警出动弹压。群众继续到国民党政府请愿。这时蒋介石下令游行群众齐到中央大学礼堂集会，听候训话。据当日参加者谈：集合后，蒋介石身着长袍，头戴呢帽，到场讲话：首述国家形势、外交政策及国际情况，并勉励大家安心工作，学生要安心读书，准备为国家效力，政府励精图治，对敌寇一定据理力争，决不退让。并保证在十年内做到国富民强，驱除侵略，如不实现，你们杀我蒋介石的头！这时全场肃静无譁，唯独参加游行的律师吴迈，起立发言：“委员长的话，讲得是好的，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如这次上海发生大批走私贩卖烟土一案，竟然连宋美龄都参加了！”吴的发言，引起全场惊讶瞩目，蒋介石尤为震怒，拿起桌上的呢帽，往地上一摔，大声责问：“你的话有什么根据？”吴迈说：“这次贩土案，是由汉口用轮船运来上海的。船到码头，接运的都是小汽车，据报道其中有一辆，车号是××××，这辆车就是宋美龄的。她不参加，为什么派车运土？”蒋介石只好说：“这件事我一定要查明

的。”

当天夜里，吴迈就被首都卫戍司令部逮捕了。据该友人谈：当军法官审讯吴迈时，吴迈侃侃而谈，他的行为是爱国行动，不违犯国家任何法律。军法官弄得无话可说。最后对吴迈说：“吴先生真大胆！请休息两天，没有什么事！”并送给他水果、书籍。第二天南京各界团体，纷纷请求释放，吴迈又恢复了自由。

到焦山刻石，是这事以后不久的事，时间当是民国二十年，而不是一九二〇年。在解放前，一般题辞刻碑，大多是不以公元纪年的。

国宝——宜侯矢斚

季长隽 戴志恭

一九五四年六月间，在丹徒县烟墩山南麓，农民耕地，挖出西周时代的青铜器多件，其中一件有铭文的“矢斚”（音则规，见图一、图二）是稀世文物，引起全国考古学界的极大关注。“矢斚”高15.7厘米，口径22.5厘米，腹深10.5厘米，四耳，圈足高，腹外以大旋涡纹为主。腹内底有铭文十二行，约一百二十六字，残缺十七字。内容概述了周武王伐商，成王封矢为宜侯，并赐赏土地和奴隶等史实。

这一稀世之珍，经郭沫若、唐兰等著名考古学家的研究、考释，鉴定为西周初期宜侯的墓葬器；说明了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西周的势力已跨越长江，封矢（即史载的勾吴仲雍的四世孙周章）于现在的丹徒一带。丹徒是当时吴国的统治中心。一九八二年在丹徒大港磨盘墩、母子墩墓，相继出土西周早期的青铜礼器，可足以补证。我们镇江在西周初期的地名，应称为“宜”（可见铭文“王立〔位〕于圉〔宜〕宗土〔社〕南乡”）。春秋时名朱方，战国时名阳谷，秦名丹徒，西汉初始置丹徒县。公元前五八五年“寿梦益强”，公元前五〇六年吴王阖闾伐楚，破楚都后，东筑阖闾城（今无锡县閭江），后又迁都于今苏州；吴的统治中心始东迁。史学界曾有人怀疑西周势力不能到达吴地，怀疑吴国不是周的同姓。所以，矢斚的出土，是近代考古学的一次重大发现；它解决了千余年史籍记载不明的悬案，澄清了史学界的分歧、争执；证明了我们镇江实在是殷周光辉的青铜吴文化的摇

篮。

矢戩铭文的内容记述了周王恩赐之隆。矢侯认为最光荣的是赐他“𠂔[彤]弓一、𠂔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古者被赐弓矢，就有资格代表王廷征伐，他这个“勾吴”在中国东南之地位，也就首屈一指了。此外，还赐予土地（包括山川），特别有价值的是赐奴隶一事，其中有原为殷商贵族的七姓（铭文：“锡[赐]在鬲[宜]王人□又七生[姓]”），这些殷王之人，随着殷商的灭亡，沦落成为奴隶，成为赐予之物了；有从外地迁来的“厥酺□又五十夫”，这是耕作奴隶；还有土著的耕作奴隶“庶人六百又六□夫”。真个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海之滨，莫非王臣”。奴隶社会的统治者，把人（奴隶）当成物，随同土地，任其转让、赐予，这和大盂鼎记载的周康王赐盂“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一样，同为研究西周奴隶制社会历史的重要史料。

对于镇江一地来说，矢戩的发现，一下子把我们这个地区的文明史上推到三千年之前。作为镇江人或在镇江工作生活的外地人，都是不可不知的。

“金陵王气”话寄奴

明 光

当年，秦始皇听信望气方士的胡说，认为东南有王者之气，派了三千囚徒开凿京岷山，这样就不出皇帝了。可是，历史偏和这位妄图万世一系的始皇帝开了个玩笑：东晋末，就在被他开凿的京口出了一名开国之君——南朝宋武帝刘裕。

刘裕小字寄奴，家住城里寿邱山下，原是靠种田、捕鱼和织草鞋为生的平民百姓。辛弃疾在著名词章《永遇乐·北固亭怀古》中所写：“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就是指的此公。当然，他一旦登上皇帝宝座，其巷陌就不同寻常了，马上把他的旧宅扩建成丹徒宫。而且，关于他的一生也就出现各种不寻常的故事。

《丹徒县志》和其他封建史书一样，都把刘裕的出生神化了。这些史书记载的神话之一是：刘裕诞生时，产房有异光。神话之二是：刘裕在南郊竹林寺和黄鹄山下种田时，常有黄鹤随之飞舞。这一神话，可能是刘裕自己编造的。要不然为何在他当了皇上后，就改黄鹄山为黄鹤山，改竹林寺为鹤林寺呢？神话之三是：有一次他在鹤林寺讲堂睡觉，身上出现五色龙的花纹，把和尚吓坏了。醒后和尚告诉了他，他心中暗喜，却告诫和尚道：“上人无妄言！”还有一次，他到洲上割草，射伤了一条大蛇。次日，他在那里看见几个青衣童子捣药；刘裕问他们干啥，童子道：“我家大王被刘寄奴箭伤，我们捣药为他敷伤。”刘裕吓跑了哪些童子，得了

药，以后果然药敷刀伤极效验，云云。编造这些神话的用意，是散布刘裕“真龙天子”的舆论；当然相信不得。连同“金陵王气”之说，也是后人所胡诌出来的。

刘寄奴的发迹并非“上应天命”，而全在人谋。刘裕早年贫困，不为世重。唯王谧和他最好。一次，刘裕没法还“京口之蠹”刁逵的债，被刁逵捆绑毒打。王谧暗地替他还了债，他才被释。他一气之下，投了名将刘牢之的北府兵。刘牢之见他“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偉”，作战勇敢，不久就升他为参军。后来刘裕统军击败孙恩农民军于镇江蒜山。十几万农民军的血泊将他浮升为建武将军。荆州刺史桓玄叛晋称帝，刘裕在京口兴兵勤王，杀桓玄死党刁逵，报了公仇私怨；并把刁的全部家财分给京口贫民。然后，率兵攻入建康，灭了桓玄，从而掌握了东晋大权。他先严肃法纪，取消了豪门强占山林川泽向平民勒索的苛法，实行“土断”（即裁并侨置郡县，使侨居户和土著户合并），取消了北方侨居士族的特权；并推行考试制度，选拔真才。在整顿内政收效后，又挥师北伐，灭了南燕、后秦。从此声威大震，终于代晋为帝，立国为宋。

刘裕除在军事、政治上有历史业绩外，在生活上也比较俭朴，颇堪称道。他称帝后，在丹徒宫中专门收藏了他少时种田的农具，以示后代，勿忘其本。他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看到这些农具，为之感动，想知种田吃饭的艰难，所以治国也能振作。

尊重历史者，实应承认刘裕确是汉之后、唐之前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

镇江文史资料
(第七辑)

· 内部资料 ·

酌收工本费：五角

1984.4